

# 文研通訊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院

2019年第3期(总第十二期)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院通讯

2019年第3期

总第十二期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院  
刊 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院通讯》  
刊 期：总第十二期（2019年5月—2019年7月）  
执行主编：杨弘博 韩笑  
编 辑：周诗雨  
编 务：陈天传  
特邀编审：徐军  
特邀摄影：刘学红等  
装帧设计：杨宇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电话：010-62768010  
传真：010-62768010  
邮箱：ihss@pku.edu.cn  
网址：<http://www.ihss.pku.edu.cn/>



微信公众 号

# 目录

## 01 文研学术

### (一) 北大文研讲座

- [124] 咎涛 | 反思奥斯曼帝国的多样性 02
- [125] 戴锦华 | 对位与错格——五四与电影 06
- [126] 应星 | 比较历史分析的源流辨析 09
- [127] 迪迪埃·亚历山大 | 保罗·克洛岱尔与中国  
迪迪埃·亚历山大 11919-1930 年间法国思想  
界的东西方之争 12
- [128] 阿来 | 以史实矫正想像：以我的藏区文学  
书写为例 15
- [129] 贾妍 | 神采幽深：流转在古代近东文明之  
间的青金石 19
- [130] 乔治·夏勒：荒野的呼唤——六十年守护  
自然之旅 23
- [131] 刘世定 | 经济社会学的制度研究——两条  
不同的跨学科研究路径 28
- [132] 柯雷 | 经典性、母语问题及其它：谈中国  
当代诗歌英译选本 30
- [133] 尹吉男 | 雅集之后的图像与政治命运 33
- [134] 马克·古尔德 | 异中求同——帕森斯与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哈佛知识圈 37

### (二) 未名学者讲座

- [47] 张闰龙 | 企业的道义：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策略及其市场影响 46
- [48] 韩策 | “湘人江督格局”与晚清政治 48
- [49] 纳海 | 灰尘的旅程：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与  
生活中的“洁净” 51
- [50] 董昭华 | 全球化进程中的东方——以日本  
近代发展为例 54
- [51] 田天 | 如何重建一场葬礼——西汉遣策的  
用法与读法 57
- [52] 程凯 | “群众创造”的经验与问题——以  
1944 年“《穷人乐》方向”为案例 59

### (三) 北大文研论坛

- [93] 刘迎胜、林梅村、荣新江 | 多文化语境中的夷  
夏认知 63
- [94] 阿来、汪晖、沈卫荣 | 边疆社会的文学镜像 69
- [95] 荣新江、葛承雍、王永平、冯培红 | 丝绸之路  
上的民族迁徙与物种传播 73
- [96] 刘志伟、刘守英 | 回到“乡村”：整体性视野  
与中国社会研究 78

- [97] 民族与国家：再思 1950 年代中国民族识别与  
社会历史调查 83
- [98] 邓小南、刘志伟、郑振满 | 书谱石刻：中古  
到近世华南与西域研究的对话 88

### (四) 文研汇讲

- [01] 郑少雄 | 边疆思想史：理解中国及其时空  
构成的一种可能路径 96
- [02] 马孟龙 | 东郡之置与吕后的地域控制政策 98
- [03] 秦玲子 | 蒙元帝国的医学文化 100
- [04] 黄群 | 卢梭与法国启蒙时期的戏剧 103
- [05] 冯培红 | 地名移动及背后的历史 105
- [06] 熊春文 | 文明的个性与命运：韦伯的农业  
社会学及其启示 107

### (五) 菊生学术论坛

- [14] 脱嵌的母体：传统中国贡赋体制中的食货  
原理 110

## 118 静园学术

- 可居室藏周叔弢函札与二十世纪中国藏书心史 120
- 杜伟生 | 纸与中国古代书籍 125

## 128 文研回望

- 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方德万教授访问文  
研院 130
-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文研院邀请学者就  
亚洲文明的和谐共处接受媒体采访 132
- 印度阿育王大学校长鲁德兰舒·穆克吉来北  
大讲学 133
- 文研院举办第六期邀请学者欢送会 135
- 文研院组织学者赴陇东、宁南地区开展史地  
考察 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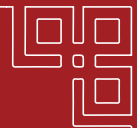
## 142 文研纪事







文研学术





## （一）北大文研讲座

124

### 咎涛 | 反思奥斯曼帝国的多样性

2019年5月7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四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I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反思奥斯曼帝国的多样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咎涛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玉麟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评议。

讲座伊始，咎涛副教授指出，自己对“奥斯曼帝国多样性”这一话题的关注起源于对世界近现代史某些重要主题的关注和研究。在研究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历史的过程中，咎涛副教授发现，历史学家们更多地将研究重点置于现代民族国家史的叙述上。而面对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与崩溃及其从帝国到众多民族国家的转变，历史学家们则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自然进程。然而，冷战结束后，地区国家的地缘政治形势、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国家综合力量发生改变，乃至后来民族国家在治理中出现了大量问题……这些因素都使得某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视野显示出局限性，这也使得人们对研究帝国史的兴趣有所上升。

从历史的角度看，土耳其不是奥斯曼帝国的唯一继承者，却是最为特殊的继承者——这跟该帝国的起源、西方的观察和塑造以及其他继承者对帝国历史的态度都有关系。不同程度的多样性，是古往今来人类社

会的普遍特征，但在不同层面上，对待这种多样性的态度和政策，又是不一样的。就奥斯曼帝国来说，它不仅存在多样性这一事实，其统治者还充分利用多样性这一特点进行国家治理，因此，它可以说是有意地秉持多元主义或世界主义的。这一特点在其政治、社会、宗教和文化等多方面均有体现。

本场讲座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奥斯曼帝国多样性的来源，第二部分论述奥斯曼帝国多样性的表现，第三部分追述奥斯曼帝国自近代以来多样性逐渐转变的过程。

在第一部分中，咎涛副教授主要分析了奥斯曼帝国多样性的两个起源。尽管目前学界对于奥斯曼帝国的起源尚无定论，但是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奥斯曼帝国作为拜占庭帝国、塞尔柱帝国以及蒙古帝国边疆的小诸侯国之一，在拜占庭、塞尔柱和蒙古人此消彼长的竞争过程中逐渐崛起。因此，在源头上它是游牧民族与伊斯兰“圣战”精神的结合。当然，人们对这两者的“比重”看法不一。另一种观点是比较多倚重拜占庭史料的结果，即认为蒙古人西征对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人口结构造成了重大影响。在奥斯曼等部落向西迁移的过程中，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关系以及游牧或流动人口与定居人口的关系非常复杂，甚至是相互

交融、渗透的。最初，奥斯曼帝国可能更多地源于一个边疆劫掠集团，这个集团包含的文化和族群成分是多元的——既有穆斯林、突厥人，也有基督徒、希腊人及其他元素。

或许可将第二种解释引申为，奥斯曼帝国在崛起过程中必须面对异民族和异宗教的人群。第一，游牧部落进入安纳托利亚地区后的很长时间内，其人口比例不太可能高于本地人，游牧或半游牧的部落群体必须面对更大的定居人口；第二，根据后世的人口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在16世纪初期奥斯曼帝国征服阿拉伯地区之前，其人口结构中非穆斯林仍占较大比重，而这些非穆斯林主要是东正教徒、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在奥斯曼政权从诸侯国到帝国的转变过程中，有一个特点需要注意，那就是它首先着力征服和经营的是东欧巴尔干地区，而不是小亚细亚地区。而在东欧巴尔干地区，尽管出现了移民和后期的改宗现象，但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穆斯林，其比重在整体层面上都占少数。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即便是在征服了阿拉伯地区以后，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人口也并未占据明显优势，其与非穆斯林的人口几乎是大体相当的。因此，在奥斯曼帝国崛起和发展过程中，上述客观存在的多样性现实，是导向帝国采纳多元主义或世界主义治理的重要原因。

咎涛副教授表示，奥斯曼帝国多样性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其对伊斯兰帝国和近东帝国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在奥斯曼帝国兴起之前，阿拉伯帝国昌盛一时。尤其是阿巴斯王朝时期，阿拉伯统治者依据伊斯兰传统，对“有经人”——主要是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采取多元统治的方式，规定这些非穆斯林只



咎涛副教授

要缴纳人头税便可得到保护，并实行较高度度的自治。这种统治传统也为奥斯曼帝国所继承。虽然后来奥斯曼帝国日益走向伊斯兰化，但同时帝国的多元主义得以延续。事实上，相较于阿拔斯王朝，奥斯曼帝国在多元主义方面走得更远，这体现为奥斯曼帝国实行的“米勒特”制度。“米勒特”是宗教共同体，也是奥斯曼帝国以宗教自治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在米勒特制下，希腊正教的大牧首管理东正教内部的事务，成为一个米勒特；虽然分散，犹太人在名义上也被承认为一个米勒特；亚美尼亚人、穆斯林也各算是一个米勒特。随着历史的发展，米勒特的数量不断变化，且在近代经历了重要改革。总体上看，伊斯兰教是帝国意识形态与合法性的基础，因此，米勒特制虽然确保了不同宗教信仰的自治，但伊斯兰教法的优先性也是存在的。不能把帝国的多元主义无限夸大或加以浪漫化。

在第二部分中，咎涛副教授主要从法律、宗教、社会文化、“宦官制”等方面论述多

多样性和多元主义在奥斯曼帝国的不同表现。

首先,他指出,有一个重要条件使得这种多样性成为可能,即帝国的政治权威要高于宗教权威。内亚游牧社会自身的可汗传统在奥斯曼帝国的前期十分强大。由于16世纪到17世纪历代苏丹在帝国法律制度建设的努力,奥斯曼帝国的法律体系日益完善。这一法律体系不仅囊括了伊斯兰法,还有“王法”,其中涉及管理税收、薪酬等实际问题的内容。学者们通过对历史档案的研究发现,奥斯曼帝国的地方法官“卡迪”既要执行沙里亚(伊斯兰教法),又要执行以“王法”为基础的世俗法律并照顾地方社会的特殊性。卡迪不仅仅是宗教法官,还扮演着地方行政长官的角色,比如处理负责监管征税等。就这样,奥斯曼帝国在实践中不仅以伊斯兰的方式处理日常事务,还以其他更为多样的方式解决具体问题。

因此,咎涛副教授指出,从宗教角度看,奥斯曼帝国的国家治理具有多样性。在奥斯曼帝国实行的米勒特制下,东正教的大牧首不仅是一个宗教共同体的领袖,还扮演着帝国统治者与东正教徒中间人的角色。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这样管理,主要是从管理的便利性上进行考虑。基督教徒拥有独立身份、人数多,直接管理的成本则较高。因此,比较适宜的管理方式为让其自治并实行间接管理——通过中间人的方式进行管理,也可以帮助奥斯曼帝国维系稳定的多元统治体系,从而减少冲突,利于社会稳定。穆斯林社会在内部管理上也存在多元特性。无论是军队还是宫廷,奥斯曼帝国君主都会着意保留伊斯兰教的正统和非正统因素,让两者在相互平衡的竞争中并存,从而利于巩固王权。

咎涛副教授认为,从社会的族群构成和文化取向方面看,奥斯曼帝国保持了很强的多样性特点。早期,根据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记述,奥斯曼人既尊敬伊斯兰教正统学者,也重视伊斯兰正统文化,还保持了鲜明的突厥-蒙古内亚传统。比如,女性可带兵,可参与政事。这说明在奥斯曼帝国的草创时期,伊斯兰文化与民族文化共存。

除此之外,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统治者也有世界主义眼光。以奥斯曼帝国君主的后宫为例,嫔妃出身复杂、多为奴隶、民族混杂程度极高——绝大多数是来自高加索、乌克兰、波兰等地区的欧洲白人女性。甚至可以说,除了苏丹及其子嗣之外,后宫中的突厥人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即奥斯曼帝国基于政治考虑而进行的婚姻关系。联姻是奥斯曼帝国在崛起过程中的重要策略。当时,这种联姻更多是与基督徒,因此,联姻的过程也是其吸收多元文化的过程。甚至在19世纪前期,苏丹马哈茂德二世通过后宫里的西方女性完成了对西方的初步了解。婚姻是巩固政治的手段。为了避免形成外戚集团,以及为了选择能够比较容易离京且陪伴王子在地方挂职锻炼的女人做母亲(内亚传统的影响使奥斯曼人长期保留着一种残酷的继承人选拔模式),随着帝国日益强盛,奥斯曼的君主不再举行婚礼——16世纪的苏雷曼大帝与许蕾姆除外。

最后,奥斯曼帝国的奴隶制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前面提到的后宫女性多数出身于奴隶是一种情况,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征召边远地区的基督教男童成为禁卫军或苏丹近臣的“宦官”制度。这一制度逐渐完善,并延续到十八世纪前夕。事实上,这一征召制

度的标准和流程十分严苛,被选中的男孩需要皈依伊斯兰教并进行割礼,之后经过二次选拔,少数极为优秀者被送入内官宫廷,接受更为严格的教育和训练。其他人则被送到农村,在接受一段时间的“突厥化”教育后编入军队。这一制度当然有汲取基督徒人力资源的考虑,但其实也是一种精英选拔体制,既有深远的内亚传统,同时需要对伊斯兰教法进行解释以使其“合法化”。对于统治者而言,这么做是为了维系自身的权威、杜绝腐败,而不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量。换言之,这一过程反映出多种传统的融合。

在讲座第三部分,咎涛副教授指出,奥斯曼帝国的多样性和多元主义在近代发生了转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这一提法本身就是对帝国传统的多元主义的否定。但这是在现代化的名义下进行的,也是在这个框架下被后世的历史学家们所解释的。17世纪末,西方国家日益强盛,而奥斯曼帝国逐渐在走向衰落,其建立在强盛国家和强大王权基础上的多元主义开始遭遇内外挑战:内部的挑战是王权的衰落、地方豪强和民族主义分裂势力的兴起以及帝国经济和财政的恶化;外部是欧洲列强的干涉,特别是常以宗教的名义干涉奥斯曼内政。

以上这些是奥斯曼人改革的背景。除了富国强兵之策,还有加强中央集权的国族主义政策(即奥斯曼主义),具体体现为前述平权法令及其他一系列改革。奥斯曼主义即主张奥斯曼帝国的所有人都是奥斯曼人,不分宗教、民族,并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奥斯曼主义实际上是对帝国多元主义传统的否定,意在通过赋予非穆斯林平等的权利加强他们对中央集权国家的认同,挽救处在分裂

边缘的帝国。但对多元主义的否定也造成了新的问题,其中包括保守穆斯林势力的反对。帝国晚期,随着危机的加深,伊斯兰主义也在上升。除了对抗列强以宗教为由干涉内政,伊斯兰主义的发展还与帝国治下穆斯林比重的日益上升有关。按照优素福·阿克楚拉在20世纪初的说法,强调突厥认同的民族主义也在发展。上述“三种政策”都是某种“原型民族主义”的表达形式,皆为拯救帝国而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瓦解,土耳其共和国诞生。现代土耳其国家在否定奥斯曼主义、伊斯兰主义乃至泛突厥主义的同时,也日益强调单一民族主义。至此,奥斯曼帝国及其多元主义成为历史,且帝国长期被共和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视为民族的“负资产”。

评议环节,罗新教授指出,尽管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很多内亚民族建立的王朝,但是它们都被中国历史学家成功地中国化了。由此反观,尽管与中国的政权形式不同,但奥斯曼帝国在努力平衡本地传统和内亚传统的关系。它们采取的措施值得思考。咎涛副教授表示,从认同政治的角度看,奥斯曼帝国从内亚认同向“本地”传统的转变,在16世纪以前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同时,奥斯曼帝国从16世纪开始也存在一个再伊斯兰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奥斯曼帝国的多样性和多元主义需要在一个漫长且复线的历史过程中被观察、分析。

(撰稿:殷金琦)





125

## 戴锦华 | 对位与错格——五四与电影



戴锦华教授

2019年5月9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五期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BI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对位与错格——五四与电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主持。

五四运动发生后的百年间，中国文化以“赶超”为逻辑不断变革和发展，没有心理空间和余裕来反观我们的文化自身，这种“滞后自觉”贯穿了中国文化主体的形成过程及与外来文化（主要是欧美文化）的碰撞之中。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崛起的事实在政治经济意义上及全球高度紧密关联中发生并被大家共同体认、共同接受。中国现代历史一百年被赋予了不同的意味，即我们终于获得了某种心理空间和余裕来反观我们的文化自身，重新讨论“五四”——那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十年前，戴锦华教授曾以“电影与五四”为主题写过一篇短文。而“对位”与“错格”这组修辞，其实是今年孙柏教授对她进行采访时概括一些论述时所用的。电影，纯粹的舶来品。Film、movie、cinema起初被翻译为“影戏”，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前现代文化的“偷渡”。而当我们真正进入中国电影历史时，会发现电影最初的篇章，完全无法与五四所带来的新文化、新文学相媲美——其美学、内容、形式、价值的逻辑上都错位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以更为内在的方式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便是本次讲座所要讨论的电影媒介与五四运动的“对位”与“错格”。

讨论五四运动，我们首先要关注“白话文”运动。现代汉语的发生不仅是新传播语言的创造，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为内在的文化变革。在将古汉语的字组成新汉语的词的过程中，西方概念对于中国古汉字所指系统、价值系统、想象世界的方式的改变与颠覆也在发生。“我们使用的语言是一套新语言，今年刚满百岁。”现代中国人遭遇和经历了一场文化的内在流放过程。学习新汉字，使用现代汉语表达、思考……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开始经历着与中国文化母体的分离。

“女性”一词，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大“发明”。不同于西方文字中自带的

两性分化，古文字的“人”是不带有这种意味的。阴阳之和为人，传统的古汉字，是无法对译 man、human 的。中国新文化发明“女性”是为了发明“人”、“现代人”、“新人”。“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发生之际必须同时伴随着文化革命，而文化革命的意义在于安置人。”在“五四”这种文化断裂、转折和自新发生的时刻，需要安置人并召唤“新人”。少年中国之“少年”，参照文化欧化的过程，被指认为是男人，其登场必须被一个差异性的角色所定义，那就是女性。因此，“新女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新形象、新群体。

新女性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女性群体闯入社会体系，浮出历史地表，其代表角色是女学生和女明星。从与五四运动有关的画册或浮雕中不难看出，女学生总是被置于引人注目的位置。而女明星同样也是五四时期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明星王汉伦以电影《孤儿救祖记》一夜成名。但与她在影片中塑造的“悲旦”角色相反差，王汉伦自主出走包办婚姻家庭，因此与夫家、娘家断绝了全部联系，将自己成就为一个自食其力、前卫、耀眼并决绝的新女性其人。王汉伦的生命故事俨然已是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新女性最为推崇的“出走的挪拉”，但却不能登上彼时的大屏幕——电影的内容是受彼时观众和社会心理限制和制约的。这恰是电影媒介于大众文化和思想史的重要意义，即思想家所建构的理想世界、精神追求与大众文化之间存在巨大落差。这或许可以说是电影文化与五四运动的一种“错格”，但从影片所引发的各报纸对继承法

问题的讨论、现代法律的发生、现代教育的发生等诸多问题来看，似乎有着“对位”甚至超出彼时运动的意义。

在早期中国电影人中，公派留学生占绝大多数。正如“鲁迅与幻灯片”事件，这些留学生在海外都经历过欧美荧幕丑化中国人、美化日本人、日本拍摄的影片在欧美热映等事件。一腔热血的年轻人“弃医从影”、“弃商从影”……不同于鲁迅先生写出《呐喊》、《狂人日记》，五四时期第一部古装片热映后，两千余家影视公司“投机性”地出现，所拍影片无一例外是“女侠片”，一个女明星支撑一家影视机构的情况屡见不鲜。女侠，一种带有前现代女英雄想像的刀马旦形象，似乎再次与五四新文化错格。但女侠无法进入婚姻体系，来去自由的人物设定又似乎与新女性、新青年之追求对位、吻合。有趣的是，彼时的女侠片竟采取了与美国最早西部片相同的叙事结构——仗剑飞来、惩恶扬善，而后仗剑飞去。她们不仅占据了美国西部片中牛仔的位置，功能角色也与西部片中的牛仔相似。正如牛仔作为美国历史的承载者及其所必须放逐的创伤性内核一样，彼时的荧幕女性所占据的位置，终究是为了召唤一个男性形象而被创造的。女侠被放逐于社会结构之外，具有激进性和革命性的特质。新女性的登临正是为了女性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第二性”的整体退隐、为完成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人的创生而立。

这种错位中的文化建构并非以压抑女性为目的，而是一种以召唤现代人、召唤社会（男性）主体、个人为目的的功能性建构。放逐于婚姻传统之外的女性形象成

为中国左翼文化之“先锋”，重新建立起家国的连接，女性变成更激进、更有可能性的存在，为男性创造了一个可参考的、差异性的形象。但讲到此处，戴锦华教授也提醒大家：“新女性”未必完全对应着女人、真正的女性。

阮玲玉主演的电影《新女性》即对应着被现代文化逻辑高度本质化的女性，并借此形象表达出中国男性、中国新青年、中国新文化主体形成的多重困境。新规范中的男性不可以如此无助、矛盾、脆弱。而这是对前现代文化模式的又一次“偷渡”，即中国古代文人关于“香草美人”的比喻——女性的生命故事经常是男性生命困境的假面。正如“君臣”与“夫妻”的重构关系，男性可以结构性地体认女性的压抑、困境或无助。五四运动不断试图召唤阳刚的、强壮的中国男性主体，而彼时的电影却印证了这类男性形象的缺席。此电影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女作家伟明身边的女工角色阿英。作为左翼电影的代表作，此形象毫无疑问地代表着无产阶级，代表着历史的未来和拯救的力量。而阿英在镜头中出现时被设定为打在墙上的巨大黑影，则表达了中国现代人对未来阶级力量的陌生和隔膜。《新女性》显然不是一个关于女性的故事，而是关于现代城市主体，与他们想象中的未来阶级力量之间的陌生关系。影片中的夜总会片段也表现了影片并没有单纯地在处理有关女性的生命际遇，而是在处理一种关于枷锁与挣脱枷锁、束缚与自我束缚的问题。

五四时期的电影从来不是在思想史的高度上，而是以其特殊的功能角色推进着

文化革命进程，推进着召唤人和构造人的过程。而我们在召唤人的时候，我们也在召唤现代个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试图撼动的是封建文化中地主对土地的坚定占有及庞大的宗族制度、家族文化。因此，中国新女性之新与男性之不在场，也要在这样大的结构当中获得独立。成为“个人”，这是面临具体挑战和困境的。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个人”始终是一个集体名词。“个人”、个人主义、新人、现代人作为神圣客体不断被召唤、被想象、被试图去践行，却又一次次地受挫。这是整个现代中国在文学、文化上始终存在的“忧伤”。

反观今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个人主义被消费主义催生、被独生子女政策所托生。但当中国的“个人”莅临时，中国的个人主义实践变得更加艰难。电影对于我们生活的表述、性别的表述再次成为问题，一边是西方两性区隔文化，一边是独生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现实。这种撕裂式的境遇和体验，让今日的文化作品、产品再次面临失语和困境。这或许也是我们今日讨论电影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对位”和“错格”的意义所在。

(撰稿：崔璨)

126

## 应星 | 比较历史分析的源流辨析

2019年5月10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六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I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比较历史分析的源流辨析”。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应星主讲，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主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侯旭东评议。



应星教授

比较历史分析是社会科学的一种基本工具，也是新制度主义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研究思路源起于经典社会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被正式提出，并在60、70年代的繁荣期后逐渐走向分裂与式微。沿着这一脉络，应星教授首先分析比较历史分析的源头（即经典社会理论），随后述评了美国社会科学的兴起及其若干特点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比较历史分析的转型与式微的原因，并在指出当代比较历史分析扭转衰势的可能方向后，回顾了自己将比较历史分析与中国现代史相结合这一努力的探索与成果。

讲座第一部分，应星教授指出，19世纪的经典社会理论为比较历史分析奠定了基本前提，这是今天理解这一方法所必须重视的本源。与比较历史分析相关的经典

社会理论可以归结为四种传统。第一种是“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传统”，二人虽有众多差异，但均强调以民情、历史与习俗而非自然作为政治的基础，主张从经验现实进入历史与政治的分析；第二种是“马克思传统”，从生产方式切入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分析，并以超越国别的视野比较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第三种是“韦伯传统”，通过比较世界诸宗教文明史，围绕资本主义兴起与理性主义问题展开分析，探讨复杂的现代性问题；第四种是“涂尔干传统”，以实质问题为基础，确立了现代社会科学比较方法的准则。

这些经典时期的比较历史传统之间，既有共同之处，又存在不容忽视的张力。共同之处在于，其均以社会实在而非观念为基础进行分析，同时广泛借用历史的想



象力，并强调自然、民情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联。张力则可分为三类：第一，“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传统”以人类自由为核心关怀，“涂尔干传统”则关心社会秩序的构造与奠定，此谓自由与秩序的张力；第二，“马克思传统”中，历史的根本推动力在于物质利益，“韦伯传统”则在此基础上强调理念对历史方向的决定性作用，此谓利益与理念的张力；第三，“涂尔干传统”主张以科学的实证方式理解社会，韦伯则主张对人类行动的主观动机进行理解，此谓实证与理解的张力。

讲座第二部分，应星教授指出，随着社会科学的重心从欧洲转向美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比较历史分析出现了新的方向性变化，越发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变化呢？他认为，这与美国社会本身的特点有关，即试图让世界历史自然化的“美国例外论”，弱化本体论承诺、强化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实用主义哲学，以及社会科学的专业化与大规模经营。在这种独特的基础上，美国社会科学尤其强调对研究中不确定因素的控制——这一特征对此后的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此为背景，应星教授在讲座第三部分分析了比较历史分析自20世纪60年代正式诞生以来所经历的发展与转型。韦伯去世后，经典理论被以功能主义为主要代表的巨型理论所替代，后者在社会学与政治学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与经典理论相比，这种巨型理论体现出“去历史”、“去冲突”、高度学科化的特点。其中，韦伯对

现代性问题的复杂理解也被化约为工具理性色彩更重的现代化问题。20世纪60年代之后，巨型理论为罗伯特·默顿(Robert C. Merton)提出的中层理论所取代。中层研究对经典理论的使用是功能性的，后者成为了服务讨论、悬置争议、提供研究合法性的工具，因而进一步脱离了对实质现象的关怀。

20世纪60至70年代，比较历史分析进入了一段黄金时期，以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和西达·斯考切波(Thea Skocpol)为代表人物，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一阶段，摩尔做出了如下努力：将历史、国家重新带回研究视野，并在方法中展现历史多样性。然而，研究方法虽然发生了转变，但摩尔在核心问题上仍与帕森斯关注点相似，即着眼于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此外，摩尔直接取用民族国家、民主和专制概念作为分析单位与前提，在类型学上做出了极大简化，也是值得商榷的。对比经典理论还可发现，以摩尔、斯考切波为代表的比较政治的结构主义流派还存在僵硬强调结构维度，排斥伦理动因、文化因素的缺陷。最后，摩尔开创的这一方法对事件的复杂性、偶然性、多重起因的耦合关系也缺乏深刻理解。此后，在化约了经典的重要性与历史的复杂性的比较历史分析领域中，方法主义便成为了主流。

应星教授指出，当代比较历史分析存在从宏观到中观、从复杂到简明、从综合到分界、从重事件到重比较的基本特点。80年代之后，比较历史分析愈发退缩至研究方法的细节争论，如今更是在大数据与

文化研究的夹击下处于尴尬地位。因此，比较历史分析亟需重新出发。

讲座第四部分，应星教授围绕着比较历史分析应如何重新出发这一关键问题进行阐释。以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解决当代社会科学危机的关键在于弥合不同学科之间的张力，并提出了“开放社会科学”这一概念。应星教授则认为，当代社会科学应重点着眼于经典理论和中层理论之间的巨大张力，为此，尤为重要的是回到经典理论、直面历史复杂性，从而破除“方法主义”，跨越中学与西学的人为隔离，面对方法论之外真正重要的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研究者应以更加耐心的姿态将事件史和观念史结合起来，对民族国家等既有分析单位进行反思，充分理解现代性的复杂性，从而重建社会理论的想象力。

讲座最后，应星教授回顾了他将比较历史分析与中国现代史相结合的经历，以及这一努力的探索与成果。韦伯从现代资本主义与理性主义兴起的制度结构及担纲者的精神气质出发，探究社会秩序理性和伦理的理性化之间的张力，并由此理解现代性的基本问题。受韦伯的问题意识启发，应星教授发现，通过分析20世纪中国革命所构成的连续体及这一过程在最后形成的独特政治结构，可以进一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气质与政治支配方式，并在研究中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文化史、社会史结合起来。在此过程中，韦伯在比较宗教学分析中对精神体系和制度结构的结合，和福柯在谱系学中处理时

间、事件复杂性的态度都是值得借鉴的。

评议阶段，渠敬东教授表示，抽象程度的机械提高并不等于理论化，以绝对的教条和假设化约历史复杂性是不可取的。优秀的经验研究应立足于鲜活的历史与生活经验，在根本上返回并充实理论研究。渠敬东教授则指出，历史学在关注“变”的同时，也应对背后不变的东西加以挖掘，从而化解王朝与时代的界限，为古今对话增添可能。

提问环节，应星教授就比较历史分析与本体论有何关系的问题做出解答。他指出，比较历史分析应诉诸于不同的经典传统、与生活世界的观念经验紧密联系，以期恢复生命力——而不应在方法主义中固步自封。对于早期人类学对比较历史分析的探讨这一问题，渠敬东教授表示，以地理大发现为触发条件，早期人类学和古典学都是面对陌生文明的一种回应与反思，为西方人在面对自己的文明结构时提供了新的认识。

(撰稿：张雪冷)





127

## 迪迪埃·亚历山大 | 保罗·克洛岱尔与中国

2019年5月14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七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保罗·克洛岱尔与中国”。巴黎索邦大学教授迪迪埃·亚历山大 (Didier Alexandre) 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董强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余中先评议。

讲座伊始，亚历山大教授援引克洛岱尔的《中国人赞歌》表达作者对“活跃”的中国人的好感。一方面，与欧洲的现代社会相比，中国依然是古老的——这是克洛岱尔爱上中国的原因；但同时，这种热爱又被一种强烈的现实感削弱，因为中国彼时正被列强瓜分。本场讲座将聚焦这一双重矛盾，即克洛岱尔对中国深厚的个人情感与身为外交官的现实主义者之间的矛盾。

亚历山大教授首先介绍了克洛岱尔在中国的任职和创作情况。在1895-1909年间，他曾先后在上海、福州等地任职。值得注意的是，克洛岱尔完全不懂中文。在华任职的十五年，也是克洛岱尔文学创作的关键时期：戏剧方面，他创作了以中国为背景的《第七日的休息》，完成《城市》的第二版本（其中加入在华任职期间对经济、社会的思考），完成《少女维奥兰》的第二版本，创作《正午的分界》（其中故事发生在中国，第三幕更以义和团运动为背景）；诗歌方面，他创作了《认识东方》、《五大颂歌》等。《认识东方》被法国诗

人勒内·夏尔 (René Char) 称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诗集”。

亚历山大教授指出，我们可以通过以上作品在作者笔下窥见三个不同的中国。第一个是现实层面的中国，即克洛岱尔日常生活的地方；第二个是历史和经济层面的中国，它与克洛岱尔的外交生活相关，是处于君主制末期、与外国使团频繁接触的国度；第三个是想象和文学层面的中国，克洛岱尔对中国的想象与西方汉学、传教士的文本、东方游记密切相关，相较于异国情调的刻画，克洛岱尔更多从认知和宗教的角度理解中国。他将前两个中国纳入其全球主义的思想，认为世界是统一的。这一思想融汇了他支持自由贸易和资产流通的经济思想以及追求和谐共同体的诗学观点，也融合了他的天主教思想。而这也是克洛岱尔思想的局限之处，即难以摆脱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与上述三个中国对应的是三个“克洛岱尔”——作为外交官的克洛岱尔、在中国生活的克洛岱尔和把中国的经历融入自己哲学诗学思考的克洛岱尔。

在经济活动层面上，克洛岱尔在中国曾参与了两项重要的商业谈判，这也影响了他对中国的看法。第一项谈判涉及福州船政局的建设，当时的中国困境重重，克洛岱尔几经努力，计划仍旧搁浅。与此同时，克洛岱尔还制定了一套法语教学计划，希望通过语言和基础知识的传授，帮助学

生进一步获得高等教育。克洛岱尔也由此确定其外交工作的重要原则，即发扬法国语言文化，便于国家交流。这些计划都强调人才、物资的自由流通，与克洛岱尔的全球主义思想一脉相承。第二项谈判涉及法国和比利时财团与中国铁路公司合建的京汉铁路。这一项目旨在加强南北交流，促进中国一体化，因此也是中国整体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克洛岱尔在作品中与中国当权者刻意保持距离，他的视角却不完全是西方的。与保罗·莫朗 (Paul Morand) 对中国空间与欧洲租界空间做出对比不同，克洛岱尔认为，空间的区别与种族无关。克洛岱尔也没有采取中国人或在华外国人的视角，他始终处在东西方文化交界点。在《认识东方》中，克洛岱尔更多充当了观察者 (observateur) 和凝视者 (contemplateur)，这种包含距离感的外在视角使其对中国的呈现更加客观，也使作者对中国的态度从同情走向分析和判断。克洛岱尔认为，中国正在走向混沌和解体，同时，中国尽管有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却被封闭在懒惰而无法协作的空间中。

亚历山大教授从克洛岱尔在华作品及1936-1948年间对中国的回忆文字中，总结出中国的三个特点，即“混沌” (le chaos)、“无分隔的世界” (le monde non compartimenté) 和“中国人的活力” (la vitalité du peuple chinois)。

亚历山大教授表示，“混沌”与欧洲十九世纪末的颓废风格 (décadence) 密切相关。中华帝国解体之后，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瓜分的猎物。这给克洛岱尔留下深刻印



象。他在1937年的《北京回忆录》中曾提到末代王朝极为壮观的葬礼仪式。《五大颂歌》第二颂歌开场出现富有讽刺意味的中国意象，第五颂歌则在宗教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提出解决解体危机的答案。克洛岱尔在华创作的戏剧《人质》和《给玛丽报信》，也应放在帝国解体的时间背景下重新考量，因为其中都提到历史的终结。通过类比手法，克洛岱尔将中国搬移到西方，使其成为没落帝国的范例，摆脱边缘化地位，纳入到现实或神话的世界历史中。

在讲解中国“无分隔的世界”这一特点前，亚历山大教授提示到，在欧洲思想中，制造地理空间的不是自然，而是空间中的居民。克洛岱尔从地理角度将中国与欧洲对比，认为中国是没有区隔的，即不像欧洲被划分为互相区隔的小空间。中华

民族总是处在古老、暂时、破损和偶然的状况，因而免于绝灭。中国的地理特征被他描绘成巨大的平原，尽头是由山脉构成的自然分界线，几乎与外界隔绝。内部山脉众多，俯视平原。克洛岱尔将中国与日本对比，认为日本的风景纵向延伸，且常有阻隔，而中国空间始终是水平方向，朝向地平线不断延伸，没有分隔为有独立功能的小区间。亚历山大教授指出，克洛岱尔的书写在两个极端中摇摆，即独立的细节描写与整体和谐，亦即无法改变的根本无序与对秩序和谐的向往。在以上海码头为背景的《午潮》中，满潮被赋予象征意义——和谐的时刻以及宗教意义上精神相通(communion)的时刻。这其中暗含克洛岱尔的共时性美学原则，即整个世界被固定的地点和时间安排得井然有序。

克洛岱尔虽然承继了西方的部分刻板印象（如认为中国人效率低下），却很赞赏中国人天性自然、无序而有活力，并带有自生性(spontanéité)的特点。《认识东方》多处描写乞丐、麻子，正为表现人在自然中最原始和去社会化的一面。他将中国与其他大都市如纽约、巴黎对比：后者以经济为结构组织运转，个体之间没有差异，而中国社会的合作共生建立在个体差异性之上。考虑到文章的发表时间（1936年），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克洛岱尔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

接着，亚历山大教授谈到中国对克洛岱尔诗歌创作的影响。中国诗歌给了克洛岱尔很多创作灵感，例如他曾借用中国传统中“钟”的意象，赋予钟声塑造空间的能力。在写作中，克洛岱尔不仅注重清

(recenser)，还注重聚合(unir)，也就是将不同部分聚合为一个整体。在中国的经历启动了他的诗歌创作，使之真正成为诗人。他的写作旨在通过描写可见之物，寻找其与世界不可见的关联。因此，诗人需要更加敏锐的触觉(un tact plus subtil)。他超越了外交家身份，将日常与诗意对立，以此界定其作为世界行者的活动，读者便可从他的步伐中感受到他所说的“触感”。在华期间，克洛岱尔还学习了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思想，在描写、分析技法和美学思想上受到滋养。他认为隐喻和类比是美学秩序的工具，常将两个相去甚远的事物关联，影响了后来的超现实主义。

讲座最后，亚历山大教授再度谈起克洛岱尔对中国的感情。克洛岱尔在中国人身上看到了自己，中国人与土地的紧密关联更是增进了他与中国人之间的默契。亚历山大教授引用克洛岱尔的祝福作结：“在快乐和彬彬有礼的外表下，中国人的内心是自豪、固执、机敏、独立且顽强的，总的来说，是我见过最讨人喜欢、最聪明的人种之一。来吧，祝你健康，我的兄弟，自由的人，我喜欢你！”

评议环节，余中先研究员做出两点补充。其一，克洛岱尔在法国作家中形成榜样，吸引很多后继者关注中国，其中包括谢阁兰、马尔罗等。其二，“中央帝国”(le pays du milieu)的封闭使克洛岱尔有囚徒和异乡人的感觉，但凭借其多重身份，他依然能从更多领域发现中国。最后，余中先研究员表示，中国的克洛岱尔研究者寥寥，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人发现并研究这位伟大的抒情诗人。

(撰稿：孟瑶)

## 迪迪埃·亚历山大 | 1919-1930 年间法国思想界的东西方之争



2019年5月17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七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1919-1930年间法国思想界的东西方之争”。巴黎索邦大学教授迪迪埃·亚历山大(Didier Alexandre)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秦海鹰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董强评议。

讲座开始，亚历山大教授从“东方”的定义开始切入1919-1930年间的这段思想史。由于本质和根源的不同，以“东方”为主题的话语决定了“东方”这一定义的多样性。在本次讲座中，亚历山大教授暂且搁置东方学专家所定义的作为学术对象的“东方”，转而将讨论范围界定于作家在随笔、游记和小说中所定义的“东方”，并以一战作为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和定义“东方”。

法国知识界对于“东方”的讨论包括了宗教与地理两个层面，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对于“东方”问题的讨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背后的宏大叙事受到了质疑，尤其是源于启蒙时代的进步观念和康德主义提出的解放计划。保罗·瓦雷利率先就此话题进行了辩论，并引起了众多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注意，他们开始意识到重新定义

欧洲文明的重要性。这里的文明指的是瓦雷利意义上的“精神”文明，既非物质文明，亦非宗教文明。在这个意义上，关于“东方”的讨论有几个现象值得注意。

第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于以世界文化和文明为主题的知识争论的全球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反抗欧洲殖民政权的民族主义崛起。文明的意义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作为统治或解放的工具，进入到不同大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或种族之间的关系中。借用萨义德东方学的概念，可以说在知识和意识形态层面上，“东方”的概念建立在西方主导的“科学”的立场之上。东方学揭示了某种权威，在文明层面圈定了“东方”的地域，以此来反身定义欧洲。而二十年代关于全球范围内文化和文明定义的讨论，使得所有由欧洲传统定义的、与文明相关的参考标准都受到了质疑。

其中，折中派杂志《每月记事》的“东方的召唤”专刊在1925年发表了对250位评论家、作家、学者的调查结果。这期杂志得出了关于1925年文学界的惊人结论，即“东方”这一概念在当时文学界的中心地位。杂志调查的问题包括：东西双方能否沟通，如果可以的话如何沟通；“东方”的出现是否会对法国艺术构成威胁；在艺术、哲学、文学等领域，东方能为法国带来哪些有益的收获；西方的哪些价值



凌驾于东方之上。值得注意的是，“东方”并非本体论意义上的东方，而是时刻处于与西方的关系之中，是处在外来、对立和威胁关系中的东方。《每月记事》杂志表现的是已经作为学科且被杂志等出版物体制化了的东方学，其表述已带着象征性的权力关系。在这期的思想剖面中可以看到以保罗·瓦雷利和亨利·马西斯为代表的两种不同观点构成的双折画，同时这两位作家亦是通过杂志塑造“东方”概念的第一参与者。接下来，亚历山大教授针对这两位作家截然不同的观点进行阐述。

保罗·瓦雷利曾在1919年发表题为《精神的危机》的文章中指出西方文明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失败。瓦雷利认为，欧洲文化的幻想破灭与其在知识、哲学、宗教、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矛盾所产生的混乱有关。他的文章正好回应了1918年斯宾格勒发表的《欧洲的没落》的散文。斯宾格

勒的结论是决绝的：欧洲正在走向衰亡，一方面因为欧洲缺少精神层面的重大决定，另一方面也因为欧洲过于急剧的殖民扩张。在《精神的危机》的第二封信中，瓦雷利改变了他的视角。他不再从法国、欧洲的层面思考危机，而是上升到了世界层面。他明确指出了跨文化交流的全球化问题，同时也注意到欧洲的变化。从具有强烈权力辐射意识、信奉种族中心主义的欧洲变成一个兼收并蓄、更加客观的欧洲。

瓦雷利的观点建立在对地理和经济多方观察的基础上，他通过世界层面上的文化资产地位的变化来解释这一危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见证了知识精英美梦的破碎。对知识精英而言，知识和艺术本身就是目的；但在欧洲大国和殖民帝国中，传播的民主完全改变了知识的本质，“曾经是纯粹价值的知识现在具备了交换功能”。苏联、印度和中国等一些东方国家人口庞大，

瓦雷利从中看到东方拥有对文化资产的巨大消费市场。文学也不再是欧洲精神最完美的形式，当文学进入流通领域，它就会为了被消费而复制生产。

亨利·马西斯在1925-1927年间发表了题为《捍卫西方》的辩护文。和瓦雷利一样，他的文章也由危机意识开启。马西斯认为，脱胎于工业化、资产阶级和物质主义的十九世纪欧洲文明将全球统一化，但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他指出，全球流通（尤其是知识和技能的流通）带来了三重影响：第一是政治和改革方面，他认为西方给了东方力量，使其能摆脱“百年昏睡”的状态；第二个影响是精神层面的，因物质崇拜而衰退的西方在印度教、佛教教义中寻求平衡，以防止自己坠入物质主义的深渊；第三个影响是宗教层面的，宗教在个体之间建立关联，使社会、国家和全球层面上的共同体成为可能。

亨利·马西斯有趣的地方在于，他借由法国和欧洲的历史性危机，对历史和世界版图进行重新建构。德国成为东方和西方之间宗教信仰和精神的边界，莱茵河开外是东方，而法国成为西方的中心。因此，《捍卫西方》成为二十年精神图景中的复杂装置，他代表着极端的西方理论，即试图通过共同的西方价值内部流通来聚合德国、俄罗斯、中国和日本，从而达成重构一体化东方的目的，以解除东方的宗教思想对西方的威胁。

第二个现象表现于异国游记和理论小说之中。西方对东方的兴趣来源表面是审美，实则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在“东方”概念的重塑过程中，真实存在的国家代替了想象

中的东方，这些国家既要面临自身文化的丢失，同时也要与西方文明保持对话。旅行和信息的发展为国家间的交流带来了便利，作家也开始用写作来定义“东方”。

异国情调在两个文体中得到体现，首先是理论小说，这类小说用隐喻式的虚构代替了批评式的虚构；其次是游记。保罗·莫朗在1927年发表的小说《活佛》中直接探讨了欧洲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关系，不同的种族会在贸易带来的象征性暴力和真实冲突中产生对立。一战之后，以理查·穆勒《以这样的方式》和杂志《1912》为代表，游记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理查·穆勒敏感地意识到英国的统治对于印度的未来是一种威胁。但穆勒关心的并不是国家和种族意义上的政治解读。他重视异国趣味和别致，反对过多的描写，从不对所见所闻做哲学阐释。穆勒的日记包含了大量的关于仙境、奇观和东方奇遇的想象，其中带有强烈的西方意识，这种意识里夹杂着居高临下、蔑视和不理解。

同样的主题也出现在亨利·米肖的《一个野蛮人在亚洲》中。但与穆勒不同，米肖是注重想象和内心的诗人，他对法国知识界提出的东西方文明交流问题更为了解。在他的游记中，米肖谨慎又确实地介绍了关于印度和英国之间针锋相对的政治形势，同时，他的幽默也不曾掩饰三十年代殖民主义带来的问题。米肖探索的实际上是印度与欧洲的关系。米肖对印度人对外来者的冷漠非常震惊，他用国家和大陆之间的关系来形容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壁垒，这也暗示了东西方之间的对立。美洲、欧洲、印度成为米肖作品中的三个中心，但对中



迪迪埃·亚历山大教授（左）主讲，董强教授（右）主持

心的追寻包含着持续不断的对立：一方面要与西方以及欧洲文明保持距离，另一方面要抓住印度整体的特殊性。米肖的旅行是自我放逐式的，从自身排出所有与故乡的联系，但同时他也拒绝在东方思想中寻求解决西方问题的方案。米肖决定摆脱历史，并探索自己的内心。但米肖的印度之旅最终遇到了“死胡同”，他发现印度人开始放弃自己崇尚超脱和苦行的宗教信仰并转而信奉欧洲一体化和共产主义，历史远比神秘论更强大。

第三个现象是文学史范畴的理论层面的。“东方”问题带来了全新的文学敏感性，同时东方问题所引出的危机为忧郁的浪漫主义画上了句号。1924年，马塞尔·阿尔朗发表的《新世纪病》与1926年安德烈·马尔罗发表的《欧洲青年》两篇文章均是这种浪漫主义的经典文本。在《活佛》中，保罗·莫朗塑造了法国青年雷诺这一浪漫形象来揭示其空虚，他的政治、精神历程体现了一战之后落魄贵族精神无所归的境遇。

20世纪30年代末，则出现了一种超越这种忧郁的浪漫主义的写作形式。萨特作为文学社会学批评的创始人，正好与瓦雷利、马西斯和莫朗一战这代人相对立。萨特这代人生活在一战后，他们对之前时代的态度是，要么适应，要么拒绝。在萨特的朋友尼赞这里，东方因此成为了体验死亡、虚无和荒诞的场所，走向东方意味着重新寻回人性，揭示自我。在全球一体化即将完成之际重新讨论什么是亚洲，尼赞给出的答案是：她在经济文化层面上是“欧洲的外科医生”。东方的反殖斗争和革命为欧洲的危机带来了解决方案。

最后，亚历山大教授以尼赞的引文作结：“我们习惯性地把东方看成是西方的对立面：当欧洲的陨落腐败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时，东方的复兴和欣欣向荣也不再是秘密。东方可以拯救欧洲，给欧洲人以新生，东方有解决欧洲的药方，还有爱。印度充满了文明的精神，中国在我们眼里比在马可波罗那里更加神奇。谁来告诉我们亚洲使我们感兴趣的根本人文原因：孟买的罢工、中国的革命、越南的牢狱。而不是亚洲的大佛。”

评议环节，董强教授指出，亚历山大教授以全面的视野，将讨论的时间范围固定在世界大战。从中国的视野来看，十九世纪末之后的欧洲是启蒙的、先进的。但亚历山大教授从欧洲的视角讲述东西方关系，让我们看到了欧洲的焦虑和危机感。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二十年代法国思想界关于东西方的辩论，同时也是回到东西方文明相遇之际，来理解中国今天的文明身份，即如何从文化的层面定义我们自己。这是值得继续辩论下去的话题。

(撰稿：张欢)

## 128

### 阿来 | 以史实矫正想象：以我的藏区文学书写为例

2019年5月19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八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以史实矫正想象——以我的藏区文学书写为例”。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主讲，文研院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少雄主持。

郑少雄首先简要介绍了阿来的主要作品，强调了其背后包含的田野观察和独到的人类学关怀。郑少雄指出，在本次讲座中，阿来将回应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以宽广的文化比较视野探讨相关社会现实和社会理论。阿来的书写和思考不仅限于少数民族世界，更是与中华民族、与遥远的全球世界之间的协商和对话。

讲座伊始，阿来回顾了自己少年时代学习汉字的经历和相关的阅读体验。阿来认为，学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人生不同阶段的困惑。对当时的他而言，有两个困惑一直围绕着自己。首先，作为一名中学语文和历史教师，阿来注意到历史教育的局限性。历史经验和历史事实构成了我们存在的世界的条件和认知框架，但是抽象的历史知识无法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和当



作家阿来

下的中国社会，也无法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一个村庄、社区、乡县发生的问题，才是生活中具体的问题，而历史问题则不能解决自己当下的具体困惑。阿来以《光荣与梦想》一书为例，比较了中国和美国进行历史教育的不同之处。该书从微小而具体的事件出发来讲述历史，聚焦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不是像中国的历史书一样从皇帝、大臣的视角讲述历史。这一特点使得人们通过历史阅读所塑造的世界观更加丰富。

另一方面，阿来谈到写作对青年人的重要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在从事写作。阿来认为，文学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抒发内心情感的工具，通过文字，青年人能够表达内心深处对世界的一种豪迈的想法。同时，在具体的日



常生活范围中，青年人的生活也充满了迷茫和困惑。当这种迷茫和豪壮碰撞在一起的时候，文学中迷人的思想则产生了。

阿来继而谈到了自己的写作生涯。1982至1989年期间，阿来的短篇小说和诗歌陆续出版，在拿到自己作品的同时，阿来开始了对自己早期作品的反思。阿来指出，自己在语言的审美层面着力较多，在写作中会有意识地强制自己揣摩字句的用法。而在内容方面，他认为自己仍有不足，在这一方面，阿来提出了一个文学命题，即所谓的文学到底是书写个人还是书写集体。

阿来进一步谈到文学背后的族群概念。今天的文学除了审美的层次之外，更重要的是和地域、集体的关系，从而涉及到想象、民族和宗教形态的差异。阿来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写作少有批判、反思，无论是大众读者还是少数民族的写作者，都更多

地满足于一种文化依附关系和文化符号想象。阿来以吃生牛肉的少数民族习俗为例，反思中国边疆书写中的少数民族自卑与自满的双重心态。文化态度对于中国边疆书写有着重要影响，这种文化自卑与自满的心态既来自于对自己文化理解的缺乏，也来自于对世界文化的陌生。

阿来强调，在这一层面上，“边疆”一词是在欧文·拉铁摩尔的概念意涵上使用的，指的是内部文化意义上的边疆。这样的文化边疆不仅存在于不同的民族之间，而且在一个民族内部，地域的差异也会使其呈现出不同的样貌。藏族民族认同内部的多样性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藏民族内部，无论是语言、历史，还是宗教形态和生产方式，它们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具体而言，阿来讲述了对“白马藏族”进行划分的例子。1980年代初期，应白马人的要求，国家曾组织民族学家、语言学家等对“白马藏族”

再次进行族属研究，尽管存在争议，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仍将其明确为藏族的一部分。阿来借此说明，在某一民族文化内部构造的民族认同很容易带有强制性的特征，这一点在中心地带要求边缘地带进行文化认同的情况下尤为明显。

另一方面，不仅在不同民族之间会产生误解与歧视，这一现象在同一文化内部也同样会产生。然而，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边缘地带往往具有更加丰富、多样、不断变化和演进的文化，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文化只有在这种变化与演进中才有发展的可能性。对于民族问题，后殖民理论一直影响着学术界。阿来认为，后殖民理论过于强调民族文化认同，其目的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满足的是传统欧洲帝国崩解以后的需求，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土壤。后殖民理论需要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来建立一个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则必然会产生一些严重的问题，当今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局势就是例证。但是在中国的文化文学领域，今天仍然存在对后殖民理论的依赖，学界往往习惯于用身份认同和民族认同来简单地解释中国内部的边疆问题。

阿来的书写正是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的。阿来谈到，藏族人内部对其小说内容的一些质疑和反对也是民族内部文化认同分歧的一种体现。今天的许多社会学家的田野考察或者文学家的田野采风，忽略了普通人的生活和社会的角落里正在发生的演变。在这些角落里，旧的东西正在消失，新的东西正在艰难缓慢地成长。书写这些事物，更重要的是书写其中新的人、人的情感和看待世界的方式。这决定

了他们将来面对世界的方式，也决定了一个地区、一个人群面对世界的方式。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边疆地区存在两种变化的可能，一种是接受先进文化，学习新的东西，然后促进自身文化的更新；另一种是在现代性的强大压迫下，更加趋于保守，对外在世界视而不见。阿来认为，自己的使命在于摆脱想象共同体中民族内部盲目的认同强制，更重要的是，作为写作者，阿来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和批评界对后殖民理论的警惕。

提及自己作品引发的争议和反对，阿来谈到，在文化、思想界，坚持自己的见解，表达对生活、世界、文化命运的想法，同样需要勇气。否定的声音可能来自内部和外部，内部的反对源于对自身文化共同体的想象，外部的质疑则来自于对西藏这样的神秘化的共同体更加强化的想象。当代西方对西藏的书写呈现出一种浪漫化、神秘化的趋势，这是值得警惕的。基于在藏区做考察的经验，阿来指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藏区文字资料的缺乏有关。流传在藏区的主要是口述资料，很少有文字资料，在创作过程中，阿来只能通过一些有限的官方记载和民间传说进行比较，试图去厘清基本事实。口述资料的缺点在于，每个讲述者都会渲染和添加，这也为藏民族蒙上了一层神秘化、浪漫化的面纱。

阿来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不同于传统的藏区文学，也不同于文学界对当时既有的藏区文学的预设。随后，他分享了在出版过程中的趣事，编辑对于《尘埃落定》的修改意见往往以对藏区文学的旧有想象为依托，而这正是阿来想要



讲座现场

破除的标签。阿来认为，文学的进步是由内在观念的进步和革命来完成的。文学的革新是双重的，容易被人们发觉的是外在形式，难以觉察的是内在的变革。

阿来在书写过程中同样注意到一个现实问题，即藏民族在唐代就几乎发展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状况，在此之后，是什么导致了藏区发展的停滞？阿来试图探讨一种原本具有先进性、扩张性的民族文化逐渐停滞和萎缩的原因，因此，他以藏区史诗《格萨尔王》作为范本进行讨论，创作出作品《格萨尔王》。阿来指出，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藏民族越来越佛教化，社会的一切都被纳入到简单的因果报应的逻辑轨道中，这种社会解释系统与文化生命的停滞密不可分。而在现在的宗教文化背后，恰恰缺少对西藏百姓和个人的理解。阿来强调，当我们的学术训练使得这种基本的关怀都消失了的时候，学术就不提供价值了。先有理解，才有真实，其后才有价值。

最后，阿来回顾了自己长期以来的书写历程。他谈到，自己一路走来，恰如一部和内部想象与外部想象相搏斗的历史。作为科幻杂志编辑及负责人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他启发，去克服狭隘的文化意识，从作为人的层面，超出国家、民族的层面书写人类的话语，而这是阿来一直以来的写作目标与使命。

随后，郑少雄对讲座进行评议。郑少雄指出，阿来不仅是优秀的作家，也是优秀的人类学家，其探讨的藏民族内部的多样性以及中国内部边疆文化的多元性、混杂性，克服了本质主义的想象，提供了与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很好的理论对话。郑少雄认为，一方面，“共同体”可以有两种“想象”方式，一种是从边界来排除，另一种是从典范中心出发来构想，这两种想象方式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另一方面，《想象的共同体》本意是通过考察民族主义之滥觞、流布来破除民族主义神话的，在第三世界反而成为构建民族主义的武器，阿来的写作历程以及遭遇，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但是知识分子型的作家是有社会理论洞察力的，阿来对狭隘的身份认同意识有着清醒的警惕。

提问环节，阿来与现场听众就自己的创作心理、文学见解和对后殖民理论的认识进行了讨论。讲座最后，阿来讲述道，无论是在文学创作中还是社会讨论中，都不应以差别论差别，而割裂了鲜活的现实和具体的生命。

（撰稿：刘诗予）

129

## 贾妍 | 神采幽深：流转在古代近东文明之间的青金石

2019年5月23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九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神采幽深：流转在古代近东文明之间的青金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拱玉书主持。

讲座开始，贾妍老师先介绍了青金石的矿物成分、品级和主要出产地。作为一种产地极为有限的稀有石材，青金石在现今世界范围内为人所知的矿床屈指可数；在公元以前的古代近东世界，虽然青金石文物分布非常之广，地域风格也差别迥异，但是就其石料来源而论，大体都可以追溯到今阿富汗东北部的巴达赫尚（Badakhshan）省，这里的Sar-e-Sang是人类历史上开采年代最久，矿石质量最优的青金石矿床。

在古代近东地区先民的文化视野里，青金石来自于哪里？贾妍老师提到，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是现存最早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关于青金石（苏美尔语NA4.ZA.GIN，阿卡德语na4uqnû）来源的文字记载之一。这篇史诗成文于乌尔第三王朝（约前2112-2004年），其中记载了乌鲁克王恩美卡试图用谷物换取阿拉塔的金、银和青金石，用以装饰苏美尔神庙的故事。史诗指向的年代为苏美尔文明早期城邦时代，即公元前28-27世纪

前后。“阿拉塔”具体在何处学界至今尚存争议，如果历史上确有此地，从现实情况考虑，它最有可能指的是今伊朗西南部一带，在青金石贸易中起到集散、中转、及粗加工作用的某一城市；在苏美尔人的文化记忆中，它毫无疑问指向一个富饶而神奇的“青金石之地”，在这一点上，与我们现代人心中的阿富汗是类似的。

贾妍老师进一步勾勒了青金石在阿富汗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流转的海、陆两条运输线路：陆上贸易线从巴达赫尚向西越过重重山地和荒漠，其间具体中转点比较难于考证，但是位于今伊朗西部的埃兰古城苏萨（Susa）应该是青金石进入两河腹地的主要集散地之一；海上贸易线从巴达赫尚向南进入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心哈拉帕（Harappa），再向西南中转到青铜时代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大都会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然后经由海路进入波斯湾，抵达当时尚位于波斯湾入海口处的苏美尔城邦乌尔、乌鲁克等地，再沿着幼发拉底河北上到马里（Mari），进一步向西深入今叙利亚地区，直抵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城邦地区。

接下来，贾妍老师分阶段地介绍了近东地区青金石制品的使用情况。就美索不达米亚来说，考古证据表明从乌贝德晚期开始（约前4000年前后），两河流域北部





拱玉书教授主持



贾妍助理教授主讲

已经有了青金石制品的零星痕迹，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高拉（Tepe Gawra）遗址发现了最早的青金石印章。到了文字出现的乌鲁克时期（约公元前3300-前2900年），两河南部的许多遗址都发现了青金石制作或装饰的小型器物，如珠串、滚印、嵌有青金石的人或动物的小雕像等。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两相印证，基本可以确定在公元前三、四千纪之交，青金石已经在两河流域从北到南的广大区域内得到传播和使用，并且很可能以乌鲁克为代表的南部苏美尔城邦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获取青金石的来源。埃及地区使用青金石比两河流域稍晚，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金石制品大约在涅伽达文化第I期，也就是公元前四千纪中后期。

进入公元前三千纪以后，青金石的使用在古代近东地区大规模增加，青金石贸易进入一个繁盛的时代。贾妍老师沿着“乌尔（Ur）-尼普尔（Nippur）-马里（Mari）-埃布拉（Ebla）”这条重要的青金石贸易路线介绍了各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青金石

器物。位于今伊拉克南部的乌尔古城在古代两河的早王朝时期是最为富强的城邦之一，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因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雷（Leonard Woolley）主持发掘的“乌尔王陵”而声名大噪。该墓葬群出土了大小各异的青金石制品达两万余件。贾妍老师依次展示了山羊与“生命树”（“Ram caught in a thicket”）、牛头“大里尔琴”（“The Great Lyre”）、“乌尔军旗”（“Standard of Ur”）、匕首、滚印和青金石容器等等。在这些器物中，青金石有的用于雕塑，有的用于镶嵌（mosaic），有的直接用作器物的主体材质。在同时期两河流域其他地区发现的青金石器物虽然没有乌尔丰富，但也形式多样，耐人寻味。贾妍老师重点介绍了一组尼普尔和马里出土的人形雕像，其中青金石用于镶嵌明珠，比如现藏于法国卢浮宫的马里长官（nubanda3）伊比荷伊尔（Ebih-il）坐像等。早王朝第三期下半期（约公元前2400-2250年），在马里王宫内还发现了来自于乌尔的珍宝，其中多有青金石制品。这些

青金石制品在艺术风格上与乌尔保持一致，有的上面还刻有乌尔王的名字。再向西进入埃布拉，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大量未经加工的青金石原料。考诸文献，在埃布拉发现的一首献给太阳神沙玛什的赞美诗中，也曾提到舶来异国出产的青金石一事。因而可以推测，两河流域使用的青金石中，相当一部分是直接进口原料再在当地进行加工。

下一个千年，也就是公元前两千纪，是古代近东世界的“国际化时代”，几个主要文明区域之间，包括赫梯、埃及、米坦尼、巴比伦、以及后期兴起的亚述，对话交流频仍。由于滚印的使用几乎贯穿古代近东文明的始终，青金石在滚印中的使用可以作为近东地区青金石流转大趋势的一个指标。公元前两千纪中期以后，青金石滚印流传至几乎整个近东文化圈，在希腊忒拜（Thebes）地区发现了大量近东各地区风格的滚印。中亚述时期以后，阿卡德语文本中出现了“山中之青金”（NA4.ZA.GÌN šadi）和“窑中之青金”（NA4.ZA.GÌN kūri）的区别，表明玻璃模仿物正成为青金石的一种替代方案被制作并使用。新亚述时期的铭文中多提及“青金石釉砖”装饰的建筑；新巴比伦时期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前605-562年在位）在巴比伦城修建的伊施塔城门，是此类建筑传统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精彩的代表。

类似的区分也出现于埃及语中，例如著名的“埃及蓝”——一种以硅酸钙铜（CaCuSi<sub>2</sub>O<sub>6</sub>）为主要成分的人造蓝色珐琅质物——其埃及语表述为 ḥsbq-irjt，即“制成的青金石”。埃及蓝最早见于涅伽

达第III期（约前3250年），一直沿用到希腊罗马时期，在公元4世纪后失传。贾妍老师向大家展示了世界著名博物馆的一些著名埃及蓝收藏，如现存于大都会博物馆一件中王国12王朝时期的埃及蓝河马小像（“William the Hippo”），并指出埃及蓝不仅可以给器物上釉，还可以磨碎后当作颜料使用，其色泽鲜艳，并且经久不变。在这样一个“国际化”的时代里，由于区域之间外交活动频仍，青金石的主要流通方式也与上一个千纪以贸易为主的方式有所不同，青金石作为外交礼物的功能被记载于各种书信往来和壁画材料中。根据国外学者对“阿马尔纳书信”的调查，“青金石”（包括天然和人造）在外交礼物中占有相当重要的比例。

亚述登上近东外交舞台之后，青金石仍然担任着外交礼物的角色，并随着亚述帝国的扩张，成为了帝国资源抢夺的目标，不断在贡品和战利品清单中出现。贾妍老师向大家展示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公元前九世纪亚述王沙曼尼瑟三世（Shalmaneser III，前883-859年在位）时期的青金石锤，以及同一时期的巴拉瓦特纪功大门上关于腓尼基人向亚述进贡青金石的文献和图像记载。在萨尔贡二世（Sargon II，前722-705年在位）与亚述以北的乌拉尔图（Urartu）国王萨度里（Sarduri）之间的通信中，双方明确提及了关于青金石的争夺。不过，印度河流域文明衰落以后，海上“青金石之路”受阻，公元前两千纪中期以后青金石进口到两河地区的数量已难以与早王朝时期相提并论。在尼姆鲁德西北宫王族墓葬出土的金饰中，我们能见到

小件的青金石镶嵌。贾妍老师特别强调了此种多色镶嵌工艺的复杂性，这种镶嵌工艺一直保留到阿契美尼德帝国末期，但青金石的使用量逐渐减少。在展示过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几件青金石制品后，贾妍老师结束了近三千年的近东地区青金石使用情况汇报，并提示大家，到了公元前后之交，也就是安息帝国（前247-公元224年）时期，绿松石逐渐取代青金石成为近东地区最受欢迎的蓝色系半宝石。

讲座第二部分，贾妍老师开始分析青金石在古代近东地区流传和使用背后的文化意涵。在苏美尔语史诗《吉尔伽美什与阿伽》中，人们用“青金石须髯”来描绘想象中吉尔伽美什王的英姿。翻阅苏美尔语及阿卡德语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青金石须髯”这样的刻画并非吉尔伽美什所特有，而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对神祇与英雄外貌特征的一种常规性刻画。无独有偶，埃及新王朝时期的神话文献中对拉神的刻画亦是“银骨、金身、纯青金石头发”，这也与图坦卡蒙法老的雕像用青金石勾画眼眶、用埃及蓝装饰头巾的做法相印证。青金石以物质材料所特有的“形式感”，突破了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壁垒，赋予神与王形象一种具体而有质感的依托。青金石自身的物质性——光泽、与金色的夺目对比使其与神性之间建立了关联。

此外，青金石制品还多用于接收神谕。新苏美尔时期拉伽什统治者古迪亚（Gudea）的Ningirsu神庙修造铭文中特别指出，神将梦谕所示的神庙建筑图绘制在青金石板上。贾妍老师还特别展示了一块出自早王朝第三期的青金石奠基铭文板，

使用青金石为神所爱的特殊材质，可以让这块石板上的文字更好的呈现于神灵。新巴比伦时期的一块青金石滚印上的铭文还着重突出了对“闪亮的青金石”的刻画，这块滚印最终要献给马尔杜克神，因此，青金石也起到了取悦、沟通神灵的作用。贾妍老师总结道，青金石幽深的光泽使之成为了与神沟通的重要媒介，这也解释了早期苏美尔人的雕像中以青金石装点目珠的做法。贾妍老师否认了早期考古发掘中种族主义的解释，“蓝眼睛”并不能作为苏美尔人是高加索人后裔的证明，而是早期的苏美尔人选中了青金石“神采幽深”的特质以求与神进行沟通。在著名的阿斯马尔雕塑群（Tell Asmar）中，尽管没有特殊材料做目珠，雕塑者仍然刻意将眼睛部分放大，所追求的通神效果应该是类似的。除此之外，新亚述时期的医疗文书中，也记载了青金石印驱邪治病、保佑安康的功能。佩戴青金石的饰品亦可彰显神恩，以象征尊贵的身份和地位。

在古代近东地区，青金石几乎从不磨碎作为颜料来使用。直到阿富汗5世纪的壁画里，我们才见到类似的做法。而在欧洲，青金石作为颜料来使用则出现得更晚。在著作《艺术之书》中，意大利画家琴尼诺·琴尼尼（Cennino Cennini）将“群青蓝”（即青金石颜料）称为“尊贵而美丽的颜色”，并指出群青的颜色与金搭配，“无论在墙面还是木板上，都能够让画面粲然生辉。”青金石所蕴含的幽深“神采”，特别是与黄金搭配使用时在视觉上引发的辉煌灿烂的“神圣感”，有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西方绘画传统。由于青金石颜

料的神圣和纯洁，群青色一度被画家专门用于绘制圣母的衣袍。贾妍老师依次展示了《威尔顿双联画》（*The Wilton Diptych*）、《祈祷的圣母》（*The Virgin in Prayer*）等艺术品，并讲述了由于青金石之昂贵导致艺术家捉襟见肘的轶闻。据说米开朗基罗未完成的《埋葬》，即因无法支付高昂的青金石颜料价格而没有完成跪坐的圣母形象。17世纪的著名画家维米尔以青金颜料使用的奢侈而著称，并因此而陷入经济困窘。人造青金石颜料在西方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20世纪下半叶，法国现代艺术家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参与创造了类青金石色的IKB，也即“国际克莱因蓝”，并以此创作了一系列单色作品。历史上既尊且贵的纯蓝青金之色在人造替代颜料的助力下走下神坛，进入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讲座最后，贾妍老师带大家重回《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开头：“请查验这雪松木的泥板匣，解开它的青铜锁扣，掀开它秘密的匣盖，执起青金石板，高声朗读——吉尔伽美什所经历的万苦千难。”贾妍老师提示，这几句话体现了古代近东文化语境下，一种“内容”与“形式”并举的表述传统：吉尔伽美什永垂青史的王者功业，需要以与之匹配的物质材料——雪松木、青铜、青金石来承载；也需要与之相连的一系列庄重而富于仪式感的由“形式”到“内容”的阅读行为来传达。艺术本质上是一个强调在“形式”中发现“意义”的学科，那么，青金石究竟是以怎样的“形式”被使用，又以何种“意义”受到欢迎？这两个问题其实构成了以“艺术史”的视角，考察物质材料之文化意涵所

需要面对一些核心问题，也是此次报告想要着力论述的问题。另外需要关注的是，在历史与文明的进程中，“形式”的生成、流转、变化和与之相关的“意义”的固定、扩展和转移。当《天方夜谭》中阿拉伯的英雄布鲁奇亚（Bulukiya）走进那片曾属于吉尔伽美什的“神秘花园”，他所看到的神树上结满的宝石从吉尔伽美什时代的玛瑙和青金石，变成了红宝石和祖母绿，这体现了文化观念所引导的物质传统的变化。贾妍老师总结道，小小的一块青金石，在古代近东、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以至今日，承载了不同的意义，而这些意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青金石自身的物质性。尽管今日根据硬度的宝石分级标准将青金石归为“半宝石”一列，但古代近东人发现了青金石“神采幽深”的“色泽”，而西方画家则看重了它纯蓝的“色相”。

贾妍老师以苏美尔人的一句箴言结束整场报告：“青金石再小也还是青金石！”

（撰稿：周观晴）





130

## 乔治·夏勒 | 荒野的呼唤——六十年守护自然之旅

2019年6月10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荒野的呼唤——六十年守护自然之旅”。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资深科学家乔治·夏勒（George B. Schaller）主讲，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李晟主持。

李晟研究员首先简单介绍了夏勒和他的“守护自然之旅”。夏勒是美国知名的动物学家、博物学家、自然保护主义者、作家，从1952年参加野外科考起，六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野生动物的保护与研究，在非洲、亚洲、南美洲都开展过动物学研究，并在全世界帮助建立了二十多个自然保护区。从中非丛林的大猩猩到塞伦盖提草原的狮子，从喜马拉雅的雪豹到巴西丛林的美洲虎，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周游”中留下了无数的“第一个”，而其守护自然的脚步从未停歇过。

夏勒通过分享行路中的照片，讲述自己在各地进行观察、调查与研究的经历，在展现不同地域的野生动物的同时，揭示出动物之间以及人与动物彼此共通的特点。其生物调查发轫于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the Arctic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在阿拉斯加考察的过程中，夏勒特别关注石油企业进入当地开发后经济利益与物种存续之间的关系，并留心狩猎者在其中的行径。从1956年的初访，到

五十年后的回访，夏勒亦见证着当地的生态状态、人与动物共处情形的绵延与变化，并在“鹿从身边自由经过”的体验中感受原始生态和来自自然荒野的力量。他意识到，对于环境的变化，我们失去的不会再来，所以要持续抗争。

守护自然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接触动物、了解动物。夏勒在分享其旅行足迹时，同样侧重展现当地的生灵。在中非研究山地大猩猩时，夏勒参与到当地的猩猩保护行动，在与猩猩的不断对视中力图“知其所想”。通过分享与大猩猩亲近、被大猩猩群体逐渐接纳的“可爱瞬间”。他认为，并不存在着本质上“危险”的动物，“倘若我们保持平和，以尊重对待它们，它们就会逐渐慢慢地学会信任我们”，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生物观察，更容易获得“一手”的关于生灵们生活的宝贵信息。

在塞伦盖提（Serengeti），夏勒以狮子作为中心，勾勒出其与其他物种共处的状态，从而展现出当地的生态图景。狮子在其所在的生态圈里，既与猎物和其他大型动物（如斑马、猎豹、野牛等）产生互动，亦作为“社群”动物而独立存在。夏勒及其家人在当地进行研究期间曾经收养一只失去母亲的小狮子，在与狮子的共处中，他得以找到很好的、观察狮子的视角。而在与印度孟加拉虎和巴西丛林美洲豹的相处中，夏勒也进一步理解动物的生存境况。

综合上述观察，夏勒关注到动物与其他物种的互动、自身社群组织形式以及人在当地生态社区中所起到的作用，并同时思考经济发展、地区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以及人与动物的相处路径。

自1980年代进入四川开展大熊猫行为学研究起，夏勒也逐渐与中国西部的广袤土地结缘。亲身探访其中并与胡锦涛、潘文石等中国动物学家合作开展研究，夏勒深化了对于中国的认识与感情。在研究大熊猫的过程中，他反驳了竹子开花导致熊猫濒危的观点，揭示出熊猫的肉食演化起源，所著《最后的熊猫》也让很多中国人第一次真正认识到野生熊猫的生存状态。夏勒担忧自然的变迁与人类活动使大熊猫栖息地森林资源锐减，但他亦指出，中国人对大熊猫做出了具体而细致的保护工作：如中国政府把强化栖息地建设作为大熊猫保护的关键，建立专业巡逻队、救护队、监测站和收容点，并专门成立国家公园。上述举措使得熊猫栖息地竹林逐渐恢复，熊猫抢救工作逐步进入正常阶段。

1984年，夏勒成为最早获批准进入青藏高原开展动植物研究的外国人，赴藏北羌塘进行研究。而后，他一次次回到藏区，观察喜马拉雅雪豹、西藏马鹿、马可波罗盘羊，并追迹藏羚羊的生存行动，将其数量急剧减少与绒毛贸易相联系。“美丽的背后也有杀戮与血腥”，他通过研究揭示出“沙图什”羊绒制品贸易的血腥与贪婪，最早在国际社会呼吁停止沙图什贸易，推动开展反盗猎武装斗争、保护藏羚羊。他指出，捕猎本存在于当地人的生存逻辑中，但一旦用于商业并与经济利益挂钩后，情



乔治·夏勒教授

形便变得严重。使用特定拦截措施会对当地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因此，更好的解决办法是，在控制消费市场的同时维系人与动物在当地生态社区中的和谐共处与共生。此外，夏勒观察到，青藏地区的宗教领袖们或可通过其道德权威推进环保，而很多庆典亦可成为保护工作的机遇。

提问环节，夏勒就守护自然的资金与合作、国家公园建设的中美路径、以何种方式与动物接触等议题分享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应对不同生态境况，各地区应切实关注当地生态社区与具体互动，“因地制宜”地走出适合自己的道路，与动物平和接触、和谐共处。

六十年守护自然之旅，夏勒感受着来自“荒野的呼唤”。行走其中，他深度体验不同的地方性社区与生态系统，并在积累中沉淀出比较性的思考。

（撰稿：章涵青）

131

## 刘世定 | 经济社会学的制度研究——两条不同的跨学科研究路径

2019年6月13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一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经济社会学的制度研究：两条不同的跨学科研究路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世定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主持。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咎涛评议。

经济社会学是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互动中发展的学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两门学科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互相借鉴、互相推动而又因革损益的关系。张静教授在引言中谈到，最近社会学与经济学各自呈现出新的特点，而经济社会学作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与规范，则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径，在新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

讲座伊始，刘世定教授介绍他在教学、科研过程中，努力从经济学与社会学两个学科中提取要素，进行分析、互动与修改，从而建立新的理论、方法和框架。刘世定教授指出，经济社会学是跨经济学和社会学而形成的一个学科，跨学科的互动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研究领域层面的互动，或运用经济学的传统理论进入传统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如贝克尔的早期研究），或运用社会学的传统理论进入传统经济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许多社会学者恪守这一研究路径），可以称之为“路径Ⅰ”；二是

基础理论层面的互动，即在两个学科的互动中形成新的理论分析工具并进行经验研究，可以称之为“路径Ⅱ”。

接着，他分别从两条路径的特点、方法、经验以及利弊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讲解。他认为，路径Ⅰ的制度研究，承继于美国老制度主义者的研究传统，其基本特点是外生给定制度环境，考察由制度环境决定的组织与个人的行为。在制度环境中，可以不仅包含由国家强力建构的所谓正式制度，也包含习俗、禁忌等所谓非正式规范。

他例举三项经验研究进行说明。第一，“集体产权”的纵向排他软化及产权分析的三维框架结构研究。区别于法定与想象的视角，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来界定集体所有制，即可总结出集体产权的“占有三维度”，包括占有的排他性方位、占有方式选择的范围、占有的时限。将层级结构、排他的硬度概念引入，即可发现镶嵌在层级结构中的乡镇企业具有的纵向排他软化特征。

第二，同产不同权与差权租。所谓“同产不同权”，是指在非经个人间有限授权的情况下，不同主体掌握同样的资产时拥有不同的权利。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尤其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房产在不同主体手中拥有不同权利因而带来收益上的极大差异。同样的土地，在乡村集体手中

和在政府或国有机构手中，权利和收益完全不同，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也由此引发。

第三，关联博弈与无效规定。以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投资决策为例，根据条文规定，基金会主任的投资决策权包含对上级的拒绝权。独立的决策博弈表明此种规定是可行的。但是，在等级结构的制度环境下，如果将投资决策嵌套在等级博弈中，可以发现规定只是一纸空文，常常不能实施。

由此可以进一步说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路径Ⅰ对于固定的制度结构研究是有效的，但对于制度变迁、相互作用的群体间遵循不同规范、制度环境不确定下的预先判断却缺乏解释力，甚至会产生偏差。制度不等于文本和条例，制度是在互动与运行中形成的。

路径Ⅱ的制度研究的基本框架是在同时吸取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要素后形成的。一方面，它吸取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制度演化分析中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处理的视角，但是，经济交易成本并非一定是制度运行中的唯一或必要的因素，因此社会经济学既肯定基于资源获取的利益互动在制度形成和变迁中的作用，同时也注意到这些分析中存在的功能主义解释的弊端和机制不清的问题。另一方面，它从社会学吸取有限社会化及与此相联系的內化规范差异的假定，其基本认识逻辑是——行动者携带不同的规范进行互动，肯定“有



刘世定教授主讲

差异的规范”在制度形成和变迁中的作用。

刘世定教授强调，制度形成于双重均衡处，即在以物质资源的获取为目标的利益互动和以不同行为者携带不同社会规范的双重规范互动中考察制度的形成、变迁及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接下来，他从四个方面对路径Ⅱ的经验与理论研究进行例举与阐释。

从社会认可的角度看，路径Ⅰ事实上假定了社会成员一致认可的制度环境的存在。而在路径Ⅱ看来，制度的不完整性（即未得到社会成员的一致认可）并非例外现象，即从利益和规范的双重互动中内生地理解制度，因而特别强调制度（规则）存在于社会共识中，未得到社会认可的条规不是制度。进而，在政策变通与制度变迁、乡镇企业发展和变迁中的认知产权、城中村改造中的制度认知冲突与共识研究中或许可以发现，不同的认可机制导致制度的实施成本、实施状态存在差异。产权不仅仅是法律概念，也是社会规范与社会认同问题。



从互动的主体和方式来看，路径Ⅱ的一个基本关注点是，当事者携带不同规范互动时，协议（制度）如何内生形成。刘世定教授认为，这是制度研究的难点。以土地纠纷及平息方式研究为例，在具体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存在多种准则、多种方式，且至少存在四种影响土地规则变动的要素——国家政策、村干部决策、集体意愿、当事人约定。基于以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理想模型，即政治和法律活动已分化模型和政治和法律活动未分化模型。不论在哪个模型中，不同规范的互动都存在，只不过互动的领域、表现不同。

从互动的公平性角度而言，路径Ⅱ将社会公平放到当事者的利益—规范双重互动的视角下来理解，而不是研究者秉持的外在评价标准。以承包地调整中村民间的公平互动为例，村民间的公平互动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村民要同时考虑到短期、长期利益，讲利又讲义。在“有限不确定性”的帷幕下，不同公平规范的互动意义凸显出来。在“公平”互动中，部分是利益互动的投射，部分是内化规范的相互展现，部分是规范性说服。

从互动的矛盾与转换角度来看，路径Ⅱ注意到，当事者在互动中同时认可两类相互矛盾的准则，并依情境选择性地实施。例如，在企业双重税制中，形成了人人都是遵规者且人人都是违规者的局面。当事者在互动之中，可能形成前后制度冲突，从而造成不正常的政企关系甚至政企矛盾。

讲座最后，刘世定教授指出，两条制度研究路径只是一种分类方式，可能还有其他分类方式或其他研究路径。不同的研

究路径会使我们看到制度的不同侧面。

评议环节，周飞舟教授表示，刘世定教授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在学科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不只研究某些现象，而试图揭示和解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从而为本土理论创新做出了贡献。他认为，两条路径其实存在潜在的关系，路径Ⅰ实际上是寻找制度行为中的非制度行为，且暗含制度是不完整的，而这又成为路径Ⅱ的研究前提。制度中的行为者是活的、变化的，不同利益方携带不同的规范，从而拓展了制度、条规与文本本身，并超越地领会了制度制定者的思想，最终从双重互动到双重均衡，达到新的规范。

咎涛副教授则从历史学的角度表述他对于经济社会学不同路径的理解。他认为路径Ⅱ更接近历史学的研究路径，但同时存在很大差别。不同于经济学、社会学对抽象、规范、理论的关注，历史学更多地关注过去、史实、人情与事变，因此与社会经济学的落脚点差异很大。但是，对于制度的关注与解释，两者具有共通之处与可借鉴之处。讲座最后，刘世定教授对路径冲突、历史规范、互动非均衡等问题进行回应。

（撰稿：李玉蓉）

## 132

### 柯雷 | 经典性、母语问题及其它：谈中国当代诗歌英译选本

2019年6月21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二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经典性、母语问题及其它——谈中国当代诗歌英译选本”。莱顿大学区域研究院教授柯雷（Maghiel van Crevel）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臧棣主持。

讲座伊始，柯雷教授表示希望通过具体案例来探讨翻译中的原则性问题以及与选本有关的现象。本次讲座的关键词“Translation Anthologies”译成中文为“诗歌外译的多人选本”。翻译的目标语言特指英语，多人选本指不同的诗人被一起编选译成英文集。英译选本的特殊意义在于其多维性，从译出语到译入语的过程中存在着多种声音。柯雷教授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大陆诗歌的外译选本作为个案可以在诗歌翻译理论研究中唤起新的问题，因而本次讲座不会局限于一般的笼统理论问题，而是尝试与中国大陆诗坛发生直接的关系。

柯雷教授首先从编选译者（anthologist）的内部差异性开始谈起。举例来看，诗人杨炼宣称其参与编选翻译的诗集Jade Ladder包含中国过去三十年最好的诗歌。而《0距离》（Zero Distance）一书作者则在序言中表示，诗歌编译要多注意那些年轻的、新的、未名的诗人，同时坦言“我从

来不敢说，这本诗集中的诗歌是最好的”，相比之下低调很多。此外，Jade Ladder的著者之一曾给出警示性评论，认为非译出语的母语者无法独立完成翻译，然而《0距离》的成书过程恰恰构成反例。由此可以看到不同编选译者之间在观念上的矛盾。

同样的编选译者在不同环境（circumstances）中话语也会发生改变。这里“circumstances”是指整个广义的语境或外在因素。欧阳昱于2004年出版的诗集《砸你的脸》充满了挑衅意味，他在序言中对澳洲读者喊话，说这些作品就像你们一直很讨厌的那种非法移民。他2013年的新书（*Breaking New Sky*）依然面向澳洲读者，表示这个选本中的诗歌是最有趣、有吸引力、最可爱的诗歌，只不过也有一些具有争议性，可见说话的语调和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创作背景上看，《砸你的脸》通过一本叫作Otherland的双语民刊发行，既没有经由出版社也没得到任何的赞助，而新书则得到了澳洲政府的支持。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但是这种背景是否与其话语语调的改变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值得深思。另外一个例子是张明暉。80年代末，有出版社请她翻译选编好的女性诗歌选本（*Women of the Red Plain*）。在出版社写的介绍语中，女性诗人的写作被简单认为是感性情感的表达，存在尖锐的性别刻板



柯雷教授

印象。2009年，张明晖选编并翻译的诗集（*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Women's Poetry*）中，有保留着92年选本中部分翻译的片段，但添加了有关女性意识、女性心理和女性性经验的内容。“Circumstances”无论是译成语境还是外在因素，能属于这个概念的因素很多，在文化社会学研究中需要得到足够的关注。

柯雷教授认为，在考察选编译者们的所言所行时，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当代诗歌作为案例的特殊性，在文本以外的多维度关注中国当代诗坛的文化社会问题。首先，选编译者作为独立个体而具有个人能动性（individual agency）；其次，选编译者具有本位性或者本位意识（positionality）。也就是说，首先要意识到自己立场在何处以及来自何处，其考量是多维度的，如性别、母语、社会阶级背景、受教育情况等，呈现出多种身份认同的轴线交叉现象（intersectionality）。其次是别人如何看

待自己的问题，自我的本位意识无法避免他人观察视角的产生，甚至有些是偏见。

“Positionality”常常体现在选本的序、跋以及封面中的推荐语中。再次，是关于选译者的个人性格的问题（inclination）。不同翻译家们的各异性格既体现在其文风上，也可以从其诗人和作品的挑选中看出来。在笼统的翻译原则以外，中国当代诗歌的个案包含更充分的多元性。外国读者对于中国诗坛的了解非常有限。同时，中国能使用多种语言的一代人成长起来，开始在诗歌翻译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流动性也在影响诗歌翻译产生的过程。中国当代诗坛十分多元与活跃，经常发生各种论争。这种活跃性也会作用于编选的过程，因为编选译者无法摆脱力场域（forcefield）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表现出立场上的倾向性。这些独属于中国当代诗坛的特征尤其值得关注。

柯雷教授表示，他的研究问题主要在于中国大陆当代诗歌外译多人选本中有哪些突出的议题，又可以唤起什么样的问题。在研究对象上他更看重单语诗集，研究的焦点在于副文本（paratext），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序、跋或封面写的推荐语，相对贴合文本，诗人的选择方式也属于一种不明确的副文本。另一种属于周边文本，比如书评。柯雷教授的研究主要关注前者。

在讨论诗歌外译多人选本作为体裁的独特性时，柯雷教授首先介绍了学者Piasecki的成果，其博士论文主要研究波兰诗歌译成英语的过程。Piasecki的研究表明多人选本是出版商最偏爱的载体，有

时甚至只有通过多人选本的形式，诗歌才可能接触到国外的读者。其次，多人选本的体裁形式会被视为带有专家权威性。再次，多人选本具有去语境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选集中的作品已独立于诗人个人作品的范畴；二是作品脱离译出语即其写作语言；三是作品失去了文化环境。其结论在于，外译诗歌的多人选本给予选译者极大的操作空间。柯雷教授认为，在中国大陆诗坛语境下选编译者享有更大的操作空间，同时现代中国诗歌也笼罩于“三个幽灵”之下：首先是中国的古典诗，其次是外国诗（现代诗），最后是“中国”这个大的语境。仅仅被解读为表现中国特点的作品其实是对中国诗歌的不公。

王屏与美国诗人合作完成的选本（*New Generation: Poems From China Today*）也提到了社会发展现实情况，但笔触并不尖锐。由于兼具80年代和90年代的内容，对于国外的英语读者来讲具有过渡性质。按照类型学分类的方法，诗歌外译多人选本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概览性选本（general survey type），其挑选作品的方式是具有代表性的。第二类是特殊群体抑或说特殊题材（special interests type），二者有时会重叠。第三类是纲领性或宣言性作品（programmatic type），这类作品往往具有鲜明的立场性。后两类作品可能会逐渐具有概览性性质，取决于作者后续的影响力以及文学史的发展。按照这个原则，王屏的这部书可以说是第一类概览性作品。

再次回到欧阳昱的作品，柯雷教授提出“Pushing your welcome abroad”的

说法，即客人向主人发出挑衅。欧阳昱将出版社对于诗集的拒绝称为失败的英雄传奇（saga of failure），实际上是在攻击澳洲读者对于中国诗歌的态度。柯雷教授认为，中国当代诗坛中存在崇高与世俗的矛盾和张力，欧阳昱显然是站在世俗的一边。《砸你的脸》对经典作品持批判性态度，因而选入了很多之前外国读者不熟悉的作品，但像北岛这样的大人物因过于出名未被收录。欧阳昱抛弃了普遍意义上作为选译者的责任。

从这个问题延展开，柯雷教授开始讨论另外一个复杂但重要的议题，即翻译中的不完美问题（imperfection），特指非母语者使用外语的不完美话语。以往的诗歌翻译往往是译入语母语者掌握话语权，但近几十年来，汉语的母语者越来越成为诗歌外译多人选本的中心人物。这里强调的不完美现象不是语言内部的差异性，也不是学者Venuti所提出的有意识地异域化（willed foreignization），而是指一些更小的语言使用上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想要巩固母语规范的翻译模式，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教条化的规范已经开始崩溃。翻译中存在所谓的中心语言，尽管全球化的过程一直在改变这种现象，但到目前为止中心语言依然是欧洲语言。对于翻译中不完美现象的接受态度与语言间的权利关系直接相关。中文译成英文的文本容许不完美的存在并不说明语言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而是体现出冷漠的不关心态度。对此，学者柯夏智曾提出，北美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的接受依然是将其特区化，也就是将其置于一个角落的位置，并不真



正接纳其为主流，或容纳其与主流文学发生直接关系。也正因如此，国外对于中国诗歌的接受缺少真正批评的声音。

另外一个重要议题是关于论争的移植问题（transplantation of polemics），即将论争移植在文学外部。有的选本会假装具有概览性性质，比如欧阳昱“当代中国诗歌”的说法可能会让读者以为他的书是对于中国当代诗坛具有代表性的客观反映，但其实是带有倾向性的。但有的作家也会将这种移植论争以直接了当的方式表现出来，《新华夏集》的编选译者明迪就在序中谈到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问题，并且明确表示支持知识分子写作。

柯雷教授在 2017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大陆诗坛上的男性霸权现象。这种霸权并不是指具体的作品，而是体现在有关诗的话语层面以及诗坛上的权利关系中。而在国外代表当代中国诗歌的选本又巩固了这一印象。杨炼想要通过诗选来展现中国的时代特征。但从他自己的背景来看，他对近年来国内诗坛的认识并不具有代表性，其选本中几乎没有年轻一代的作者。柯雷教授批判此选本在挑选诗人时，无论站在怎样的立场之上都不应当忽略一些最重要的声音。Brain Holton 认为，很少有中文母语者可以对英语精通到进行文学生产的程度。对此，柯雷教授表示这实际上是从翻译语言上不完美引申到政治上的问题。因为精通（master）这个词在后殖民语境中体现出的“控制”内涵不仅表现在母语霸权上也表现在政治上。Brain 的说法是在躲避翻译语言不完美这个虽然敏感但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柯雷教授最后回顾了中国诗歌外译历史中一直存在的问题，举了两个年代相对久远的选本为例，1936 年由 Harold Acton 和陈世铨编选翻译的《现代诗选》和 1947 年 Robert Payne 主编的《当代中国诗歌》（*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这两本诗集都只收录了男性诗人的作品，可以看到所谓的“第四个幽灵”即性别不平等的存在。比如 Robert Payne 就提到冰心作为女性犯了感情上的错误就可以得到宽恕。性别不平等不仅存在于中国，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是，柯雷教授希望大家看到有些东西确实在发生改变，比如母语问题、文学中的政治问题等等，因此无须感到绝望。柯雷教授引用明迪的一句话来为讲座作结，“中国当代诗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有什么诗学特征能引起西方诗人的真正兴趣，这是中国诗人应该考虑的……当然，当代诗有自己的自身发展，不必为了引起外国的兴趣而刻意改变”。他表示自己做研究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看到所谓局内局外、中国西方之间的界限能够逐渐模糊，而非变成绝对或统一体。

最后，柯雷教授简要介绍了自己近期的著作和未来的研究工作。提问环节中，柯雷教授以自己 1986 年到 1987 年在北大与马高明合译《荷兰现代诗选》的经验为例，说明诗歌合译过程中的权力关系问题多元而复杂，难以解决。关于英译诗歌在国外的读者群问题，柯雷教授认为，总体来看数量非常有限，同样从事诗歌翻译的人也很少，但他并不认可诗歌面临边缘性危机的说法。西川老师最后针对诗选编者的身份进行提问，他指出，讲座中涉及的编选

译者自己本身是诗人身份，大都是靠自己的诗作有了一定的名气后再来做编选翻译诗集的工作，那么中国当代诗选编者的这种身份与其在国外的处境是否存在某种关系？对此，柯雷教授表示诗人译诗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按照德里达的看法，诗歌

本不可译，正因如此人们才如此关注翻译诗歌的现象，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创作和独创的空间。诗人译诗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

（撰稿：万舒心）

## 133

### 尹吉男 | 雅集之后的图像与政治命运



2019 年 6 月 21 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雅集之后的图像与政治命运”。文研院访问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尹吉男主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松主持。

尹吉男教授主要以明代宫廷画家谢环所绘《杏园雅集图》为研究对象，从图像内容入手，从美术史与政治史的双重角度来看待此画，通过画面所绘正统二年（1437 年）阳春三月发生在杨荣家的一场雅集来揭示在这些视觉语言背后所承托的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讨论了杏园雅集活动和《杏园雅集图》的图像模式的深层含意，破解背后的真实用意和功能；并通过《杏园雅集图》何时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为线索来全面了解当时在场者的精心设计与反映出

明代文官与宦官之间在不同时段内剑拔弩张的抗衡状态。

尹吉男教授在讲座伊始就提醒观众，杏园雅集距今 400 多年，它是一件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而作为当时历史事件记录的《杏园雅集图》本身则是图像而非历史。它所呈现的景象并非纪实摄影，实际的雅集场景转化到了传统书画的长卷形式中。雅集是历史事件，涉及图像，是美术史范畴要研究的对象。但对这一画作的个案研究，又并非标准的图像研究，而是涉及图像观看的问题，是一部观看史，是历史学科与美术史研究的交叉研究。

尹吉男教授通过对比中国古代卷轴画、近现代绘画、版画、摄影作品及西方绘画，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古代卷轴画中画家通常是“缺席”或不在场的状态，譬如作

于明代弘治十六年的《甲申十同年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绘明朝弘治年间朝廷重臣的群像，他们同为天顺八年（1464年）的进士，这幅画中画家并没有出现。这与西方绘画如委拉斯贵支、库尔贝等艺术家的作品中，画家与所绘人物同框的情况有所不同。通过古今中外的对比，尹吉男教授其实是希望提醒观众关于艺术真实性的问题。一种真实是文艺复兴时所建立的那种技术性的真实，而另一种真实是“观看的真实”。哪一种更真实？现在的研究正是进入到了技术进步、考察便利、学科交融等因素而带来的“超级观看”的阶段。

根据文献记载，《杏园雅集图》共有十本（画中每位主人公各藏一本）。尹吉男教授对留存于世的《杏园雅集图》版本进行了梳理，目前所见此题名的卷轴画共计两本，一本为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藏本（以下简称镇江本），另一本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本（以下简称大都会本）。尹吉男教授认为镇江本为谢环真迹，而大都会本不可信，为后世仿本；还有一本版画刻本，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以下简称版画本）。大都会本存有的问题，一是题跋书法水平较差；二是依照谢环《西园雅集图序》及杨荣所说“十人者，皆衣冠伟然，华发交映”，原本的画中应该包括谢环，共十人，而大都会本的《杏园雅集图》中并无谢环，这与杨荣和谢环的描述不符，应是后世的临仿本。（但是，在2014年大英博物馆举办的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明朝改变中国的五十年”的主题展览中，策展人柯律格所选《杏园雅集图》为大都会本。）台湾学者吴诵芬

则认为镇江本中的文官聚会着官服，而且补子上的纹章有对有错，补子代表品级，身为宫廷画家的谢环不应该不知晓，从而否定镇江本是原作。而尹吉男教授通过搜索每个官员的住所，发现他们之间住所相远，并不会存在家庭毗邻而不更衣，直接着官服前往的情况，而是有意为之。原因有三，其一，杨荣诗中明确指出“十人者，皆衣冠伟然”，应是着绘有补子的官服；其二，明代所刻版画本，来源于墨迹本，版画本中官员皆着有补子的官服；其三，镇江本有修补的痕迹，说明此作并非原貌。尹吉男教授则认为《杏园雅集图》四十年秘不示人，卷轴内部定有剥落，再次装裱时，补画者并非宫廷画家，缺少宫廷礼仪、舆服等认知，导致所补内容与之前有矛盾的情况，所以，镇江本为原作非原貌的情况。根据考订画面骑缝章“关西后裔”“杨氏勉仁”印，尹吉男教授推断镇江本是杨荣所藏之本。整场讲座也主要是围绕镇江本为核心展开的研究。

尹吉男教授提出“雅集图”这一题材处于庞大的历史序列之中。传宋代马兴祖所绘《香山九老图》（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虽然描绘的是发生于唐代白居易时期的历史事件，但是表现这场雅集的图式却出现很晚，是后代根据早期图式所作出的修改。而《西园雅集图》中虽然李公麟既是聚会的参与者，又是这一图画描绘者，但是并无《西园雅集图》的真迹流传下来，而是晚明之际文人们根据米芾记载《西园雅集图》而产生的画史传闻。

《杏园雅集图》涉及当时在职的九位朝廷文官，其中包括诸如杨士奇、杨荣、

杨溥、王直、王英、陈循等朝廷重臣。尹吉男教授对绘画对象中的人物背景进行梳理，发现这些人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所谓“馆阁诸公”，而是反映了江西文官集团的一次秘密聚会。在杨荣的《杏园雅集图后序》中特别强调每个人的官职，而且每人都着官服而来。如此等级森严，似乎这不是朋友的序列而是官场的序列。这与会昌九老的不序官阶只序年齿的成例不同，而是刻意强调他们的在职状态，凸显的是：这不是退隐的雅集，而是在职文官政事之余的假日雅集。雅集的命名类似“西园雅集”，雅集的人数和月份都类似“香山九老会”，雅集的主体是以杨士奇为首的“江西文官集团”和另外两位重要文官，所有参与者都是在在职的馆阁大臣。更有趣的是，杏园雅集的概念表面上看是在摹仿西园雅集，但在诗文中却多次提到了香山九老会。由于参加杏园雅集的实际人数为十人，后世又有“杏园十友”的说法，淡化了杏园雅集实际是正统二年九位文官的聚会。可以看出，此次雅集是仿香山九老会的。

那么，九位文官为何要重温唐代的香山九老会呢？杨士奇至迟在1398年已经有了清晰的“香山九老”的概念，而杨荣在《杏园雅集图后序》中提到“香山九老”和“洛阳耆英”这两个概念，并且在雅集诗中提到“缅怀洛中会，九老皆令望”。同时参加“杏园雅集”的周述也在诗中提到“高风凉可追，愿与洛中并”。杨士奇是否见过《香山九老图》，在杨士奇的文集中并无明确的记录。除了参加杏园雅集的上述三位见过《香山九老图》之外，与杨士奇关系最密切的人中谁见过《香山九老图》？



尹吉男教授

他就是写过《九老图》诗歌的梁兰的儿子梁潜（1366-1418），杨士奇少时与梁潜同学相善，后同官翰林，又同为东宫僚佐，关系非同一般。且他们是儿女亲家。梁潜直率而耿介，他于永乐十六（1418）因“辅导太子有阙”而下狱死。因而他对《香山九老图》的理解至关重要，可以帮助我们破解《杏园雅集图》与《香山九老图》之间的内在关联。梁潜的《题香山九老图后》全中有一段很经典的解读，“当是时，唐纲解纽，藩镇跋扈，阉竖弄威，缙绅为之斥逐，虽有裴晋公以身系国家安危，曷亦得以少吐胸中不平之气耶。”直接指出白居易等“九老”隐居宴乐的时代背景。白居易辞官的四年（835）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清除宦官的事变，以唐文宗和文官失败，宦官全面掌权的结局而告终。梁潜的这段文字同时关涉了历史与现实。梁潜在《题香山九老图后》中提到的“藩镇”对应的是永乐时期的朱高煦和朱高燧，“阉竖”对



应的是宦官黄俨，而“缙绅”对应的则是已经落难的文官黄淮、杨溥等，以及当时处于险境的杨士奇和梁潜自己。

“杏园雅集”参与者为九人，与“香山九老”人数一样。“杏园雅集”举行的月份为三月，与“香山九老会”的月份一样。“杏园雅集”的诗文中多次提到“香山九老会”。梁潜的解读让我们把《香山九老图》和《杏园雅集图》联系起来。问题的关键倒不在于梁潜的解读，而在于1437年“杏园雅集”的参加者依然处在当年梁潜解读《香山九老图》的情境中。“杏园雅集”发生在正统二年三月一日。这时的皇帝只有十岁，雅集的参加者除了杨士奇七十三岁，其余的人在七十岁以下、五十三岁以上。九人之中除了杨荣，都是永乐时期的“太子集团”。此时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与小皇帝关系最为密切的并不是张太皇太后和以杨士奇为首的文官集团，而是被朱祁镇称为“王先生”的宦官王振。而此时以杨士奇为首的文官集团已经开始与以王振为首的宦官集团发生了冲突。

如果把《杏园雅集图》理解为1437年政治力量的图景，如何认识浙江籍画家谢环的特殊性？谢环在这场雅集活动中同时拥有两种见证，一是作为画家参与现场聚会，见证了杏园雅集这件历史事件；另外，他是作为第一位观众见证了这幅画。作为“杏园雅集”的见证者和图绘者，谢环与杨士奇有着良好的关系，中间的桥梁是一度作过首辅的浙江人黄淮。黄淮从1403年到1414年和杨士奇等江西文官共同辅导皇太子朱高炽和皇太孙朱瞻基；黄淮亦是谢环的浙江永嘉同乡。谢环就是仰仗黄淮于

永乐三年开始服务于明代宫廷书画院。虽然谢环于杏园雅集上所作之诗并未题书于《杏园雅集图》卷后，但是清代康熙年间辑刊的《鹤阳谢氏家集》保存了一首谢环的《杏园雅集诗》，诗的最后一句“悠悠百岁间，适足振清议”，暗示了东汉末年的“党锢”与“清议”的典故。在《杏园雅集图》中，谢环凸显了三组文官，而将自己置于“后来者”和“旁观者”的位置。似乎表示他是雅集的见证者，而非本次雅集的主体人物。据《鹤阳谢氏家集》，谢环曾写过《杏园雅集诗》，但并没有出现在镇江本或版画本的《杏园雅集图》后，而参加雅集的九位文官皆有诗文（除了谢环，其他九位皆为文官；谢环当时官属锦衣卫，属武官）。由此看来，谢环已经预知此次雅集与“香山九老会”的关联。

尹吉男教授将《杏园雅集图》的观看分为两种，一种是来自于参加杏园雅集当事人及其家族后代的内部观看，另一种是后世鉴藏家的外部观看。尹吉男教授通过梳理文献记载，发现有关“杏园雅集”的诗文和图像被集中公开的时间是成化十三年（1477），而此时距杏园雅集发生的1437年已有40年之久。“杏园雅集”诗文和《杏园雅集图》在正统二年（1437）到正统十四年（1449）被秘密保存在10位当事人和后代的家族里。正统二年五月杨士奇重病到了写遗嘱的程度，同年，周述在雅集之后的十月壬戌就去世了。查《东里续集》可知，杨士奇曾两次立遗嘱，一次在正统九年（1444），即杨士奇病故的那一年，一次是在正统二年（1437）五月，也就是“杏园雅集”的同一年的两个月后，

杨士奇重病。正统二年的遗嘱的最后一条非常耐人寻味。杨士奇似乎有意在正统五年（1440）编定的《东里文集》中隐去了“杏园雅集”的诗文。同样在同期文本中不见关于“杏园雅集”和《杏园雅集图》的叙述。自景泰二年（1451）以后有关“杏园雅集”的诗文才开始零星面世，而《杏园雅集图》则在成化十三年（1477）才逐渐浮出水面。从英宗亲政的正统六年（1441）到“英宗北狩”的正统十四（1449）年之间，宦官政治已经相当严重，这段时间显然不是公开“杏园雅集”诗文或《杏园雅集图》的合适时间。正统十四年（1449），王振去世，土木之变，江西文官集团所面临的政治危机才慢慢解除。“杏园雅集”的诗文与图像也逐渐开始浮出水面。

评议阶段，李松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总结：明清艺术史研究的困境之一就是文献多，容易造成断章取义。而尹吉男教授则在个案研究中提出了许多有意思的观点，譬如，画幅的大小、线条等会改变我们对画作原本的认识，超级的观看带来了超级的知识；对作品的研究不能止于视觉感受，更需要知道作者做作品的动机，目的和相互关系。李松教授提出齐白石的画作中的昆虫都不超过对象的原大，这与荷兰绘画中喜欢放大细节的形式不同，这其中有问题，也有观念的问题。他对尹吉男讲座中提到的不同时代的雅集图，以现代生活中的“朋友圈”进行类比，香山九老雅集是对人和自然、朝廷和隐居关系的思考；西园雅集考虑的是朋友圈该有哪些人参与进去，儒、释、道皆有，是理想的朋友圈；杏园雅集是一场秘密聚会，政治的

忌讳在里边，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此外，李松教授认为台湾学者吴诵芬提到《杏园雅集图》官员衣服上补子的问题值得注意，尽管可能来自于后来补画者的随意，但清代的补子和明代的补子差距不大，仅是微调而已，这属于公众知识，补画者或可知晓。针对尹吉男教授提出镇江本为《杏园雅集图》的原作非原貌，李松教授引申至石窟雕刻、壁画亦是如此，是不同时期后继者在原作上的补绘（刻），因此期待利用技术手段分层来帮助解决我们的推想。

之后进入现场提问环节，有学生提出谢环所绘十个本子，是同时期画就，还是后来的临摹？尹吉男教授回答：“这十本肯定不是现场画，应是雅集之后一张张地完成。因为九位文官也要把题跋一一写上去。此图像是纪念册。”另一位学生提出如何看待宋、明不同时代雅集的差异性？尹吉男教授认为以前的是文人雅集，后来的是官僚雅集，只有玉山雅集是隐逸的雅集，但也正因为此，它才并不著名。尽管唐代的香山九老雅集是由白居易等九位退休的官员构成，看不出政治企图，但在明代，“甘露之变”这一知识赋予了这场雅集政治隐喻的意味。这或许可以映射明代藩王、宦官、文官等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所以尹吉男教授提醒观众在研究过程中，需要研究个别图像的上下文意义，尽管雅集的核心是喝酒、作诗。但是从参加“杏园雅集”的周述所著诗“高风谅可追，愿与洛中并”中就可以看出此次聚会并非是我们所见吃喝玩乐那般简单。

讲座最后以尹吉男教授的“突破模式

化，重新来反思”结束，而这也正是整场讲座的核心精神，突破对《杏园雅集图》作为传统“雅集”题材认知的藩篱，通过对画面人物身份的梳理及出场顺序设计的考量，结合传统书画研究中诗文题跋的内容、印章的考订，并从观看与传播不断生成的角度来重新思考此画产生的背景及政治意图，它是以一种看似静默平缓的视觉

语言形式还原了当时动荡激昂的政治境遇。尹吉男教授精彩绝伦的讲座不仅止于讲授了不同“雅集”产生的背景及用意，更是为观众提供了一种进入书画史研究的不同路径，一种美术史、历史、政治史交融的方法，使观众思考美术史的重新书写。

（撰稿：赵雅杰）

## 134

### 马克·古尔德 | 异中求同——帕森斯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哈佛知识圈

2019年7月2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四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异中求同——帕森斯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哈佛知识圈”，哈佛福德学院社会学系主任马克·古尔德（Mark Gould）教授主讲，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王利平主持。

马克·古尔德教授首先表示，自己此次报告的重心不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帕森斯的学术写作，而是从个人交往的角度还原帕森斯的精神风貌。同时，他还将介绍另外三位在哈佛工作的老师，以展示师生在彼此观点的冲突下如何学习和工作。马克·古尔德教授指出，自己对社会学的看法有别于以上几位老师的理解：如果要解决社会学领域

的大问题，则必须建构三维的社会学理论。比如，如果要阐明某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那么建构一套适用于所有社会秩序的功能理论也是必要的，马克·古尔德教授称之为“社会学原理”（“societal universals”）。这样，适用于某种特殊社会形态的理论结构（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模型及其发展理论）也能揭示未来转型的潜能。

马克·古尔德教授于1967年毕业于里德学院（Reed College），在当时是全美领先的研究型学院。同时，校园里左翼政治氛围浓厚、毒品泛滥。这三者成为了里德学生的标签。大学一年级之后，马克开始在瓦特区（Watts）从事政治活动。那是在所谓

“瓦特暴乱”（Watts riots）之前的一年，左翼和民族主义情绪已经萌发。马克自觉无法隔岸观火，加入了这场热烈的讨论，参与了抗议活动，并组织编写反战的诗歌读物。

本科毕业以后，他申请了三个研究生项目：芝加哥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三所学校都录取了马克，且前两者提供了充足的长期资金支持，哈佛却只提供一年的费用。帕森斯请马克担任自己行动理论课的课程助教，并提供一份暑期工作，向他传授了学术研究的注意事项，并答应从第一个学期开始就给予他自主研究的权利。马克回忆道，帕森斯确实对自己说过：“你应该相信我。”也因为这句话，马克来到哈佛，成为了帕森斯的研究生。

在与马克的第二次面谈中，帕森斯表现得相当不自在。后来，马克观察到这种不自在大概是帕森斯与人相处的惯常模式，包括他的妻子和同事。与帕森斯的谈话大大拓展了马克的学术能力，他们将自己当作伟大的社会理论家中的一份子，与涂尔干和韦伯并肩。马克称他们并非在讨论理论，而是对理论直接“上手操作”；并非停留在对理论的批评，而是对它们进行实践。第二学年第一学期，帕森斯问起马克对哈佛的感受，后者表示这里的研究生课程不够深入，令人失望。帕森斯相当震惊，第二天便邀请马克加入由他领导的系里的研讨会，几周之后他便让马克主讲，马克也得以重构IS-LM微观模型，并对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进行类比，展示出自己对凯恩斯的理解。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帕森斯向马克展示出哈佛所能提供的智识锻炼远超里德。担任助教期间，马克充当学生和帕森斯之间的中介。帕森斯从不告诉学生

要去论证什么，而仅仅提供论证的范例。另外，帕森斯也没有一份明确的阅读书目，马克只能自己草拟一份书目以缓解学生和助教的焦虑。学生们很快发现，马克对问题进行系统化的倾向远远高于老师帕森斯，后者往往能随手举例，但马克总在敦促他将问题进一步系统化。在某次讨论中，马克甚至直接打断了帕森斯的论证，学生们纷纷议论马克的职业生涯难保，但帕森斯更关注他做出自己的论证，没有计较此事。在后来的“当代美国”课程中，帕森斯总是给马克留下一定的时间让他提出相反的观点，构建一个解构帕森斯自己论证的反论证。这样做的效果非常显著，学生们可以通过一种非情绪化的方式表达与帕森斯不同的见解。

第一年结束后，帕森斯请马克担任自己的研究助理，他们相互阅读彼此所写的东西并提出批评意见，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稳固。尽管两人在对马克思著作的理解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帕森斯对马克将马克思理论纳入自己的体系中的建议持怀疑的态度。但帕森斯会不遗余力地保护自己的学生。当时在哈佛的乔治·侯门斯将马克视作极左分子、马克思主义者，一直以来对马克抱有偏见，想方设法将其踢出系外。如果不是帕森斯出面，乔治如愿以偿，但帕森斯从未向马克提起过此事，而是默默地保护着自己的学生。

当马克开始系统地阅读马克思时，他开始接触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尽管后者不喜欢帕森斯的观点。摩尔是历史社会学的奠基者，马克与他的讨论大大拓宽了前者在建构理论时常忽略的历史视野。摩尔也许可马克进行自主研究，并



向他推荐了马尔库塞 (Marcuse) 的《理性与革命》(Reason and Revolution)。这本有关黑格尔的书的确对马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他开始严肃思考有关黑格尔的问题。同时,马克与摩尔也共同阅读了很多马克思的历史著作,这使马克重新认识了马克思理论中的诸多概念,重新思考发展理论的相关内容。马克回忆道,摩尔从未真正“教过”自己什么内容,而是不断地向自己提问,给自己的观点设置障碍,从而强迫自己回答问题或重构论证。

在马克刚开始进入博士论文的写作阶段时,他和摩尔一致认为话题应当集中于英国。但摩尔提醒马克,尽管如此,他也应该对所有相关的案例都有所了解,包括法国、德国等地的情况,否则自己的观点很容易被推翻。马克一直铭记这一教导,在他离开哈佛前,摩尔请他吃了一顿午餐。告别时他将手臂搭在马克的肩上说道:“我相信我的学生可以做出有价值的工作,即使他们不是涂尔干。”

在保罗·森穆逊 (Paul Samuelson) 的推荐下,马克找到了肯尼斯·阿罗 (Kenneth Arrow) 向他请教经济学问题,后者刚刚离开斯坦福来到哈佛。阿罗非常乐意与马克一起阅读经济学书籍,并对牛津导师制问题很感兴趣。在第二次与阿罗面谈中,阿罗告诉马克他已阅读了帕森斯和尼尔·斯美尔瑟 (Neil Smelser) 合著的那本《经济与社会:对经济与社会的理论统一的研究》(Economy and Society: A Study in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heory),但感到无所获益。马克便向阿罗解释这本书为什么不适合经济学者阅读以及这本书的真正价值在于何处。阿罗向马



马克·古尔德教授

克展示了早年一篇关于医患关系的论文,称它重构了帕森斯在《社会系统》(The Social System)一书第十章的核心分析。马克表示这篇论文是他最喜欢的论文之一,不仅由于所得结论可以被他所界定的阿罗-德布鲁模型 (Arrow-Debreu model) 所统摄,而且在于它揭示了一种洞见:社会关系被社会价值所规约。马克与阿罗的分歧也是明显的,两人都认识到该模型在不完美信息条件下并不稳固,但后者认为马克的批评可以通过引入某种模型得到解决,马克本人却并不这么想。

马克与阿罗一同阅读了法兰克·奈特 (Frank Knight) 的《经济组织》(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一书。两人从不假定自己要解决某个问题,马克提出的问题也总是批评性的,而非寻求解释。阿罗也请马克与他一起阅读当时在哈佛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著作,以避免自己对其观点的理解因成见而产生偏差。尽管在相当多的问题上,阿罗与该经济学者的看法很不一致,但他仍然表示非常欣赏著作的质量。由此,马克强调,阿罗的评判标准并非从与自己观点的相

似性出发,而是质量。

阿罗的思路并不复杂,往往可以被简化为“最大化”与“限制”之间的对立。马克倾向于将微观经济学描述为一种普适的功能性理论,阿罗对此能够理解,但并不赞同将所有情况简化为微观经济学问题。当马克告诉阿罗自己试图构建一个针对某社会形态的特殊类型的结构模型时,阿罗先前的支持和理解减弱了许多。但当马克坚持如此时,阿罗的回复变成了:“那就去做。”事实上,马克的确清晰地表达出了一种理论模型,也使得之前所做的工作得到了更好的理解。

在一些学生的建议下,马克前去旁听了朱迪斯·夏克勒 (Judith Shklar) 关于启蒙时代的课程。马克在这门课程中接触了大量洛克的著作。一周后,马克与夏克勒面谈,并被后者对洛克的兴趣与渊博的学识所折服,也得到了自主研究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许可。马克特别提到,在研究生阶段,夏克勒是哈佛唯一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当时哈佛流传着一则轶闻,当夏克勒第一次出席学院委员会时,她一就座四下便一片寂静。最后是委员会主席问她:“你是来倒茶倒咖啡的吗?”马克笑言,难以想象性格强硬的夏克勒作何反应。

马克博士论文的主题有关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试图构建一个前革命时期英国社会形态的结构模型,因而也会援引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理论与摩尔构想的理论相当合拍,但集中于某些特别的状况以及使用于这些状况的解决方法,却与帕森斯和阿罗的想法很不一致。马克需要将之与一个功能性理论联系起来,以便阐明结构之间发

生转变的条件。这对摩尔来说毫无意义,但很契合帕森斯的想法。但当马克试图要把已建立模型的那些社会结构排列成发展的序列时,这种想法对几位老师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发展顺序能导出阶段序列发展的层次模型,从而判断一种革命是否有潜力将一种社会形态带向另一种社会形态。

几位老师都不怎么喜欢马克的作品,因为马克的作品建立在他们彼此的矛盾之上。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判断。在论文预答辩阶段 (thesis proposal), 马克意外地得知,乔治·侯门斯也成了自己导师组的一员。这让马克颇为费解,因为两人平时并无交集。乔治·侯门斯甚至直接向马克宣布他的测验不会通过。在预答辩过程中,乔治两次用完全一样的句子质问马克同一个问题,却不给任何反馈。面对这样明显的刁难,帕森斯非常强硬地打断了乔治,维护了马克的体面。在之后评审测试卷的环节中,也只有乔治一人提出异议不予通过,最终的结局却是,乔治被移出了导师组。

马克·古尔德教授最后总结道,在哈佛攻读研究生的经历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关于学术意见的判断,必须从质量而非与本人观点的相似程度出发。当然,学术权力也不可或缺。讲座最后,马克·古尔德教授与在场师生交流了自己对于学术偏见以及帕森斯理论等相关问题的看法。本次讲座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

(撰稿:周观晴)



## （二）未名学者讲座

47

### 张闫龙 | 企业的道义：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策略及其市场影响

2019年5月14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四十七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I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企业的道义：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策略及其市场影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闫龙主讲，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评议。

讲座伊始，张闫龙副教授即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企业社会责任（CSR）逐渐成为政策界、工商界、以及公众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议题。为了推动中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体系建设，监管机构和第三方评级机构不断推出指导企业CSR实践的相关标准和报告规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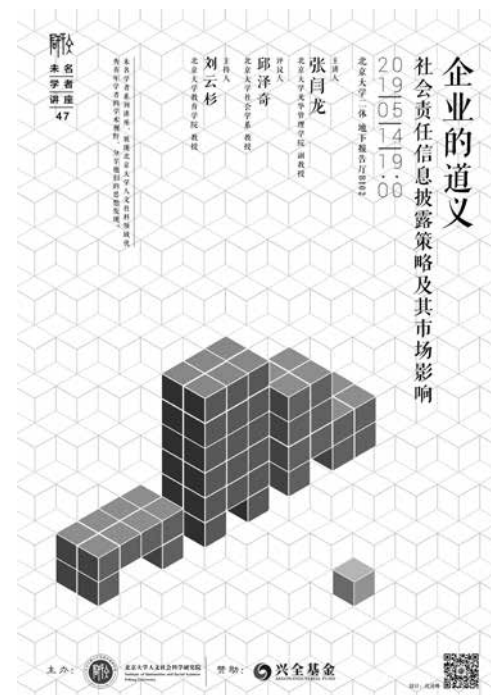
这些举措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责任绩效，另一方面也给企业提出了如何在合规的前提下凸显企业CSR实践独特价值这一新的课题。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企业是否应当践行社会责任一直存在争论。有人把企业当作原子化个体，从它所在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情境中剥离出来，但这种观点忽略了企业的社会性和嵌入型特征。《商人的社会责

任》这一著作认为，企业家应该有自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商学教育，强调商界精英需要关注自身担负的责任，清楚商业决策和社会利益之间的逻辑链条。经济大萧条后，美国企业家对国家权力集中和工会力量产生恐惧，为满足各方面要求，需要分散的股东选择委派职业经理人来代表股东的利益进行日常经营。不考虑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等因素，以上推动了美国企业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和实践。

张闫龙副教授表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十分丰富，在演变过程中，已经由简单的慈善捐赠，变成人与自然、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的目标。例如，对于一个银行来讲，起初只需要满足股东对于利益的诉求，第二阶段是将公司治理目标扩大为兼顾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利益，第三阶段认为CSR也提供和其它利益相关方共同创造价值的机会，倡导环境、社会、经济的统一、和谐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2005年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市场监管机构也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社会责任要求，比如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国有企业披露社会责任实践等。同时，第三方机构制



定出详尽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表现，和促进提高报告科学性的系列指导意见，从GRI体系到ISO26000行业标准，都给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提供了规范性的指导。

在负面激励和正面激励共同作用下，中国企业家已经充分意识到企业的社会责任会影响企业的经营以及短期的利益表现。也就是说，如果企业社会责任做得好，就有一定概率获得市场上的赞美；如果做得不好，就一定会受到惩罚。

除了一般消费者，证券分析师是非常重要的群体。因此，研究证券分析师如何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及其表现好坏，对企业长久盈利具有重要影响。作为证券市场中关键的信息中介，证券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的研究报告以及对相应股票的推荐评级是投资者的重要决策依据。

在他看来，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有两种选择：一为合规，即按要求去做事；二为创新，即自我判断和决定实践的具体路径。企业面临的议题大致分为三类：普遍存在的社会议题，价值链的问题以及影响企业竞争环境的问题。企业无法解决面临的所有社会问题，所以应该实践具有战略价值的社会责任。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寻找公众诉求和企业诉求的结合点，彰显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这也是创造、分享、价值。

对于一个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需要综合平衡形式和内容的考量。首先需要考虑形式完整性，即在议题覆盖的广度上覆盖本行业，本类型企业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对这些重要问题能够进行有效回应；其次是战略性，即判断利益相关方对企业提出的诉求对于本公司的发展是否有战略价值，是否提供了一个与利益相关方一起创造新价值的机会。然后，把不同的利益相关方通过影响力、正当性和紧迫性三个维度进行排列，把企业面临的所有社会议题以及重要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梳理。

张闫龙副教授最后表示，企业需要从证券分析师的视角来研究社会责任活动的市场价值，即运用最优区分理论。对于一个复杂的管理体系来说，一般可以把这个体系分成不同的维度（例如形式和内容），企业可以通过在不同维度上采取合规和差异化的不同策略，达到总体层面上与其他组织相比较而言的最优差异化。

（撰稿：张闫龙）





## 48

## 韩策 | “湘人江督格局”与晚清政治

2019年5月20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四十八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湘人江督格局’与晚清政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韩策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叶炜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忠文评议。

“湘人江督格局”是晚清史上的重要现象，类似于一种不成文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本场讲座利用丰富的晚清档案、书信、日记等史料，解读湘人江督格局形成、维系和终结的历史，探究晚清政治的演变。讲座伊始，韩策老师接着叶炜教授的引言，首先指出，两江总督节制江苏、安徽、江西三省财赋人文之区，手握重兵负责海防、江防，管理漕、河、盐三大政，同治以降又例兼南洋大臣为东南第一重任。因此，江督的人事问题历来都是清朝大政。迨1860年江南大营再次被太平军击溃，朝廷授湘军领袖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是湘军发展和江督人事的重大转折。随着1864年湘军攻破金陵，湘淮军驻扎江南后，江督人选的确定比之前更为复杂敏感。这时，中外关系、南北满汉、文武兼资、湘淮分制、湘系内部平衡，都成为遴选江督时需要审慎考量的因素。

自晚清开始，就有“两江总督非湘人不可”的说法和现象。这也是“湘人江督

格局”提出的依据。该格局虽奠基于湘军的崛起，但最终形成的过程着实复杂多变。事实表明，1864年之后，江督人事极为纷更，并未能形成湘人江督格局。而直到1880年代，亦即湘军攻破金陵十几年后，反而形成了这一格局。

韩策老师随后划分为四个时期，对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梳理和分析：江督纷更年代（1864-1879）、湘人江督的形成（1880-1884）、湘人江督的维系（1884-1904）与终结（1904-19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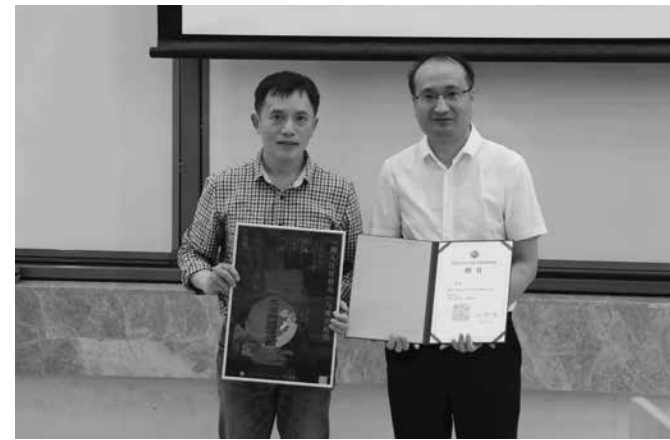
在1864年湘军攻克金陵后，尽管“裁湘留淮”，但曾国藩仍未能稳坐江督。先是剿捻，迨捻军甫平，朝廷又成功将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正如曾氏身边人所说：“江督天下大缺，枢廷、部臣衣食所系，安肯令湘乡公（曾国藩）久居。”若非1870年接连发生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和江督马新贻遇刺案，曾国藩很可能再也回不去江督之任。从1864年进入金陵，到1872年去世，曾国藩“七年三往返”，可谓受尽了折腾。

可见，这一时期部分督抚虽然权力增大，但朝廷仍握有任命调遣督抚的大权。清廷高层的基本政策是尽力阻止曾国藩坐拥江督要任，防止其“打江山后坐江山”，尾大不掉。1872年曾国藩去世后，江督替人颇为难得。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湘系都希望影响江督的任

用。而清廷在有限的选择中大体秉持两项标准：一是进士出身而非军功起家，二是非湘非淮，希望既能保证听命于朝廷，同时又可兼顾湘、淮。但这使得江督不仅实难得人，而且动辄得咎，加以丁忧等突发因素，遂使短短七年里，实任和署理江督者竟多达六位——何璟、张树声、李宗羲、刘坤一、沈葆楨、吴元炳（数次署理）。湘人江督格局此时自难形成。

接着，韩策老师指出，湘人江督格局形成于1880年代。当时中俄因伊犁问题有爆发战争的可能，中日因琉球问题也关系趋紧，东南海防形势严峻。在此背景下，朝廷选择文武兼备但相对弱势的湘系大将刘坤一出任江督。不过，因朝内派系斗争、南北洋角逐及湘系内部分歧，刘坤一很快不安于位。在左宗棠、曾国荃、丁宝楨都有希望的情况下，清廷最终选定当时在京师处境尴尬的左宗棠。慈禧太后对左宗棠说：“尔向来办事认真，威望素著，不得不任此重寄。”1881年，左宗棠走马上任。

左宗棠虽然任期不长，但他的一系列举措明显加强了湘系在两江的地位，有力促成了湘人江督格局。首先，左宗棠利用中法局势紧张，江南淮军被大量抽调的机会，迅速招募湘军旧部，很快成立二十多营，一举改变了此前江南驻军“淮勇居十之七”、淮多湘少的局面。其次，不断引湘籍文武官员。最后，左宗棠还大胆向



叶炜教授为韩策助理教授（右）颁发聘书

朝廷举荐江督替人，包括湘系督抚杨昌濬和曾国荃。

1884年左宗棠病辞江督后，清廷任命安徽巡抚满人裕禄署理江督，但此举立即遭到多方面的严重质疑。因此，尽管很不情愿，但由于中法战争的严峻形势及李鸿藻系统的暗推，慈禧太后最终还是勉强任命熟悉军务、威望素著的曾国荃出任两江总督。而在此之前，不用在金陵立功的曾国荃出任江督，实为多年来的秘策。曾国荃到任后，借着战争形势，延续左宗棠大募湘军、引用旧人的举措，同时还尽力结交满洲权贵，继续扩张湘系在两江的势力。经过左宗棠、曾国荃的相继经营，湘系在两江地区的军政实力大为增强，“湘楚旧部，视若家乡”，加以长江中下游会党的蠢蠢欲动，终令朝廷不得不有所顾忌。此外，随着李鸿章淮系在北洋的坐大，清廷最高层也开始有意扶持南洋地区的湘系以保持湘淮、南北的平衡。在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江督“选帅必于湘人”，湘人江督格局进一步巩固。

因此，1890年曾国荃去世后，尽管王文韶、张曜出任江督的传言甚盛，但清廷最终却在湘人刘坤一和谭钟麟中选择。刘坤一之所以脱颖而出，除了自身的能力、经验和威望外，受惠于更受慈禧太后信任，且与主政的礼亲王、荣禄等满洲亲贵颇有交结。刘坤一到任后，延续曾国荃的做法，尽量与北洋保持正常合作，不仅稳定了东南大局，而且共同支撑了清朝的统治。但突然降临的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国内外局势。此后，淮系迅速衰落，刘坤一及湘系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加以外人压力越来越大，江督一席更难另换新手。所以，己亥建储前后，尽管屡被参劾，刘坤一却屹立不倒。庚子事变中，清廷向列强宣战，而刘坤一却领导“东南互保”，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巡抚一度均由湘人担任，湘系在两江的权势达致顶峰。但这对于清朝和慈禧太后来讲，实在太不正常也不能接受，所以东南湘系遭到裁抑势所必至。

1902年刘坤一去世后，湘人江督尽管还延续了几年（魏光焘、李兴锐）。但在1905年魏光焘、夏岷、潘效苏、聂缉槩等湘籍督抚相继罢官后，湘系遭受毁灭性打击，湘人江督于是终结。究其原因，固然有湘系自身的种种问题，但辛丑回銮后清廷的集权政策以及北洋袁世凯势力强势南下，“专与湘人为难”，也加速了湘人江督的终结。与此相伴随的是北洋下南洋的持续进程。1904年底，具有淮系和北洋背景的山东巡抚周馥署理江督，是一个明显的转折。周馥上任后裁撤湘军、引用北洋旧人、使用北洋模式推行新政等一系列举措，不仅加速了湘军的衰亡，而且初步形

成了北洋下南洋的局面。此后端方、张人骏出任江督，这一进程仍在不同程度的推进。韩策老师另外提到，湘人江督的终结与北洋下南洋的持续影响可以延续到辛亥革命后。从辛亥革命中南方民党兴起到东南的北洋势力退却再到二次革命后北洋军攻占长江中下游，北洋下南洋的进程经历了波折后更有力推进。此后多年，两江核心区始终掌握在北洋直系手中。最后，韩策老师从“同治”和“南北”的角度简述了晚清政治格局的平衡和演变作为报告的总结。

报告结束后，马忠文研究员做了精彩评议。首先，他高度评价了韩策老师的晚清政治史研究水平，接着就左宗棠短暂督江的奠基作用、周馥的北洋和淮系双重身份、庚子前后军机处斗争影响下的地方势力争夺和慈禧太后的统治平衡术等话题进行深入分析。马忠文研究员还从方法上谈及本场讲座的启发，如书信材料的精细使用在政治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和难点，政治史研究“虚实相间”与“妥协”基调的把握，线性铺陈与视角转换的关键点，强调政治史的推理要近乎实际，结论要经得起常识的推敲等等。随后，韩策老师就上述话题与马忠文教授做了进一步交流。提问环节，听众朋友还提到了两江总督与上海道的关系、驻扎江南的湘淮军的指挥权以及端方的派系归属等问题，并得到了两位老师的详细解答。

（撰稿：赵静涵）

## 49

### 纳海 | 灰尘的旅程：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与生活中的“洁净”

2019年5月28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四十九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灰尘的旅程：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与生活中的‘洁净’”。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纳海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英语系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主持，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评议。

讲座伊始，纳海老师给听众们播放了两段视频。视频选自英国广播公司BBC改编自狄更斯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的同名电视剧，展现了小说中泰晤士河上的拾荒者和价值连城的垃圾山两个画面，由此，纳海老师开始探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文学中的“洁净”与“污浊”。

纳海老师首先梳理了英文中“尘”（dust）和“土”（dirt）的具体意义。dust本指“颗粒”，继而延伸出“尘埃”与“垃圾”的含义；dirt本意为“不洁之物”，也可指代街上的泥土或马粪。包括“灰”（ash）在内，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之中类似的词语，不仅指代实际生活中的不洁之物，也往往喻指道德上的卑鄙。纳海老师以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1813年）和盖斯凯尔夫人的《妻子与女儿》（1864年）为例，说明维多利亚英国文学（尤其是乡绅故事）中，中产阶级小姐的闺房往往被描绘得窗明几净，并点出这种“洁净”



纳海助理教授主讲

与品德或身份间的暗合。

纳海老师向大家展示了莫奈的名画《国会大厦》（1903年），提出其画面的朦胧很可能是真实再现了英国当时的尘霾。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空气污染严重，下水排污系统原始，甚至还在沿用中世纪的尸体处理法。恶劣的环境促生了卫生技术改善的需要，也带来了漫长的社会改革，纳海老师探讨的问题是，作为现实主义小说家的狄更斯如何回应和参与这些社会卫生改革。

接着，纳海老师以十九世纪英国的各类文献和资料为例，从垃圾回收、排污系统、烟尘控制、殡葬设施、医疗消毒等角度，详细介绍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的环境状况和卫生改革。比如，英国当时的幽默杂志《笨拙》（Punch）1848年曾刊出《肮脏



的母亲河泰晤士》( *Dirty Father Thames* ) 一诗。诗人直接把泰晤士河称为“恶心的粪坑”( *vile cesspool* ), 表达了人们对卫生条件的不满和政府改善环境的愿望。英国插画家克鲁克相( *George Cruikshank* ) 创作于1831年的讽刺漫画《人民健康至上》( *salus populi suprema lex* ) 也反应了当时马桶和排污系统落后的问题。由于城市人口激增, 人类的粪便不能全都用作肥料, 积攒的排泄物经过渗水等过程直接污染水源, 催生霍乱, 让穷人的生活受到了巨大的影响。随后, 纳海老师举英国改革家查德威克( *Edwin Chadwick* ) 的《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调查》(1842年) 为例, 以说明当时平民窟积粪成山的恶劣卫生条件, 并由此展开分析政府卫生改革所面临的层层阻碍。卫生改革过程漫长, 受到教会等各方利益集团的抵制, 难以推广和实施。泰晤士河甚至被称为“最大最脏的下水道”, 而英国直到1865年才开始兴建比较现代化的下水和排污系统。

继而, 纳海老师介绍了十九世纪英国的掘尸现象。恶劣的卫生条件和巨大的人口数量也带来了死亡人数的激增, 然而墓地非常有限, 常常需要反复使用坟地, 掘墓挖尸来下葬新尸体, 死人与活人之间出现了生存空间之争。当时的人们认为, 埋得较浅的尸体, 往往会生出病毒, 散发瘴气( *miasma* 或 *effluvia* )。这种气体会散播病菌, 促发恶疾, 这即是著名的“瘴气说”。其时, 远处郊外的公墓尚未形成, 又由于医学解剖的需要, 伦敦出现了许多骇人的盗尸案——《狄更斯与人死的事》( *Dickens and the Business of Death* ) 一书即涉及了这方

面的问题。在当时, 尸体似乎变成了一种商品, 计件或按尺寸售卖, 甚至还有尸体的进出口贸易。纳海老师举例说, 狄更斯小说《双城记》中的杰瑞·科朗奇( *Jerry Cruncher* ) 就是做尸体生意的, 人称“搞复活的人”( *resurrection man* )。小说中, 尸体则被称为“科学商品”( *scientific goods* )。沃尔克( *G. A. Walker* ) 于1839年出版的《墓地见闻杂录》具体记载了伦敦墓地的紧张, 通过反复掘尸, 1200个尸位竟埋葬了1-1.2万人。

随后, 纳海老师继续介绍。因伦敦多雨而街头往往堆积马粪, 路面泥泞不堪, 从而有“扫街人”( *crossing-sweeper* ) 这样的职业, 他们专为有钱人扫马路, 以赚取小费为生, 《荒凉山庄》中的乔( *Joe* ) 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常与有钱人打交道, 这类角色在小说中往往担任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 萨克雷的小说《沙姆小姐的丈夫》( *Miss Shum's Husband* ) 就以这样一个扫街人为主角。纳海老师说, 在十九世纪的英国, 现代社会正在形成, 这个过程也反应在卫生改革之上, 洁净的城市正在渐渐地产生, 垃圾收集慢慢由政府或私商等专人接管, 万国博览会等大型活动, 也促生了供穷人使用的公共厕所和公共浴室。

然后, 纳海老师从名为《大都市的末日》的灾难故事转入探讨“肮脏”、“洁净”与道德的关系。这个故事由道德批判开始, 继而指控现实中恶劣的卫生和环境条件, 最后虚构发生在未来的雾霾灾难。类似于圣经的启示录, 小说展现出一种末世观( *apocalyptic vision* )。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 似乎洁净不但可以指品

德高洁, 而且还带有某种宗教意味, 它是“通往神圣的必经之路”( *the next to Godliness* )。

纳海老师指出, 洁净与肮脏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他在自己编辑的杂志《家常话》和《董贝父子》、《小杜丽》、《我们共同的朋友》等小说中都写到了相关的问题。《董贝父子》中, 狄更斯对比了卫生的肮脏与道德的腐败: 空气的污浊是可见的尘埃和雾霾, 如果人们道德的败坏也像脏东西一样, 世界会有多可怖。《小杜丽》这部作品出版于1855年, 作品中描绘的社会也是满街道都是灰尘和泥土, 且空气污染串起了书中的许多情节。《我们共同的朋友》是狄更斯生前发表的最后部小说, 连载于1864-1865年, 这部全景小说以作家诺尔斯( *Knowles* ) 创作的《驼背》和《女儿》两部作品为基础, 其中许多的主人公都与垃圾和拾荒有关。主人公的父亲即是一位拾荒者, 小说中的“垃圾山”和肮脏的泰晤士河形成了一组意象, 推动情节的发展, 展现人们“追求物质-消费物质-丢弃物质-回收物质”的过程, 也为小说提供了道德批判的空间。小说中的河上拾荒者, 以在泰晤士河里打捞废品为生, 若捞到尸体, 报官即可获得酬金, 但拾荒者往往会偷走尸体随身携带的财物, 做死人和废物的生意。

小说中鲍芬夫妇作为管家继承了主人的垃圾山而成为富翁, 是废物打造出的拾荒金人。垃圾在小说里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意象, 而是十九世纪英国的具体现实, 是当时的生态, 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可以让读者对小说少一些隔碍。垃圾在小说中是

一种隐喻, 它成为了一座山, 让人仰视, 引人前往朝圣, 既是废物又是物质财富的化身。小说中的人物为了这种财富勾心斗角, 宛如达尔文所描绘的生态系统, 看似平静的大自然中充满了你死我活的残忍搏斗。小说里也出现了洁净, 例如暴富的鲍芬夫妇会去贫民窟做慈善, 把那里变得清静而整洁。同时, 小说中多次出现关于复活的情节, 有的人物死而复生后, 获得净化后的新生; 有的人“复活”之后, 觉得自己再也不会死亡, 又变本加厉地作恶; 贝拉小姐的道德新生, 鲍芬先生佯装的道德败坏。这些“复活”故事, 似乎都与物质变成废物而再次成为财富的过程, 有某种暗合。

随后, 纳海老师引用了英国前首相帕麦斯顿对肮脏的定义, 即肮脏“只不过是东西放错了地方”( *nothing but a thing in a wrong place* ), 来帮助大家理解小说对“洁净”与“肮脏”的呈现。最后, 纳海老师说, 在他看来, 狄更斯最终并没有信服于虚无主义和丛林法则, 小说的结尾展现出一定的秩序感。但狄更斯也似乎告诉我们, 这种秩序感可能是暂时的, 清洁的过程也许需要漫长的重复, 小说也就在整个社会人群的你一言我一语中结束。

演讲结束后, 张辉教授对讲座做出了精彩的评议, 他首先称赞说纳海老师的讲座让他这位狄更斯迷重回课堂, 并指出讲座中的“洁净”与“灰尘”本身即带有一种反讽, 随后他举狄更斯小说《远大前程》为例, 提出其中肮脏的上流社会, 泥沼中的美德, 垃圾站般的豪宅等内容, 均可以纳入关于维多利亚文学中的洁净与肮脏的

讨论中。最后，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韩敏中老师、高峰枫老师以及在场的同学们积极发言，就英国文学中的掘墓、霍乱、达尔文主义等话题进行了精彩的互动和研讨，

讲座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落幕。

(撰稿：涂辰宇)

## 50

### 董昭华 | 全球化进程中的东方——以日本近代发展为例

2019年6月3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东方：以日本近代发展为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董昭华副教授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袁明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文莉评议。

讲座伊始，董昭华副教授紧承袁明教授的引言，介绍了以日本近代金本位制造

择作为切入点的原因。一方面，以英镑为基础的古典金本位制见证了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另一方面，在一战前以英镑为中心建立的世界金本位体系中，日本既是唯一主动加入的亚洲国家，也是唯一成功地在金本位体系中从边缘迈向核心的后发展国家。

然而，对于明治时代的日本而言，追赶发展阶段对资本的大量需求与金本位制下外部平衡优先的“游戏规则”存在着根



袁明教授（左）主持、董昭华副教授（中）主讲、朱文莉教授（右）评议



本上的矛盾。日本是如何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实现追赶发展的？本次讲座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并分以下三个部分进行了探讨：一部分介绍金本位制的历史与逻辑，第二部分阐述产业发展战略与日本金本位制的建立，第三部分分析“金脚镣”与日本金本位制的实践。

#### 金本位制的历史与逻辑

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起源于英国的金本位制开始向其他欧洲国家、甚至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扩展，成为了世界普遍通行的货币制度。截止到1908年，中国和波斯是仅存的银本位大国。正如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所指出的，国际层面的国际金本位制与实力均衡体系，与国家层面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和自由主义国家，共同构成了19世纪的世界文明的四大支柱。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可以清晰地观察到金本位体系的市场逻辑和权力逻辑。一方面，金本位制的“游戏规则”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在金本位体系下，各国外部平衡的目标优先于内部平衡。这种金本位制下对于政府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限制，被艾肯格林形象地比喻为“金脚镣”（Golden Fetters）。而另一方面，金本位体系中的等级结构也体现出其权力逻辑。一些实行金币本位制或金块本位制的国家通过将自己的货币作为其他国家发行货币的准备金，成功地越过了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完成了货币制度的整合，构建了一个具有“中心—外围”结构的货币圈。

#### 产业发展战略与日本金本位制的建立

对于日本而言，日本于1987年借助甲午战争赔款建立了金本位制，一面进行以扩充军备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另一方面脱离亚洲银本位货币圈，转向以伦敦为中心的贸易市场，开启了在海外市场融资的新阶段，堪称‘脱亚入欧’的经济象征。

然而，与其他国家金本位制的建立相比，日本金本位制的建立有其特殊性。通过考察日本国内19世纪末期有关货币本位制度的讨论，不难发现金银之争的本质实为产业发展战略，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贸易和金融的国际取向之辩。

银本位制的支持者认为，银价下跌为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提供了发展机遇，是日本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进一步促进出口产业的发展，银本位制较之金本位制对于日本具有更加重要的



战略意义。然而，金本位制的支持者则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动力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他们认为，为了强化军事实力，充实产业基础特别是发展重化工业，必须从欧美进口大量的武器和机械，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因此必须采用金本位制。

### “金脚镣”与日本金本位制的实践

对于日本等其他处于世界金本位体系边缘的国家来说，维持金本位制的运行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金本位制下对海外贷款的持续需求是由慢性贸易逆差造成的。战争、日本对外扩张的庞大开支和金本位制的采用都是引发慢性贸易逆差的原因。

为了解决慢性逆差带来的通货紧缩压力，缓解国内经济发展和军事扩张之间的矛盾，日俄战争后，日本严重地依赖国际贷款来缓解金本位制度下的慢性逆差。然而，这些贷款大部分都没有运回日本国内，而是以“海外外汇资产”的方式存放在伦敦（1919年后大部分转向纽约）。海外外汇资产在日英金融合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避免了造成借出国的金融市场波动，也为日本募集国际贷款创造了积极的外部条件。日本金融史学家马克·迈茨勒（Mark Metzler）曾言，“金本位可以被视为金融领域的日英同盟（1902--1922）”。

在金汇兑本位制的框架下，日英实现了紧密的金融合作。正如日本政治家、法律专家金子坚太郎所言，甲午战争之后，日本选择了扮演“远东宪兵”的道路，即“英国提供后方支援，提供机械和资本；日本则负责组织人力和企业冲锋在前。双方通力合作，共同开发东方的富饶资源。”

在评议环节，朱文莉教授就本次报告的主题“全球化中的东方”做了进一步延伸。首先，就全球化这一概念而言，如果将一战前的第一次相互依存时代视为准全球化时代，那么在当今全球化出现反弹和逆转的趋势时，对第一次相互依存时代历史经验的研究能够增进对于当今全球化时代的理解。其次，就东方这一概念而言，具有远较地理意义更为丰富的内涵，至少可以包含三层含义，一是经济的落后，二是文化的隔膜，三是在国际体系中的被动性。因此，对明治时期日本有条件地追随国际体系变革，并实现从边缘到核心的赶超的经验研究，对于理解日本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具有突出的意义。

在问答环节，董昭华老师就两战之间日本金本位制的重建、日本经验对当今全球化与发展的启示、日本地域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问题回答了提问。最后，袁明教授对此次讲座进行了精彩总结，指出本次报告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清晰地梳理了日本在全球金本位体系中的发展脉络，对于揭示国际体系中东方与西方、核心与边缘的关联性提供了有益启示。

（撰稿：董昭华）

## 51

### 田天 | 如何重建一场葬礼——西汉遣策的用法与读法

2019年6月11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一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如何重建一场葬礼——西汉遣策的用法与读法”。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田天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邢滔滔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评议。

“遣策”即出土于墓葬的随葬品清单。既往的遣策研究，在名物制度上取得了颇多进展。在此基础上，遣策研究也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作为一种文献，遣策具有天然的复杂性：是出土文献，参与丧葬仪式，也是随葬品和墓葬的组成部分。同时考虑以上三个特征，遣策就成为一种与葬礼本身直接相关的文献。

遣策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清单，一般而言，并非阅读的对象。报告以三个例子，尝试说明遣策应该、并且可能被阅读。第一例通过“偶人简”，讨论如何系联随葬文书。“偶人简”即遣策中记载随葬偶人的简册。与战国遣策不同，西汉遣策中“偶人简”比例颇高，与随葬人俑的对应关系清晰稳定。而且，不同于记载偶人穿着的战国遣策，西汉“偶人简”多记载偶人身份与执掌，有的还会记载偶人的名字。记录偶人名字，看似没有实用功能，却正是理解西汉初年遣策的切入点。“偶人简”并非单独使用，而与“告地策”相配合。

两类文书存在的时间基本重合，而且，目前发现的“告地策”，从格式、内容上均与“偶人简”有所关联。二者配合，是模仿秦汉户籍迁移文件中移书与记录具体信息的牒，将墓主人与奴婢的户籍移至地下。在“告地策”与偶人简建构的世界中，死者持有合法文书所进入的地方，具有与地上世界相同的秩序与规范。

第二例以马王堆汉墓M1与M3遣策为个案，尝试通过细读遣策重建葬礼流程。墓葬中记录随葬品的“文字资料”，并非颠扑不破的整体。马王堆汉墓中记载随葬品的载体，首先可分为遣策和签牌两类。遣策内部，又可区分为小结简牍和记录单件随葬品的简册。简册内部又有字体、有无勾画符号之分。文字资料性质不同，在丧葬礼中书写、使用的环节也不同。

M1遣策中编号195、201、214的三枚竹简，有指示特定随葬品位置的记录。核以墓葬出土的实物，相应位置均有遣策记录的随葬品，唯数量不能吻合。这说明简文书写早于入圜，是一种设计，而非实录。这三枚竹简所载的器物，多在北边箱案上。北边箱模拟宴饮场景，是一个“礼仪空间”。因此，遣策规划时单独列出了案上食器。马王堆M3小结牍87/104有“不足十六买瓦鼎锡涂”数字，记录了随葬品筹备中的异常情况。通过疏通“贵”字的读法与分隔符的意义，可以复原与之相关联的遣策

书写和随葬品准备的过程。

出土文献研究中，遣策往往与随葬品单线对应。事实上，遣策的每一部分内容，都携带有丧葬流程的信息。遣策的书写、使用，随葬品的筹备、清点、入圻，是两厢交错的动态过程。遣策背后，是实际行用的“礼”。

第三例从遣策中“衣物简”到衣物疏的变化，讨论西汉丧葬礼仪流程的变化。江陵凤凰山 M8 遣策中，记录衣物的“衣物简”独立于记录其它物品的遣策，自成一卷。西汉初年其它遣策中“衣物简”的书写，也都具有特殊性。借助《仪礼》所载丧葬礼流程，可知“衣物简”的核对和使用都在大敛之前。其它遣策，则在入圻仪式中进行核对，与《仪礼》所记的“读遣”礼相吻合。西汉中后期，记录多种物品的遣策变为主要记录衣物的衣物疏，放置位置也从边箱转入内棺之中。置于内棺的衣物疏在大敛前即被封存。入葬过程中，随葬品清单不再使用，“读遣”的环节也因此取消。由此，遣策从公开的仪式中退出。遣策对生者的展示意义淡化了，与死者的关联更为直接和单一。

丧葬礼仪由物质和仪式两部分组成。考古发现所展示的，是所有物品各归各位、所有仪式尘埃落定的完成态。而丧葬礼之“礼”，则是一种“行事”，是动态的过程。遣策的意义远超随葬品清单，它们应当被识别为一手的礼仪类文献。重建遣策的礼仪功能，有可能带领研究者走出礼书的框架，回到丧葬礼仪具体甚至琐细的行事现场，将“完成态”重新还原为一个过程。

数十年来，与先秦秦汉信仰相关的出



田天副教授

土文献数量有了极大增长，带来了诸多新知识。通过不断增加的新发现，如何拼合出更完整的图景？如何更深刻地认识并描述早期的信仰世界？答案并非不言自明，知识的累积并不意味着认识的深入。只有尝试提出新的问题，才能盘活一批材料，使它们真正进入史料的范畴。通过发现新的史料，则有可能打破现有的边界，丰富史学研究的面貌。

在评议中，吴飞教授讨论了遣策的命名与《仪礼》的关系；遣策功能的变化；遣策载体从简到牍变化的原因；“读遣”的功能等问题。田天副教授一一进行了回应，并与在场听众就西汉遣策的发展、随葬偶人的身份、“礼”与“俗”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撰稿：王诗瑜 审校：田天）

## 52

### 程凯 | “群众创造”的经验与问题——以《“穷人乐”方向》为案例

2019年6月17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二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I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群众创造’的经验与问题——以《‘穷人乐’方向》为案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程凯主讲，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姜涛评议。

讲座伊始，程凯老师对《“穷人乐”方向》做了简要介绍：1944年底晋察冀边区高街村编演以村史为素材的十四场话剧《“穷人乐”》，其成功经验被树立为群众创作的“方向”；此后，发动群众自编自演一度成为解放区群众文艺运动的基本模式。程凯老师指出，研究《“穷人乐”》这样的群众（集体）创作案例，不同于分析一般作品，需将其视为一个“事件”，把创作、编演、推广的整个过程放置在一系列历史、社会、政治、思想的语境下来思考，逐一梳理其生成的多重条件。

首先，在塑造、扭转群众文艺创作的形态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后来被逐渐“文论化”所造成的印象不同，《讲话》是一个实践性、行动性文本，它有着超出文艺的思想与政治指向，构成整风运动之后以“群众政治”改造革命政治的关键一环，只有在整风运动的整体构造中才能理解《讲话》的针对性。它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艺工作者的理解、心态和工作方法——他们是在新的群众

政治的整体要求和氛围下带着自我改造的意识去做群众文艺工作。

程凯老师概括，《讲话》有两个支撑性命题 一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二是“文艺为政治服务”。具体而言，“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是《讲话》的“第一要求”。它集中且正面处理了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如何突破现代自我惯习与革命结合的问题。在毛泽东那里，这构成衡量知识分子是否革命的首要标准。之所以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置于如此重要地位，与中国共产革命的特殊构成有关：中国共产党从性质上讲是无产阶级政党，但其核心力量来自于启蒙主义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新青年”群体。因此，共产革命一直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有效把自己的社会关注视野真切扩及工人阶级和新青年之外的广大中国社会，并在面对这些社会阶级时，不再只是一般性地宣传、灌输、启蒙，而更着眼在他们身上挖掘革命动力”。这意味着，革命者与工农之间，不能只是一种单向启蒙关系，而应是彼此双向辩证的启蒙关系。中国的先进分子、知识青年唯有先经过逆向的自我改造，才可能承担起改造中国社会的重任——“只有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为此，为了让革命者意识到有向群众学习的必要，构造“群众政治”的一个认识路径就是强调群众本身有创造力、有办法、有力量，革命者的使命在于把群众的办法和力量集中、结合起



来变成自己的力量。由此形成“群众路线”的政治认识论：人民群众才是政治的主体，工人阶级的政党只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

《讲话》的另一支撑命题——“文艺服从于政治”——在新时期后曾广受批评。但在其本义中，要害在于这里所说“政治”的旨义和用法。《讲话》中区分了两种“政治”：一种是“少数人的政治”，即“贵族的政治”、“政治家的政治”，它的特点是维护自身权力，是特权式的、把控式的；另一种则是“多数人的政治”，它是解放式的、赋权式的，务使更多的无权者被接纳、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由此形成的“政治”才更有力。所谓“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命题中，文艺要服从的是这个多数人的、解放的政治。更具体地说，在整风运动的语境中，“政治”不是一个领域化的政治或政党权力，而是一种处于自我改造中的革命政治状态。文艺是要参与、结合到这一革命政治的自我改造中发挥作用。至于“文艺”的位置与作用，毛泽东也有其特殊的理解。他基本认为文艺没有本源的创造性，“生活”与“文艺”是原料与加工的关系，而“革命”具有本源的创造性，因此，文艺需要结合进革命的具体工作，作为工作的一个环节来发挥作用。相较于左翼文学在生产形态上不自觉地遵循现代文学生产体制，《讲话》则某种程度上带来文艺生产方式的颠覆，暗含着文艺创作去作品性、去作者化的倾向。所以，《讲话》后文艺实践的主流是提倡群众创作，大部分作家都搁置了作品性创作。像《人民文艺丛书》收入的解放区文艺代表作大部分是小剧本、故事、评书一类有待二次加工的宣传式作品，

那些完成度较高的经典创作不仅少，且并不被鼓励。

在阐述了如何理解《讲话》的思想逻辑和展开方式之后，程凯老师回到当年群众文艺运动的历史现场，结合《穷人乐》排演中留下的一系列珍贵照片，多方位还原了《穷人乐》诞生的历史、社会条件，其编演、创作过程和对应的工作经验。

《讲话》之后群众文艺的兴起是与一整套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紧密配合。这时期，群众路线的一个首要方法是挖掘普通劳动者中的先进人物，树立典型，总结经验，带动中心工作。“《穷人乐》方向”的主角陈福全，就是晋察冀边区一个办合作社的英雄模范。其所在的高街村紧邻阜平县，地处根据地核心地带。长工出身的陈福全于1944年接手高街村合作社，通过向区社借款，救济灾户，帮助村子渡过春荒，为合作社赢得了声望。其在办社过程中有一系列工作经验与创造。《穷人乐》编排的初衷即是推广其办社经验（第一版即名为《高街合作社》）。

1942-1943年晋察冀开展的新合作社运动，目标是在抗战最艰苦的状况下发展生产、救助民生，并在实践中发展出灵活机动的组织生产方式。合作社发展起来后，不单是生产经营机构，且能承担起多方面的公共服务功能。之前，战争对基层的压榨、汲取使许多村政权沦为支应、派差、征粮、纳税的工具，原有乡村“会”“社”调节生产、救济贫困、公共服务等功能付之阙如，导致乡村自我修复功能的破坏。新合作社的兴起，在村政权之外打开一个空间，接续了“会”“社”传统，不仅能发挥经济功能，更能助力文化复兴，使乡村逐渐恢复生气。

这一复兴，不依赖传统乡绅，而依靠出身贫苦的群众带头人。陈福全堪称其中代表。

程凯老师认为，《穷人乐》虽然被宣传为群众集体创作，但实际上起到核心作用的是抗敌剧社的几位编导（汪洋、林韦、张非等）。由于长期活跃在根据地，抗敌剧社有着丰富的、面向乡村群众创作的经验。1943年文艺整风后，其创作方式

更调整为配合劳模宣传的编演真人真事，摸索出一套专业编导与英模、群众三结合的“集体创作”形式。像《李殿冰》、《戎冠秀》、《李国瑞》等都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而《穷人乐》则标志着他们在“向群众学习”的方向上再迈进一步，由“演真人真事”变成“真人演真事”，借由陈福全自己登台演自己的契机，创造出一种新的排演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编导能够耐心而高效地引导、帮助老百姓克服心理障碍，自编台词、设计动作，学会“在舞台上生活”。其过程中，尤其重视随时要抓住群众自己的创造、表现，不能轻易用编导的套路去约束群众。如果说这些从未演过戏的老百姓能够完成编演并有所创造、发明，其体现的恰好是编导们在排演实践中对“群众”的创造性理解和创造性调动。

从《穷人乐》的编排过程出发，程凯老师引申出两个问题。一是这部戏的“内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故事情节”而是如何做群众工作。《穷人乐》不单纯是合作社工作的图解，由于它将工作还原到人的关系性中



程凯研究员

来表现，带出的是蕴含在工作方法、措施中人的关系的转换与再组织。剧中对陈福全工作的表现，着重突出其如何与带着形形色色要求的群众互动，体现着照顾各方、相互扶助的乡里传统。

二是群众演戏的“实验性”。《穷人乐》中没有现代戏剧意义上的“人物”或“角色”。剧中的人们其实无法从群体关系中抽象出来，具备所谓“性格”，进而形成“矛盾”、“冲突”，发展出一般戏剧必要的“情节”。戏台上人的关系就是生活中人的关系，其言行、其“事”也是现实劳动、工作中“事”的再现。这种看上去未经充分加工的搬演，恰好保留下乡村生活原有的关系性，诸种与老百姓生计息息相关的工作正依托于这样的关系性发挥作用。同时，“表演”的演员与“观看”的观众也未真正区分开，其一致性正是此种“演”与“看”得以成立的基础。这种不像“戏”的戏不自觉地构成了对已领域化的“戏剧”与“戏剧性”的挑战，将现代戏剧拉回某种戏剧发生的原初状态，重现那种“戏”和“事”、“角色”和“人”、“演员”

和“观众”尚未完全分离状况下的“演戏”。

在《穷人乐》首次演出引起轰动后，面对如何“提高”，产生了争议。最终，为了遵循《讲话》“沿着群众前进的方向提高”的原则，编导们决定坚持群众自演的方式，同时检讨了第一版时否定群众提议、删去新旧对比戏份的“错误”。重排后的《穷人乐》，不仅补上了表现抗战前村民被“喇嘛逼租”的场次，并且将抗战后根据地政府历年工作——减租、军民合作拉荒滩、民主选举和反扫荡等——等都表现出来，使得《穷人乐》成为一部通过村史反映根据地发展全貌的农民史诗。其呈现的新政权带动下旧村庄一步步变化的过程特别体现出根据地民众的“翻身”不是一次运动的后果，老百姓的命运是随着根据地历史的起伏、斗争而逐渐与新政权交织在一起。此过程也正是“新的人民”生成的过程。

最后，程凯老师谈到，《穷人乐》是当年群众创作的一个理想样板，如果客观分析群众创作的实际，还需要结合一般状态的考察，并分析了造成后来乡村戏剧运动遭遇瓶颈的几重因素，尤其是群众政治从以群众路线为主到以群众运动为主所带来的变化。

讲座结束后，姜涛老师发表了精彩的评议。他认为，程凯老师回归《讲话》原点的梳理具有导论性质，为理解《穷人乐》，以及程凯老师近年来集中关注的赵树理、柳青等人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历史结构。讲座中处理的一系列问题，如树立英雄模范的工作方法、高街村内部的变化、合作社的作用、戏剧的编排和演出等，既不是背景式的，又并非平行的，而有高度相关性，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内在结构，即如何理解“群众路线”

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的群众路线非常强调上下内外的高度配合，诸如英雄模范、合作社等线索涉及的是，从社会内部生发出来的力量如何与革命相配合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遗产。另外，关于《穷人乐》戏剧“内部”问题的讨论也非常精彩，程凯老师配合图片，讲解了《穷人乐》排演过程中关于戏剧改编、人的状态变化等特具活力的经验。从中可以看到，革命文艺不断修正关于戏剧、关于文学、关于文艺的边界，为它们提供新方向的过程。而这在四十年代的国统区，曾经带给郭沫若、茅盾、朱自清等人很大的震动，这种震动不仅使他们感受到了解放区文艺清新质朴的特质，还在其中捕捉到革命文艺的实验性，并由此展开了思考新文艺的路径。最后，姜涛老师提醒大家，讲座结尾颇有余韵，具有反思性，关于《穷人乐》所代表的群众文化如何转化的问题，可以放在群众文艺、革命文艺展开的内在困境中去思考，而“《穷人乐》方向”中所展现出的群众政治、群众运动，以及群众创作内在的针对性与迫切性，提醒我们思考：一个真正好的社会，应当如《穷人乐》方向所展现的那样，是一个由干部群众上下内外、高度配合，充满内向凝聚力的社会。

在互动环节，现场师生就群众创作的问题与困境、群众政治、群众运动与社会活力的关系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讲座在现场听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撰稿：程帅）



### （三）北大文研论坛

93

#### 刘迎胜、林梅村、荣新江 | 多文化语境中的夷夏认知



2019年5月10日，“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多文化语境中的夷夏认知”。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的十余位相关学者出席并做主题发言。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著名元史学者刘迎胜担任本次论坛的召集人。

论坛正式开始前，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为刘迎胜教授颁发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聘书。随后，刘迎胜教授为论坛作简短引言。他认为，夷夏认知研究目前成为热点，反映了社会对当代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身份焦虑，并投射了近百五十年来中国内地边疆关系的重新认识和再思考。从学理上讲，讨论民族问题不仅要参考苏俄与西方国家处理和看待国内各民族差别的方式，更应该考察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参与构建并塑造国家的过程。刘迎胜教授指出，与会学者各自专注的时代和领域均与民族问题有关，组织本次论坛的目的也在于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讨论。

#### 上半场

论坛上半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姚

大力作引言。他以“土官、土司与改土归流：羁縻体系的演变”为题，回顾了历代边疆治理的制度和成果。他认为，元明清时期的土官、土司来源于唐宋时期的羁縻体系。姚大力教授回顾了唐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机构和格局，并根据治理据点的疏密程度划分了南北不同的羁縻区域。他指出，南方羁縻区域与北方羁縻区域演化的方向大不相同：南方较早地被驯化，并被稳定地纳入汉唐国家版图之中。有关农牧分界线以西的广大地区的治理问题，则要求汉唐以外的国家建制体系来解决。

姚大力教授就此提出问题：为什么当时的汉文明未能有效巩固中国西北部的疆土？经过分析，他认为，当时的军事弹压和行政管控体系缺乏本土化的经济支持和文化响应，也未能有效完成人口的迁入。中央输血一旦终止，这些地区就会沦为“化外之地”。学界就此划分出汉文明和非汉文明的历史区域。

对照当代中国边疆的情况，姚大力教授分析了临边土司和不临边土司的情况。刘统关于唐代羁縻府州的研究涉及了中央对羁縻地区的管控方式，其中包括册封朝贡、军事弹压、佐军从征、与华官参治、



输租赋五个方面。但姚大力教授认为，后两项的成立存在问题。此外，在唐人看来，羁縻府州在与朝廷的关系中居于和藩国一致的地位。由此看来，羁縻体系在一国之内的君臣关系和“天下结构”中不平等的国家关系间摇摆。至于羁縻体系内部为什么存在不相同的演化趋势，姚大力教授认为，这与农牧分界线所反映的不同地理背景有很大关系。最后，姚大力教授简要梳理了羁縻体制的演变路径，介绍了建制隶属关系的变化过程，并对土官制度的源流进行了思考。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的发言题目为“中古入华胡人墓志的书写”。他通过对墓志的分析，揭示了胡人和唐人观念的改变。历史上的“胡人”概念通常包括整个北方的游牧民族和西方王国，在此则用于笼统地指代整个西北民族，如墓葬风俗与中原截然不同的粟特族。荣新江教授以史君墓为例，简要介绍了墓葬形制与墓主人的身份背景。他指出，史君墓可能是赏赐性的西北民族首领墓葬，虽有棺槨，但整体形制与传统中国墓葬不同，处于粟特葬俗和中国葬俗的过渡阶段。墓志铭文以汉文和粟特文双语书写。可以看出，刻碑者对汉文并不熟悉，粟特文部分清晰完整、篇幅较长，说明粟特人的文化环境相对封闭。通过对墓志文本进行具体分析，荣新江教授还发现，墓志在涉及粟特人的情况时使用了中原士大夫的名词和概念，体现了粟特人的民族意识和汉化过程；早期墓志则保留着粟特语的影响。

此外，荣新江教授还介绍了突厥人与波斯人的墓葬案例。突厥语墓志较为鲜见，

通常是用于填补汉族士大夫所留下的空白。而与经商居多的粟特人相比，进入长安的波斯人以贵族为主，也更倾向于在墓志中保留自己的出身。以晚唐苏谅妻马氏墓为例，其墓志用中古波斯文和汉文书写，且所用波斯文的语言文字系统与波斯地区无异。荣新江教授总结，这种民族的书写一直持续到中晚唐，宋代则基本没有见到类似的情况。

党宝海副教授的发言围绕元朝的“各从本俗”政策展开。元朝是一个多族群国家，存在着不同的文化观念与行为方式，其间差异尤其表现在婚姻、丧葬等社会习俗。因此，当时的文化层面存在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两种立场。前者具有排他性，认为文化有高下之分；后者则认为应给予基本的尊重。党宝海副教授认为，元朝基本采取了相对主义的态度，推行“各从本俗”的政策。如汉人官员照常实行“丁忧”制度，但这一习俗不适用于蒙古人和色目人等其他民族。

除“各从本俗”外，元朝有关社会风俗进行的局部调整还包括了温和与强硬两种绝对主义政策。党宝海副教授介绍，“温和的绝对主义政策”表现为向另一个族群提供可选择的习俗政策，即给一个民族加上统治地位民族的生活习俗。他具体分析了元朝在汉人当中推广收继婚制的举措，指出当时对决定守志归宗的妇人给予一定尊重，并说明了“不得收继”的例外情况，因此收继婚制是可选择、非排他性的习俗。但汉人妇女再嫁时，其夫的兄弟有优先权，这体现了绝对主义的一面。党宝海副教授认为，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汉人的

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强硬的绝对主义政策”主要反映于跨族群交往所需要的规范。族群间发生冲突时，或采用二者之一的规范，或形成新的规范进行调整。党宝海副教授以“禁止穆斯林用传统方式宰杀牲畜”的政策为例，认为这种绝对主义政策反映了元朝当局不彻底的“相对主义”文化观，也体现了他们通过肯定己方文化、尊重蒙古权威以强化统治的意图。党宝海副教授还指出，元后期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随着族群接触和相互影响的深入，在不触动统治族群（即蒙古族）基本道德伦理的前提下，人口主体族群（即汉族）的道德伦理的影响力逐渐增强。族群间共识的形成也催生了新的政策和规范。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沈卫荣的发言主题为“何谓‘西番中国’——释西夏文献中的‘西番中国’和它与西藏历史叙事中的‘吐蕃僧诤’的关系”。他首先指出，“夷夏”其实是汉民族的概念。而对于西藏地区，十二世纪的“彻底佛教化”之后，他们按照佛教概念书写历史，并将非佛教地区视作“化外”。因此，西藏的历史构建从印度开始并包括了几个相邻的地区，但并未把中国的传统王朝视作具体的民族。

接下来，沈卫荣教授介绍了出自西夏文献的“西番中国”概念。学界对此词汇存在诸多讨论。他认为，“圣地中国”到“西番中国”的转变反映了西藏人对自己历史定位的建构，并介绍了“吐蕃僧诤”这一西藏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当时的西藏文化同时受到印度和汉地的影响，不同的传统

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印度佛教和汉地禅宗佛教为此进行了一系列辩论，以决定藏传佛教的“正宗”。根据西藏佛教文本记载，吐蕃僧诤之后，汉地的佛教传统自此被排除出西藏地区，禅宗及其代表人物也在藏传佛教中被妖魔化；随着莲花戒等人在论辩中胜出，印度佛教的教法成为藏传佛教的显宗和正统。沈卫荣教授认为，“西番中国”历史定位的建构实则是对文化传统异端的清算。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他的发言主题为“元大都西镇国寺考——北京高粱河畔藏传佛教寺院调查之一”。林梅村教授援引元明史料对元大都西镇国寺的介绍，简要说明了西镇国寺的基本情况，并在文献中寻找和确认西镇国寺的具体位置。西镇国寺是元大都最早的藏传佛教寺院，其中供奉着忽必烈的华盖及察必皇后的遗容。根据元明时期流传下来的相关史料，考古工作者大致确定了西镇国寺的方位，并在实地考察中通过具体发现确定古代地标，进一步缩小了西镇国寺所在的可能范围。

对于西镇国寺的“前世今生”，林梅村教授提到，该寺如今仅残存一座白塔，目前位于中国画院之内。他展示了一系列实地照片，对考察该塔的过程进行了详细介绍，并说明了这一元代佛塔造像形式的特殊性。根据佛龕上的宗教造像，结合南宋遗民郑思肖的文献《心史·大义略叙》，林梅村教授分析了元庙佛像的特征。此外，林梅村教授还展示了其他地区的佛教造像，就此对佛像的不同类型进行区分。

接下来，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交流。沈卫荣教授简要提及密教和本教在仪轨上的巨大差别，并回应西藏为何需要确立佛教“正宗”的问题。姚大力教授再次强调了地区驯化与不同制度之间的关系：被纳入中国版图的羁縻地区多以农业为主，非农耕地区的驯化则更多地源于后来的制度结构。同时，他表示，羁縻体系之下地方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也存在差异——北方地区还维持着不平等的国与国关系，南方则逐渐进入到郡县或州县系统之中。

## 下半场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乌云毕力格的报告主题为“蒙古语文在清代西藏”。13至14世纪的蒙古人及其帝国对中央欧亚历史的影响非常巨大。但是，在后蒙古时代的若干个世纪中，蒙古人及其文化因素的影响并未和帝国烟消云散——在欧亚政治和文明领域里，它无处不在。正因如此，蒙古学在中国西域研究乃至中央欧亚历史研究中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学术领域。17至18世纪的清代西藏，蒙古语文同样发挥过中介语言的重要作用。

乌云毕力格教授基于自己在西藏档案馆收集的资料和长期研究，提出了几点认识。第一，历史上，女真和西藏没有直接接触，文化上较为陌生，满洲上层接触西藏佛教是通过蒙古人实现的。清朝蒙满贵族政治联合，语言互通，清初时关系尤为密切。因此，清朝和西藏建立联系伊始，蒙古人和蒙古语文便成为两者间的“金桥”。第二，清廷对藏地的统治主要通过佛教政治文化以及与西藏僧俗精英的合作实现，而后两者对清朝在西藏的统治至关重要。

在朝廷和西藏地方僧俗精英的沟通方面，又是蒙古人和蒙古语文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在清朝治藏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三，清朝皇帝推行“同文之治”，满汉蒙藏回诸语言文字并用，皇帝亲自学习诸语言文字。以圣旨、诏书、敕谕为首的文书语言不拘一格，不强推“国语”“清字”，讲求实际，体现大国“同文之盛”，蒙古语在西藏“大显身手”就是一例。第四，中国的历史文化是由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蒙藏关系源远流长，蒙古人和蒙古文化在西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这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多元文化互相影响和作用的重要证据。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带来第七场报告，主题为“十六国北朝的六夷”。罗新教授指出，欧洲的中世纪史基本就是欧洲民族主义的摇篮——有了欧洲中世纪的框架，才有了欧洲在16、17世纪之后形成的民族主义。如今在西方，恐外、恐他的心理蔓延地非常广，特别是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中世纪史的研究也被加强。这与中国的中古史研究相似，我们所理解的、培育的思想，都可能对现实产生影响。夷夏问题既敏感、迫切，也很危险。我们可能把自己理解的错误的观念当作历史知识去错误地讨论、传播，甚至影响到如今有些过度的民族主义倾向。

罗新教授认为，五胡是在唐代被错误发展出来的历史观念。“胡”在战国末到西汉末期，基本是匈奴的专称。到了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时，胡的指称发生了转移，来自中亚地区的与华夏人面貌大不相同的人。其法律地位较低，多以奴隶身份存在

于中国社会中。十六国时期，有一个畿纬流行，即认为有五个胡人将会对政治传统造成重大的挑战和冲击。五个胡人基本上是有确定的人群对应的，即那些推翻西晋政权的人。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就泛指那些非华夏人。直到唐朝发展出“五胡乱华”的思想。夷夏之辨的历史观念就是从唐朝中后期发展起来的。这并非意味着此前没有人群之间的分别，十六国时期，与夏人对应的就是六夷。当时的六夷八蛮都是泛称，在北魏时期已经有了这样的称呼。

罗新教授指出，夷夏以及对其他民族的理念感受对当时的个别政权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有，也是政治上的意义，而非文化意义。一个人群是夏是夷，不一定和文化有关，而与现有的国家体制之间的关系分类有关——边缘位置的就是夷，中心位置就是夏；非完全的国家臣民就是夷，完全的国家臣民就是夏。但是，为什么有些已经被纳入国家统治的人，仍然被称为夷呢？事实上，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在利用他们夷的身份。边疆地区的非完全的国家臣民，在承受越来越多的国家义务的时候，没有受到完全的国家保护，而这一点对地方政府有利。罗新教授再次强调，夷夏问题，不是文化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现在的族群文化观念上讨论夷夏问题是危险的、错误的、有害的。

本次论坛的第八场报告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带来，主题为“元代蒙古人汉文碑传反映出的民族交融与隔阂”。树碑立传其实是汉族的文化传统，直到蒙古人到了中原地区后受到汉族的影响才开始树碑立传，草原的蒙古人仍然没有树碑

立传的习俗。那些到了汉族社会生活的蒙古人，除了极少数高级大臣，没有机会回到草原埋葬，就开始考虑在当地树碑立传。如今流传下的材料多为多神道碑、墓表、先茔碑等，可供后人瞻仰的墓志铭等较少。此外还有功德碑、庙碑、德政（遗爱）碑等。在世祖时期，发现了如今最早的蒙古人碑，即史周卿《丞相伯颜公功德碑》。到了忽必烈以后，元成宗时期，王恽利用朝廷封赠的机会，为自己家族三代祖先立了碑。到了武宗时期，很多人开始利用政府给祖先封赠的机会立碑。

但是这些碑文中也体现了很多文化隔阂的因素。张帆教授总结，“写的人不懂，懂的人不看”。蒙古人多把材料直接给他人写，写完后也不会检查，所以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错误，甚至有把祖先的辈分写错、刻串行等。更有意思的，很多碑文对于应该着力宣扬的历史信息没有着力宣扬，甚至把这些信息全部丢掉，包括民族信息，先祖信息等。此外，蒙古人碑文也体现了很少在汉文碑文中体现的“秉笔直书”的写作特色，十分值得研究。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正寅带来第九场报告，主题为“清朝的‘内’与‘外’——从一条辫子说起”。清朝的政治话语中有很多特殊的地方，如内外、新旧。刘正寅教授从清朝关于辫发的政策开始，讨论清朝的内外语。清朝入关后要求民众辫发，在民间造成了剧烈冲突。清朝为什么要强制推行发易服？在努尔哈赤看来，语言相通是最基本的认同；即便语言不同，只要以服发为体征的文化相同或相似，仍可产生同类相恤的认同意识。这可能是努尔哈赤在对外战争中



不断强迫明朝与朝鲜投降者都要推发易服的原因。但是，由青海至西藏，清朝在西番地区并没有推行推发易服。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推广到天山安南北，清政府甚至反对当地人推发易服。但针对汉人和南方少数民族，即便到清朝晚期，仍然非常严格地执行并强制推发易服。

对此，刘正寅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清朝推行推发易服的标准是什么？刘正寅教授认为，推发易服的标准基于清朝的内外之分，内包括八旗与直省（故明），外包括外藩（版图内外藩 / 藩部、朝贡外藩）。凡属于内，就要推发易服，凡属于外就不需要。当生藩变为熟藩，就应该推发易服。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华涛带来第十场报告，主题为“唐以后中国‘夷夏观’的大势——兼论中古阿拉伯文献中的东方及《突厥语大辞典》中的桃花石”。华涛教授认为，自我本位的立场，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中会很自然的表现出来。但是秦汉以来，有很多非汉民族进入中原地区，甚至统治整个中原。事实上，唐代以前，并不存在“非汉”这样的叙述。直到唐代的《阙特勤碑》中，出现了最早的“非汉”叙述。但是与其中的汉文碑铭的历史叙述不同，突厥文碑文中突出了不同的事实。突厥文叙述强调了突厥地位，对唐朝的抱怨也相当明显，甚至表现出了痛恨。在相关名号的使用上，也可以看到两种不同文化本位的叙述。对于这一现象的不同解释是，基于不同的文化本位，一般人往往从中接受对于自己有利的记载而忽视不利的记载。

华涛教授指出，在中古阿拉伯文献中，

一般把中国当作很重要的东方实体。在突厥语大辞典中，我们可以看到桃花石被定义为“喀什葛里：华夏伟大”。当时，阿拉伯地区与中国地区的交流较少，其对中国的认识多是出于对远方的想象。

但是在东方的中原地区情况却大有不同。唐以后一千年中，中国民族关系的特点是，北方非汉王朝在中原地区占有强势地位。唐以后人住中原的北族政权，一方面和以前一样都自称“中国”，另一方面努力保持与汉人的区别。而一千年民族关系的结果，就是以汉法治汉地，以非汉法治非汉地。边疆地区在非汉法治理下，自我认同不断加强，从而出现了辛亥革命之后的景象。辛亥革命成功后，如何处理各自特异的文化，甚至如何处理汉与非汉民族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文研院第六期特邀访问教授、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刘迎胜带来本次论坛的最后一场报告，主题为“无远弗届——蒙元世界帝国各族人士视野下的内与外”。元代与清朝相似，也是北族入侵中原所建立的朝代。从元代的政治话语中，我们或许能够得出关于夷夏的一些见解。蒙古、色目等统治上层对元朝疆域的描述，多是用“从日出地至日落地”形容的。唐以降，两宋羸弱，在汉地人民记忆中的历史盛世只有汉唐两代。故元时的普通汉人、南人，多通过对比汉唐来了解他们生活的国度之辽阔程度。刘迎胜教授举出两个例子，说明蒙古上层对疆域的认识有向下的传导机制。岳飞后代与南人吴莱对疆域的叙述已经与蒙古人相似。由于国家领土远超汉唐，对于超越汉唐的地域，历史上就有了一个新

名词对此加以叙述，即“大西”。在这样的地域视野下，夷夏观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传统认为属夷的（如渤海人、女真人等）人群在元朝都成了汉人。色目阶层（如维吾尔人、回回、吐蕃等）也不再属夷。此外，蒙古统治者在元代起名时有一个特色，即不用夷名，多以“囊台”（蛮子、南人）、遥远的国度、部落为名，却没有任何贬义。这些地方或在蒙古疆域之外，或曾被蒙古人打败。

基于上述三个现象，刘迎胜教授总结，蒙古人往往是从中心和边缘的观点来看待

疆域。“夷”在元代仍有出现，但是往往出现在汉人笔下。1340年代，在也门编写的六种语言对译的词典——《国王字典》中，居然出现了蒙古语。这或许体现了成吉思汗时代的夷夏观与历史上的夷夏观是很不同的。刘迎胜教授认为，出现这种变化可能有两个原因：统治者身份发生变化、统治疆域持续扩大。

（撰稿：陈洁樱、王诗瑜）

## 94

### 阿来、汪晖、沈卫荣 | 边疆社会的文学镜像

2019年5月20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四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边疆社会的文学镜像”。来自文学、历史学、哲学、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的多位学者，与作家阿来展开了有关“边疆”文学创作的热烈对话。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少雄主持本次论坛。

郑少雄首先对作家阿来和本次对话主旨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希望促成跨学科的对话和冲击。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

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求真”不同，文学创作虽然也具备现实主义基础，却因虚构和想象而具备特别的价值。阿来的文学作品，基于西南边疆与藏区 / 藏族的历史、文化、制度、宗教、神话、传说，却远远超出了文学作品的范畴。从阿来的众多文本综合来看，藏族 / 藏文化的形象和地位不断发生变化；阿来本人的立足点及身份认同亦时常在一条光谱上——从嘉绒藏人、康巴、藏族、中国人、到全人类往返变动；对于汉藏关系处理的历史智慧和未来可能，阿来也自有其独特的洞见和引申。由此，郑

少雄提出本次对话的三个议题：第一，文学作品为学者理解边疆/民族带来什么？第二，社会科学思考如何刺激作家的边疆/民族书写？第三，当代知识分子如何在跨学科的情境中共同理解“边缘”与“核心”关系的多种可能性？

随后，阿来就“为什么要写作”展开引言。他坦言自己与同时代或因现实的困境或因高远的理想而写作的人不同，从一名普通的农村青年到一名普通的教师，再到一名真正的作家，阿来也经历过写作迷茫期，但推动他继续写作的，是他对于自身所处大地、所感历史文化的追问与思考。他认为，写小说要回答自己的一些问题，而不是成名。他的第一个基本追问来源于对宏大历史叙述的质疑，他发现本地、本文化、本部族的历史文化在宏大叙事中缺位甚至空白，于是开始查阅官方典志、寺院经典、土司史志，采集神话、传说，梳理关于嘉绒藏人、土司制度、央地关系的编年历史，从而构建起对于自身所处历史

文化的基本认识体系，再将情感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共同置于文字之中。第二个基本追问是对新旧的质疑，随着解放、民改、集体化、人民公社化、“文革”再到改革开放等一系列运动的展开，藏区旧的东西被统一对待和处理，不同民族和文化被推着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并迈向一种“终极意志”，人们如何应对新旧交替、如何成长？他成长与生活在这样的交替中，也推动阿来进一步思考与创作。

接着，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谈及对《尘埃落定》的两点深刻印象：一是现代文学的批判传统，二是区别于东方主义叙述而充满了时代氛围和气息。但汪晖由《瞻对》展开更多关于历史叙述与真伪问题的探讨。他谈及胡适和鲁迅对于上古史的理解是两种不同的思路——胡适腰斩古史，而鲁迅则试图在《故事新编》中重新理解古史——本质的问题都是证明古史是否存在，而《瞻对》一书也涉及历史重构与叙述的问题。阿来回应到，《瞻对》

与《尘埃落定》的写作方法一样，通过下“笨功夫”，挖掘史实，剥离传说，厘清清代土司的脉络，从而构建起清晰的历史框架和知识系统，致力于回答个人、族群、地域的基本问题，以达“知所从来，知所从去”。他指出，在解释历史尤其是西藏、新疆的历史时，将过分的想象与现实的负载加之于历史叙述之上，都是不可取的。

“《尘埃落定》不是少数民族文学”，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沈卫荣如此评价道。他从藏学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追问如何以更好的方式来表达西藏。在他看来，文学的刻画和再现，会创造出一些想象和形象，进而固化读者对西藏的印象。如《失落的地平线》这部小说几乎塑造和影响了整个世界读者对于西藏的想象，即使内容与西藏无关，很多人仍然如“香格里拉的囚徒”一般维护着这种想象。从这个意义来讲，《尘埃落定》不是少数民族文学，因其用汉语文字书写藏区故事，没有刻意自我东方化，从而超越东方主义叙述方式，拥有比少数民族文学更为深厚和宽广的内涵。沈卫荣教授也提出，一方面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对西藏的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全球化因素对于藏区的同化也逐渐加深，我们该如何表达西藏？

阿来分享了自己从事《科幻世界》编辑工作时的经历，他认为，传统文学多集中书写个人、地域、民族、国家，但文学不应只局限于这些概念。他批判文化保守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越保守则越趋于虚构传统，过分强调认同则更趋向“认异”。对于一些人来说，“西藏是个形容词”，人们在心里会希望存在一个与现在这个世界相反

的另一个世界。但文学创造不应止于此。他的小说与科幻创作一样，可以偶尔超越到第三个层面：人类。而汉语则是表达自我与超越自我的一种桥梁。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张志强则对阿来的身份及其写作之间的关系表示好奇。阿来作为嘉绒藏人，不同于一般人类学的“他者”刻画，而是采用一种内在视野，书写自己的历史，但又没有因身份认同而带来创作的困扰，又具备了某种人类意义上的书写价值，也具有一种方法论和未来性意义。阿来谈到，从《格萨尔王》的历史书写与传递来看，13世纪的版本更为质朴、更有力量；越到后来就越繁复、越雷同，缺乏对历史的回应，反而具有很重的佛教说教意义。当英雄人物格萨尔王突然对一切感到厌倦了，该怎么办？所以，书写历史，也要建立在新的探索与理解基础之上。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刘文楠副研究员则分享了《大地的阶梯》带给自己的强烈震撼。她梳理了历史写作的脉络，认为中国历史书写贯穿了一种循环、永恒的历史观；而西方实证史学则以外在观察者的身份要求对历史进行科学的观察与定位，采用单线的、进化的时间观。后现代的历史反思，使得书写者在书写历史、表达历史时具有先入的主观意识、先设立场，从而具有很强烈的当下感。而《大地的阶梯》则不仅能够印证历史，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唤起历史——以“我”的在场，邀请历史人物回到现场，与历史形成一种互望的同时又具备了一种未来感，从而形成交互的时间轴，将过去、当下与未来整合在同一个维度里。汪晖亦补充道，历史的客观



与会嘉宾合影



性是近代才被构建出来的，他认为历史学的客观性训练是必要的，但维持所谓客观叙述的霸权已经没有必要。在阿来看来，小说的历史虚构也是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之上，但当代中国历史的叙述充满了当代性，这种不自觉地具有意识形态层面的当代性已然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王娟从社会学的角度谈论文学作品对学者理解边疆和民族的意义。一名社会学学者能够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文化习俗等方面来理解边疆与民族，却无法内化文学的、非理性的、弥漫着神秘色彩的氛围和感觉。王娟提出，身份与认同是内在的，阿来作为嘉绒藏人，是否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与文学创作有过思考？对此，阿来回应到，文学书写必然涉及身份与认同，但有些是不言自明的，刚开始创造时就是感受，没有思考这些关于民族、国家的概念与问题。反而是作品面世后，知识系统与学科把这些概念附加到作家和作品的身上。他认为，要警惕这种被附加的东西，尤其要警惕文化多元化。好的文学应该如美国学者、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说的那样，具有审美的光芒、认知的力量与智慧。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张帆则从人类学与民族志书写的角度进行表达，如何写出有趣的民族志是现代人类学家面临的困境。90年代以来，人类学内部转向边缘地域与边缘群体，而边缘与中心书写则是两种不一样的叙述侧面。她认为，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世界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是宇宙性的。《机村史诗》则为书写民族志

提供了一种进入方式和叙述切口。阿来回到，机村故事源于土司制度破裂、国家制度建立之后的村庄历史。他追问的则是人们的思想以及地方性是否还有保留独立性的可能。现在需要警惕的是地方机构为了打造旅游刻意构建更强的独特性。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对《瞻对》内容与撰写方式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前三分之一的叙述方式给人一种编年史的错觉，作家通过民间史志、神话、故事与实录的对勘，形成非常细致的编年史研究；而之后则转向神话、传说与部族等内容。在他看来，实录记载中的中心人物在叙事中也是转圜的关键，如何从奏章语调走出来，复原背后的感受？阿来认为，即使是奏章、实录，字里行间也透露着情感，对于历史人物的理解，则应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情感之中进行理解。

最后，郑少雄总结到，一位作家的到来，刺激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于作家与文学作品的感受与认知，使得文学创作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间产生了交互与共鸣。本次论坛从文本出发，包括但不限于《尘埃落定》、《格萨尔王》、《瞻对》、《机村史诗》、《云中记》、《三只虫草 / 河上柏影 / 蘑菇圈》、《大地的阶梯》等作品，并且根据各自研究的旨趣和关切，探讨既有身份认同下与大的社会结构互动，反思文学创作与社会、与历史叙述之间的关系。总体来看，文学与社会、与历史的关系，既有其摹写、映照的一面，也有超越、反思与指引之功。

（撰稿：李玉蓉）

95

## 荣新江、葛承雍、王永平、冯培红 | 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与物种传播

2019年6月12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五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与物种传播”。与会学者包括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文研院邀请学者、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冯培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葛承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永平，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李肖和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教授张铁山。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叶炜担任本次论坛主持人。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各国开展经贸和文化往来的重要通道，见证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物种传播过程，具有深远的物质文化交流意义。随着考古发现和文献研读的日益深入，学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视野愈发拓宽，研究对象也愈发细致。本期论坛的中心内容是，通过考察古代丝绸之路的族群迁徙和物种传播过程，管窥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文化互动风貌，并探求丝路文明交流背后的原因及动力。

荣新江教授首先带来主题为“重议‘月氏与吐火罗问题’”的报告。他对月氏和

吐火罗语的定义问题作了简单介绍。所谓“月氏”，即匈奴兴起前西域的主体民族，其大本营位于敦煌和祁连之间的河西走廊西部，分布范围非常广泛。公元前2世纪为匈奴所败，被迫西迁伊犁河和楚河一带，其中西迁的部族称“大月氏”，留下的少数部族称“小月氏”。后又败于乌孙，被迫再次向西迁徙，占据了阿姆河两岸原大夏的领土。汉文典籍中有关这一民族的最早记载始于《史记·大宛列传》：“人民赤白色，使习弓马。”又康泰《外国传》载：“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也。”由此反映出月氏民族鲜明的游牧性。所谓“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西支，分甲乙两种方言。1907年，德国学者缪勒（F. W. K. Müller）根据《弥勒会见记》中提到的“toγri”语，将这种丝绸之路北道上的印欧语正式命名为“吐火罗语”。然而这一说法先后遭到了列维、羽田亨、伯希和、恒宁等学者的质疑，至今学界对吐火罗语的命名问题仍无定论。

荣新江教授指出，要更好地解决这一争论，必须回到“月氏”和“吐火罗语”所在的原始文本中去。目前有关“toγri”一词的记录散见于10至11世纪的摩尼教文献和佛教文献中，其中前者的成书年代更早。根据文献推测，“toγri”的词源应为“Tuγristan”（吐火罗斯坦），也即

并非指一个具体的西域地点，而是包括龟兹、焉耆、高昌、北庭一带较大的地理区域。其实，真正的“吐火罗斯坦”位于巴克特里亚（Bactria）地区，原本是摩尼教的一个东方教区，等到摩尼教在西域地区开教成功，所谓的“吐火罗斯坦”之称也随之迁移到西域北道。因此，“吐火罗语”应该是回鹘人对此地流行语言的“他称”，并非这种语言的“自称”；换言之，即使这种语言被称作“吐火罗语”，其使用者也不是历史文献中的“吐火罗人”。荣教授最后总结说，人种和语种是两个相差很大的学术命题，不能将现代的概念盲目套用到古代历史研究中。同时，由于西域地区最早流行的语言是汉语，所以在西域研究中应加强对汉文文献材料的搜集和使用。

葛承雍教授以“中古时代胡人财富观念的特点”为题作报告。中古时代的粟特胡人是丝绸之路上典型的商贸族群，在突厥文化、波斯文化和中亚文化的多重影响下，形成了与其他族群迥乎不同的财富观，总体来看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一是快速发财的暴富欲望。一方面，在绿洲邦国间长达数千年的劫掠和征伐下，胡商们对“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财富转移习以为常，自然将“一夜暴富”或“瞬间赤贫”看作生活常态。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就曾对粟特胡人的价值观予以尖锐抨击：“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另一方面，粟特胡人的财富观念也与其商贸活动的特性密切相关。在长期的经商历史中，粟特胡商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并与称霸一时的突厥贵族形成了紧密的共同体——突

厥要借助扩张实现暴富，粟特商团也离不开突厥部落的军事保护。这种竭泽而渔、巧取豪夺的扭曲商贸形式，造就了胡商强烈的占有欲和对眼前利益的极端重视。二是财多为贵的炫富心态。胡人对一夜暴富的渴望，直接孕育了其及时行乐、放纵挥霍的消费观念。敦煌文书记载，长安胡人史婆陀住所中极尽奢华之能事，“梅梁桂栋，架向浮空；绣栊雕楹，光霞烂目。歌姬舞女，纤罗袂以惊风；骑士游童，转金鞍而照日”。除此以外，他们还热衷于通过“亮宝”“斗宝”等形式公开炫耀财富，好胜心之强令汉人瞠目结舌。唐代许多笔记小说对此均有描绘。三是铤而走险后的尽情享乐。丝绸之路上的长途贸易具有极高风险性，可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经常遇到盗贼或敌军劫掠。所以胡商往往采取“环团”措施，由几百名胡商结伴出行，商队首领“萨宝”往往兼任武装护卫职责，传递、串联和控制商道沿线的贸易信息，保障贩运往返的安全。在此种背景下，胡商从不蓄积财富，而是尽情享乐，将商业财富与贵族文化紧密融为一体。四是商业竞争的垄断独占。中国是粟特胡商最大的商品销售市场。初唐到盛唐时期，政府改善营商环境、加强法律保障，为胡人在此经商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粟特胡商针对达官贵人奢侈消费的特性，大量贩运高档物品，牟取暴利；加上其长袖善舞，往往能获得权贵庇护，甚至跻身官途，树立商贸经营中的垄断地位。公元694年在洛阳端门修建的大周万国颂德天枢便有“诸胡聚钱百万亿”，生动反映了胡商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

王永平教授以“‘拂菻狗’：从拜占

庭到中国——兼论唐代丝绸之路上的物种传播”作了报告。拂菻狗又称“罗马犬”，原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宠物狗，唐初从拜占庭经康国转手进献而来。《旧唐书》卷198载：“（武德）七年（624年），（麹）文泰又献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长尺余，性甚慧，能曳马衔烛，云本出拂菻国。中国有拂菻狗，自此始也。”拂菻狗传入唐朝后，又被称为“獬子”，作为供妇女儿童赏玩的宠物狗。许多文学和绘画作品对此多有描述。1972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那第187号唐墓的《双童图》中，就出现了拂菻狗的形象；其他绘画作品如《元师奖墓童子戏拂菻狗图》《元师奖墓拂菻狗扑童子图》等也对拂菻狗有所着墨，且形象塑造如出一辙；甚至在中唐画家周昉的名作《簪花仕女图》中也有两只拂菻狗，它们的出现调和了整个画面的色彩，使其生动而和谐。除绘画和雕塑作品外，拂菻狗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也频频出现，反映

了这一物种在唐代已广为人知。王涯《宫词》曰：“白雪獬儿拂地行，惯眠红毯不曾惊。”成彦雄《寒夜吟》曰：“獬儿睡魔唤不醒，满窗扑落银蟾影。”通过对文字、图像材料的对照可见，拂菻狗自唐初传入中国后，或经繁殖，或再输入，已经扩散到了西州、敦煌、扶风、长安、洛阳、益州、金陵等多地，分布范围相当广泛。

王永平教授指出，中国从域外输入的良犬以西域为主，其中又以波斯犬和拂菻狗最为著名。这两类犬在外形和用途上大相径庭。波斯犬身形高大、性格凶猛，多用于外出狩猎，但也发生过噬而食人的恶性事件。《北齐书·南阳王绰传》载：“有妇人抱儿在路，走避入草，绰夺其儿饲波斯狗。”拂菻狗则以其体形娇小、性格温顺，成为唐人喜爱的宠物狗。两种属性完全不同的犬种经丝绸之路被引入中国，不仅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物种谱系，具有较强的物质文化史意义，更成为后人研究古代中国





与西域地区互动关系的鲜活个案，反映了全球史观背景下民族融合与物种传播的宏大图景。

接下来，冯培红教授带来主题为“从葱岭东西到黄河两岸：中古鱼国人的流徙及其文化联系”的报告。中古鱼国的地理位置，以及鱼国人的族属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与学界普遍认为的“粟特说”不同，冯教授赞同林梅村教授提出的鱼国人属于步落稽人的说法；鱼国也并不在帕米尔以西，而在中国境内的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地区有多条河流交汇，地理位置优越，适合鱼氏族群布局。谢承志（2007）使用了DNA检测的技术方法，推测鱼国位于“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斯坦和新疆的喀什地区”，这跟冯教授所论鱼国人从阿克苏向西越过帕米尔迁徙到漕国的活动地域大致符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冯教授提出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延拓：其一，太原虞弘墓志记载其祖父名字□奴栖（注：□为墓志残缺的人名首字），实际上含有“鱼”的信息，与其担任鱼国首领的身份吻合；其二，“balik”除译为“步落稽”外，还译为“跋禄迦”（即今阿克苏），这对于确定鱼国的位置至关重要。

冯培红教授重点对虞弘墓志的挖改情况作了讨论。墓志文中有两处出现“鱼”字，一为“鱼国尉纥麟城人也”，一为“鱼国领民酋长”。这两处的“鱼”字明显比其他处低凹，显然是经过改刻的。以往考古发现认为，墓志文原来的内容可能是“虞”字，改刻可能是希望在墓志上恢复其本来的国名姓氏。冯教授则认为，从放大的墓刻影像来看，“鱼”字左侧遗痕原为“彳”，

这从最上部的一点呈倒三角形可获有力佐证，故“鱼”字在挖改前并不像“虞”字，冯教授提出应为“漕”字。正史典籍对此亦有佐证，如《隋书·西域传》载：“漕国，在葱岭之北，汉时罽宾国也……国王戴金鱼头冠，坐金马座。”而居于虞弘墓石椁最中心位置的人物也头戴鱼形王冠，与正史中的记载刚好吻合。《隋书》同篇还称，漕国祭祀其保护神“顺天神”的仪式场面宏大，堪称奢华：“仪制极华，金银镮为屋，以银为地，祠者日有千余人。”在这样恢弘重大的场合，亦有鱼形象的出现，“祠前有一鱼脊骨，其孔中通，马骑出入。”凡此种种，都对判定鱼国的族属和地理位置具有关键意义。冯教授通过对顺天神的两度移动，说明了鱼氏族在葱岭东西的辗转迁徙过程。

接着，李肖教授、张铁山教授和陆扬教授先后进行评议。李肖教授指出，以往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关注物物交换，对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关注不足。葛承雍教授有关胡人财富观的探讨，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思路，对后续研究很有启发意义。不过，对于汉文典籍中对胡人的描述也应辩证看待。李肖教授以犹太人在西方世界的形象作比，认为犹太人在整个西方的文献记载中都是形象不佳的，无论从长相还是价值理念，都与欧洲日耳曼人、斯拉夫人截然不同。但真实原因是，犹太人在欧洲并不能从事一般农业活动，更不能从政、从军。因此，他们大多从事商业活动，积累了大量财富，便给人留下了爱财、贪财的刻板印象。粟特胡人的真实情况应该与犹太人相仿，虽然中国人并未将

其上升到原罪的高度，但必定排斥其进入国家政治中心；即使在魏晋之后，粟特人在政治领域拥有了一席之地，也仅限于自治首领的角色。总之，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对于粟特胡人聚敛财富的描述具有一定的夸大成分和歧视色彩。关于拂菻狗，李肖教授提醒注意拜占庭与罗马的差别，拂菻狗未必出自拜占庭。针对冯培红教授的报告，李教授指出“balik”为突厥语词汇，进入塔里木盆地时代较晚，像‘鱼’这样的常用词在本地应该早就有了，提醒注意鱼在东伊朗语中的表达。

张铁山教授表示这四篇论文研究得都比较细致，并对当前历史学研究方法论的不足提出了思考。他认为，近年来历史学研究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可喜成果，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其中之一是对少数民族语言掌握不足，进而造成对异域史料的忽视或误读。老一代历史学者非常重视训诂学和语音学的基础，这一优良传统在新一代学者中却有所淡化，出现了“搞藏学的不懂藏文，搞突厥学的不懂突厥文，搞清史的不懂满文”的普遍现象。近年来学界大力倡导回归语文学，这正切中了当下研究的短板和要害。如果缺乏对少数民族语言起码的认识，很容易造成研究整体误入歧途。正如法国语言学家所说：“最相近的东西可能是最危险的东西。”此外，历史研究还应重视交叉学科方法的应用，如DNA技术等。不久前，汉藏语系研究引起学界广泛轰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使用了DNA技术方法，获得了传统方法所不能企及的新认识、新成就。张教授指出，“balik”作为鱼虽然最早见于《突厥语大辞典》，但同时还

有“城”的意思，要注意突厥语从印欧语借词的情况。

陆扬教授重点对荣新江教授的报告进行了评议。他指出，该研究具有至少两方面的重要价值。其一，该研究间接实现了对丝绸之路学术史的回顾和梳理。任何有关丝绸之路或欧亚文明传播的课题都绕不开大月氏和吐火罗语的问题。欧美和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贡献尤其卓越，但他们各自的方法论完全不同。荣教授重点指出了德国学者和英法学者的不同，其中前者更强调从语文学的角度，对原始文本进行精准梳理；后者则试图将材料放入历史的框架中进行思考和讨论。对于学术史的回顾，本身也是对方法论的反思。随着研究方法和思路的革新，学者们有机会对过去的学术命题，特别是对曾经受到忽视的领域作以重新思考和深入挖掘。其二，历史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反复的，以现代概念对应史实极其危险。例如，以往研究过多强调亚洲内陆的草原性、游牧性。事实上，亚洲内陆早期的塞种人并不是游牧民族，而是定居生活，倡导武士文化；直到匈奴强盛之后，才引起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草原游牧化过程。

提问环节，学者们还就吐火罗语的语种归属、全球化史的时代划分、拂菻犬与波斯狗问题、墓志挖改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精彩互动和讨论。本次论坛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撰稿：毕悦）



96

## 刘志伟、刘守英 | 回到“乡村”：整体性视野与中国社会研究

2019年6月27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六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回到‘乡村’——整体性视野与中国社会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狄金华主持，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贺照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熊春文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狄金华教授对论坛主题进行介绍。乡村在近年来的政策领域被提至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但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乡村的问题与乡村发展是否仅仅就是乡村的问题，或者说它是否仅仅是一个局部性、区域性的议题。这种反思其实承载着我们对将乡村视为中国局部议题的不安，以及对乡村研究仅限于政策研究层面的不满。乡村在中国人的世界中并不只是一个提供食物、贡献的“车间”，它承载着人们理解个人与家庭、家族及国家关系的价值追求，而这些价值的理解与寄托都源自于人们在乡村社会中最基础的生产与生活。正是因为乡村在理解中国整体、安放国人价值寄托上的独特价值，乡村从来就不只是乡村，乡村本身就是中国。

在近年来的研究中，乡村逐步从理解中国整体的镜像转向单面化、局部化，这

一方面与研究者在过于专业化的过程中自身整体关怀的衰落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农业产值在整体产值及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占比的全面下降有关。当农业、农民在整体中的数值化占比下降时，功利主义的思路便自然将承载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的乡村视为一个局部性的镜像。然而，经济的工业化与人口的城市化不仅不能轻易地改变国人的生活逻辑与行为方式，相反，它令卷入工业化与城市化之中的人们焦躁与不安深度暴露。这种在转型与变迁中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及其产生的意外后果，或许促使我们应该重新理解农村在整体中国中的位置，重新反思我们对农村的研究与理解。

刘志伟教授从自己走访乡村的感性认识出发谈及自己的理解。今年6月份，刘志伟教授走访福建、甘肃的农村，发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场景。在福建某县的村庄中，因为缺乏学校，村庄中没有一个孩子，而带孩子去城市里上学构成了家庭的巨大负担。而在甘肃农村青苗会上，孩子广泛参与其中，让人感受到乡村的活力。刘志伟教授基于自己对乡村的观察，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未来中国是否需要乡村？许多农民努力的方向就是走出乡村，这种潜意识会导向一个方向，即中国不应该有乡村。但是中国的基本文化结构、心灵结构、



世界观等却是与大家对乡村的拒绝互相矛盾的。如果我们需要乡村，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乡村？

刘守英教授指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界政界对乡村的讨论是从外部进行的塑造，或者是政府在农村“胡乱作为”，或者是强势的知识分子在寻求话语权。无论是“三农问题”还是“乡村建设”问题，讨论的都不是真正的乡村问题。谈农业，讲的是增产；谈农民，希望解决的是农民上访问题；谈农村，则往往忽略乡村这一基本研究单位。主流政权并不关心农民真正关心的问题。然而在当下，农村“衰而未亡”，我们需要对乡村的结构有高度的关注。

刘守英教授特别指出，我们需要反思

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即乡村内部的有机结构使得乡村能够获得稳定。传统乡村中农村、农户互补，农业、手工业交织。乡村之所以被破坏，往往是因为有外力破坏了其有机结构，使得农民无法负担自己的生活，乡村精英不得不外逃到城镇中去。近代以来，八、九十年代的乡村发展情况最好，就是因为农村开始发展农副业、乡镇企业等，恢复了农村的有机结构。在城乡互动中，也需要恢复这种有机结构。经典的工业化导致乡村危机，乡村本身的产业窄化为粮食和种植业，农村无法与城市形成交换，导致城乡循环的瓦解。我们需要思考与农村有关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式。

刘守英教授认为，农村衰而未亡，而且未来将继续存在。我们需要在这个前提下思考农业、农民、农村的问题。首先是农业问题，相较于入城打工，从事农业回报率低，使得乡村生活没有希望，我们需要恢复乡村有机的经济结构，且绝不能把农业简单地理解为种植业。其次是农民问题，入城农民难以获得城市户口，被动返乡后对乡村结构造成影响。相较于我们原有的认识，无论是留在农村的农民还是返乡农民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需要我们重新了解。第三是农村问题，我们对于目前的乡村自治、乡村产业等乡村形态缺乏正确认识，尤其是在强势政权介入农村之后。最后是城乡关系，乡村是否存在能够和城市交换的物品，是城乡关系发展的起点。

周飞舟教授则从社会学的角度谈农村问题。社会学本身就起于城乡的分野，也就是城市的兴起。事实上，城乡没有真正隔绝过所谓的二元体制，往往是制度隔绝。



在这种分隔最严重的时候，恰恰是农村为城市贡献了大量的粮食和税收，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大量的贡献。以新农村建设为例，让农民住楼房的一个潜在目的就是为城市楼房建设提供空间。

社会学关注人与人、人群。发展到今天，在城乡之间流动的人口已达两三亿。如今谈乡村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工的归宿问题。从生产方式来看，农民工早就不是农民了。但他们对家庭和生活的安排上来讲，他们和城里人仍然不同。当农民工在城里上班时，他们自认为与城里人的区别就在于能否经常回家。他们所希望的、追求的生活方式，不在于他们的打工地，而在于自己的老家。

周飞舟教授谈到了一篇博士毕业论文，其结论是：结婚前后，农民工群体的生活样态有着显著差异。农民工在结婚前过的是城市青年生活，注重休闲娱乐，婚后则一切为了自己的家庭着想。周飞舟教授在甘肃某农村访谈的一位25岁女性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研究。这位女性育有两个儿子，大的七岁，小的两岁。脸上的妆容是城市时髦女性的样子，但目前在丈夫所在的贫困村和婆婆一起种地、带孩子。据她所言，等孩子大到能够上学了，再去打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她陷入如今的境况是为了爱情，事实上，她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一旦这位女性结婚生子，她只能呆在家里。农民工群体有自己的代际循环，在城乡之间来回流动。只有更有能力挣钱或者学习的人能够跳出这个循环。城乡的分别，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人的能力和社会地位的分别。但无论是城里人还是村里人，在精神

层面和对生活的态度层面，并无差异。我们必须关照到这样的群体。

周飞舟教授提到，那篇博士论文还关照了另一种群体，即大龄单身农民工群体。他们没有家庭，被抛出了常规的人生而丧失了生活的意义，只能靠赌博为生。事实上，这提醒我们反思，所谓城市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城市性是随着工业革命产生的一种新的价值理念，包括个体本位、契约至上、对事不对人等价值取向，是有机团结的社会结构下的人的基本价值形态。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的城市只能算城乡，无法“进化”到城市。我们需要把城乡中国这一模式加以严肃考虑。周飞舟教授进一步谈到了中国乡村未来的问题。以费孝通先生对乡镇企业的研究为例，苏南模式是集体的、行政化的，温州模式则完全是家庭型小作坊。费孝通先生认为，这两种模式其实可归类为一种。仔细研究温州模式的家庭作坊，我们会发现，它们都不是孤立的、独立的家庭作坊，而是靠亲族关系联系在一起。而在苏南的乡镇企业的运作和外部联系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的家长制治理的影子。农民之所以认同集体观念，是因为这一观念与过去的宗族观念一脉相承，只是在社会主义的环境下发出了新芽。周飞舟教授认为，中国乡村有着特别深厚的土壤。乡村不亡的道理就在这里了。

周飞舟教授也同样谈到了乡村产业问题。城市工业需求与生活需求需要以乡村副业为基础，这些需求如何通过商品经济的方式得到满足与农村将来的形态有着密切关系。周飞舟教授提到，有些发展得不错的地方，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村庄。一

个产业体系如何在县乡村的三级体系内形成多样化的农业产业链条是我们谈乡村未来的基础。最后，周飞舟教授将关注点重新回到人身上。农民工群体随着年龄增大必须回到乡村。农民回乡是一个生命历程，这些返乡的农民就是乡村的希望。建立县乡村的多样化与有机的经济生态体系需要他们，建立乡村有机的社会关系也需要他们。

接下来，贺照田研究员则从“田园”的角度对乡村问题加以透视。他指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有一种“自在”的精神境界存在，而这种精神境界与乡土有着直接关联。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取得的成功也是把中国人从“土”里拔出来的过程。与这个状态相对的是，我们能否把自己再种回“土”里？以当今中国城市社会形态存在为前提，我们如何让人在生活和工作获得更多的身心滋养与意义感支撑？贺照田研究员指出，田园是理解中国乡村非常关键的因素。

以陶渊明诗为例，贺照田研究员特别强调，以往的研究会认为陶渊明崇尚与人为相对的自然，但忽视了在诗中陶渊明所返回的“自然”乃是“田园”——而田园是人经营的结果。陶渊明恰恰是在人境中生活，并获得了一种“自在”的状态。陶渊明的非自然的“田园”让他感受到“自在”。与之相对的是谢灵运，他一方面拒绝权力的樊笼，另一方面在“山水”中虽能获得一时的饱满、畅发，但不是持久的身心慰安。他最终的归隐兼得山水、朋友之乐，也没有使得他的身心安顿。“自然”和中国人精神、身心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陶渊明的“自然”乃是有着人为参与互动的第二自然。其《拟古》中，通过他和燕子的推己、移情，燕子由“自然”而入“人境”。“悠然见南山”中的南山也是如此，经过陶渊明作为中介，南山既是自然，也是人境和田园的延伸和丰富。飞鸟、山气、南山变成了人境的一部分，使得陶渊明能够以悠然的状态去面对。正是因为田园的中介，而使得他能够心景交融、物我两忘。“田园”逻辑正是对魏晋南北朝的“自然”思想框架的一种突破。

贺照田研究员进一步反思认为，我们如今谈论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并没有把“田园”这一人与自然和谐互动的环节纳入考虑，从而丧失了很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乡村”和“田园”的重要性没有在文学史、艺术史上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发展。今天的中国，作为政策性目标的乡村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在思想上仍无法和自然环境等话语相比。石崇和谢灵运都对权力的樊笼十分反感，但当他们回到自然的时候，依然无法获得心灵的安顿。而如今的旅游开发，就是以谢灵运和石崇的方式展开的，排除了田园的重要性。

接下来发言的熊春文教授从农业社会学的角度对乡村问题进行解读。他指出，农业社会学的兴起与整体性视野有关。二战后，欧美迅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使得农村快速消失，但是，农业问题仍然十分重要，从而出现了农业社会学。如果向前追溯，理论上的渊源可以延伸到韦伯。韦伯《罗马农业史》《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民族国家和经济政策》等作品关注的都是农业问题。他提示我们，农业不仅仅是经济

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更是涉及到文明延续的问题。

熊春文教授以自己与另一位教授合作开展的“科技小院”遇到的问题为例指出，中国农业发展不能只依靠技术。在“科技小院”项目中，教授要求学生生活在农家，进行农业技术试验。由于分田到户造成的土地使用格局，学生们在将零碎土地变成整块土地进行试验时面对巨大的困难。更麻烦的是，很多华北农村的地里埋藏着祖坟，这就更不能轻易对待。如果不充分理解农村，就解决不了农业现代化的问题。人们想要吃饱、吃好、吃健康，绝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

最后一位发言的是狄金华教授。他指出，乡村问题不是通过单纯鼓励农民返乡就能解决的问题。转移支付、精准扶贫等资源回流的方式并不能必然形成乡村复兴——复兴取决于上述要素能否完成乡村社会内部结构再生产的进程。基层治理的关键更在于农村社会结构内部。狄金华教授特别强调需要深入农村社会结构内部，把乡村理解为产业、区域、个体相互勾连的联合体。以他在江汉平原的研究为例，当地农村曾有过围绕房屋地界的纠纷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纠纷越来越少。这是因为当地人曾经把这一片土地当作自己家庭世代繁衍的地方，所以会十分看重地界。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房屋地界在他们生命中的重要性的也就逐渐下降了。房屋地界纠纷的背后，其实是人们对生活秩序和生活价值的理解。

狄金华教授接着以乡村基层治理为例，说明乡村基层治理必须深入乡村内部的结

构。依法治国是在干群关系紧张之后提出的方案，旨在对基层干部造成约束。但是，依法治国的普遍性规则就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这其实破坏了原来的乡村等级规则。当农村原有的等级规则被打破之后，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的规则很重要，从而争论不休。依法治国的“善”没有得到，“恶”却体现得十分明显。“混混治村”现象之所以存在就是以暴力取代原有的农村逻辑，解决用其他方式无法解决的问题。狄金华教授进一步论述他在研究“按户成片”时得到的认识。其实，按户成片解决的不是机械化的问题，而是相互性的问题，即当地农户为自己的土地汲取水源不再需要和其他农户进行协调，从而极大减少了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土地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规则的等级性缺失问题。重新回到乡村治理，我们要处理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业问题和农民生计问题，而是意义价值、社会价值问题。

(撰稿：王诗瑜)

97

## 民族与国家：再思 1950 年代中国民族识别与社会历史调查

2019年7月3日，“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民族与国家：再思中国民族识别与社会历史调查”。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王利平、博士彭桥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王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伍婷婷，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教师何贝莉，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副教授李如东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教授王铭铭、助理教授田耕与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清媚评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教授马戎、教师菅志祥出席并参与讨论。

伍婷婷老师首先就本次论坛作主旨说明。作为中国历史的关键节点，1949年所发生的重要变革不但在当时产生了“新知”，而且对当今的学术讨论乃至民间知识结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学术思想的更替往往并非断崖式的转变，而需要一个连续的过程。为了更加真实地分析1949年前后的转变，并对当下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加以反思，如今的学者有必要以去特殊化的态度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语境下，对当时所展开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再次进行探讨。王铭铭教授补充，近代以来，所有帝国与殖民化国家都展开过大规模的民族志调查，并为此建立专业研究机构。在此背景下，当时参与民族调查与研究的

不仅有历史学等传统学科，也有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新兴学科。本次论坛将主要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识别进行探讨。

王利平老师与其学生彭桥杨带来了本次论坛的第一场报告，主题为“反思民族识别：广西争议少数民族的划定”。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这一概念，是以1950年代起展开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为基础的。而建国前，岭南一带所存在的少数民族边缘群体则经历了被识别与归类的过程，被官方以附近较大的少数民族作为参照进行比对，从而被并入较大少数民族，或作为单一民族获得独立席位。

关于这一过程，学界有“国家视角”与“批判国家视角”两种理解，前者认为少数民族的构建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后者则强调前线学者的知识和思维方式对该过程的影响。从这一分歧出发，王利平老师讲述了三个争议族群的案例：龙胜“伶人”、金龙“傣人”和环江“毛难人”。1958年的文件中，前二者的归属分别被确定为苗族与壮族，“毛难人”则被定为单一民族。王利平老师指出，在认定某一民族是否为“少数民族”的过程中，语言是重要依据，如“毛难人”因拥有独立、完整的语言体系，首先被承认为独立民族；同时，与周遭民



族的关系也影响着独立民族身份的立或废，如龙胜的“伶人”语言与苗人相似，故随后者共同被归入苗族。这一识别方式也会带来争议，如金龙“傣人”并不满足于自身被归入壮族的结果，但总体而言，少数民族对自身身份的界定和认同是在和“权威”的互动中逐渐生成的。

渠敬东教授对此作出了点评。他指出，民族作为现代概念，与现代国家的秩序、主权、自我定位等均有密切关联，但同时也应注意到，西方的现代秩序并不是纯然借助民族国家的概念来形成的。进一步讲，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下区别于西欧民族国家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问题不能局限于从帝国模式中寻求答案。此外，民族识别运动并非单纯由国家意志所主导，而是由国家与知识分子共同进行的、受到整个民国年间学术体系积累影响的运动，对当时的国家秩序与建设影响深远，需要以文化的方式理解与评价。

王娟老师带来第二场报告，主题为“重建‘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叙事：关于近代中国‘民族史观’之形成与演变的社会学考察”。进入近代以来，知识分子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如何接受中国并非天下中心这一事实，并将中国转型为“多民族的民族国家”这一似有内在矛盾的概念？汉本位思想在中国具有连续性，而到了近代，传统思想体系中不同维度的变迁则具有不均衡性。以此为背景，王娟老师将近代以来的民族叙事分为了三种方案。

第一种是清末革命背景下的“民族史”方案。此时，专门的民族史尚未形成。在清末革命思潮与日本史学的影响下，虽然



出现了新兴的、以民族国家为书写对象的国家史，但其内容与汉族史仍高度重合。这一时期的国家史大多涉及及有关中国人种起源问题的讨论，而历史节点的划分则以汉族的兴衰或与其与异族的竞争态势为标准。其中，最早将“民族”二字列于标题的是两部革命派的作品，即刘师培的《中国民族志》与陶成章的《中国民族势力消长史》。第二种是民国时期出现的专门的民族史。这种叙事方案可以追溯至梁启超1906年与1922年专论民族史的文章，其中提出应超越“主权上主族客族之嬗代”的视角，而以“混合”、“同化”的概念去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流变。王娟老师指出，梁启超所言“同化”仍旧以汉本位作为立场，其纲领在于民族混合与汉化，但同前一阶

段叙事所强调的民族竞争与汉族兴衰相比差别很大。第三种是唯物史观下的民族史叙事。吕思勉在《中国民族简史》一书中重新将斗争的视角带回了民族史叙事，但与清末叙事方案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唯物史观下的叙事把斗争看作历史发展的动力。其所言的斗争可分为两种：各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与各民族被压迫人民反抗异民族统治阶级的斗争。这一观点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大汉族主义的理论基础。王娟老师进一步指出，这一理念的进一步延伸，即建国后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其成果《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共有55本，每个少数民族均占其一，在形式上体现了平等，但同时也应看到，调查中对各民族进行的社会发展阶段区分仍然带有进化意义上的等级性特征。而三种叙事模式的内在关联，则是“汉本位”这一立场应如何处理的问题。

伍婷婷老师带来了第三场报告——“书

写白族族性：从民家到白族的汉化问题”。1930至1940年代，对于白族，即当时所称的“民家”，存在着历史、民族志与语言三类研究。历史研究的兴趣在于追溯白族的族源，其共同特征有二：认为民家的血统具有混血性，并通过民家文化中汉化特征古今相似性的对照来建立民家的族源谱系。民族志方面，费子智(CP.Fitzgerald)曾在其作品中指出，民家的独特性体现在其文化特征中，如信仰、风俗、节日等，但同样有人批评道，费子智并未阐明民家、汉人社会与其他非汉人群之间的相似与区别，因而并不彻底。同样，民家的语言也具备许多汉族特征。总之，白族在当时被认为是汉化较深的族群。

那么，为何白族仍在建国后的民族识别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被认定为非汉人群？其身份特征又应如何界定呢？伍婷婷老师指出，通过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调查与讨论，《白族简史》验证了汉族对白



族社会的全方位影响，及白族的民族混融性。这种思路带来了两方面结果：一方面，《白族简史》并不纯粹讲述白族的历史，另一方面，《白族简史》在事实上论证了白族与汉族社会发展相似性形成的历史过程。最终，白族成为官方识别并指定的民族身份后，加之民族区域自治等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其民族意识与自我认同感得到了增强的机会。但仍应认识到，汉化特征始终是白族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汉族与白族的关系则是在互动中彼此界定的。

点评中，田耕老师指出，白族于1954年被确定为独立民族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其背后的动力与机制是值得关注的。此外，在对多民族汇集区进行分析时，可将静态视角与动态视角相结合，注意到非汉族群彼此之间的转化、组合与合并空间。菅志祥老师补充道，探讨民家为何未被识别为汉人这一问题时，可以将其在国家政府管理体系中的地位与纳税身份等纳入考虑，从而为有关历史关系与制度安排的进一步分析提供思路。

何贝莉老师带来了主题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的宗教生活”的第四场报告。报告核心关注如下问题：藏族宗教生活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的体现形式是什么，又因为什么原因而未得到充分展开？有关藏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可追溯至1950年代初，主要进展集中于1956年至1964年，并于此后进入尾声，直至1999年结束。其中，1956年至1958年为主体时期的第一阶段，学术思考活跃、接近原初设想；1958年至1964年为第二阶段，其间民族学全面政治化，转为以政治任务为导向，

调查人员也经历了较大换血。

与调查开展的不同阶段相对应，报告文本的内容也侧重不同。第二阶段，即以1958年至1964年的调查内容为基础的《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宗教”内容已被隐去，而其余经济、政治与法律、生活习俗与文艺等内容则仍可以与最初的“封建社会调查提纲”相互对应。李有义所描述的西藏土地制度下，拥有土地最高占有权的政府处在土地关系的顶端，剥削阶级——寺庙与贵族占据土地管理与经营权，实际使用土地的农牧民、农奴则属于被剥削阶级。这一结构中，政府角色可进一步复杂化，对中央政权与行政机构加以区分。但关键在于，这一结构中并未体现寺庙的神圣性，也未对平民与普通喇嘛的联系与流动加以分析，而仅描述了去宗教化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分析《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可进一步发现，关于寺庙的文本有三种形态：将寺院作为社会组织纳入讨论；以寺庙为线索叙述庄园的土地占有；运用马列主义考察并撰述寺庙的“整体性社会事实”。此外，《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有关宗教信仰的内容则均为间接提及，散见于医疗、宗教支出及自然灾害等其他领域类目，呈现为“宗教”的外延部分。

李如东老师因通过委托代读报告的方式与会，主题是“共同体与阶级：《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的‘阿吾勒’及其知识建构过程之考察”。回顾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提纲，可以发现当时国内的研究者存在分歧：应该将哈萨克社会定义为原始的共同体社会，还是封建的阶级社会？报告以这一张力为线索进行了挖掘。

阿吾勒是游牧民族哈萨克族基于父系血缘关系形成的共同体，其社会组织形态在夏季完善，冬季则离散在各个家庭中。根据1950年至1953年的报告，阿吾勒内部存在事实上的贫富对立、财产集中与无偿劳动，但并不意味着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因为无偿劳动是嵌入在共同体之中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核心工作在于考察少数民族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并从中发现阶级关系。但人类学对游牧民族的认识偏重于“平等主义的共同体”，同时，国内少数民族内部亦无明显阶级属性。因此，调查者需要从中“发现”阶级。1956年的调查中，哈萨克社会的阶级问题成为了核心问题，其封建特征在考察中越发被彰显出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即阿吾勒被认定为具有阶级属性的封建经济组织，其生计传统亦在后来的合作化运动中为公社所借用。阶级化趋势之下，合作化运动改变了牧区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组织形态，打破了原有的血缘关系与人身依附关系，强调关系平等与合作互助，牧民也从游牧逐渐转向定居。简言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结果成为了社会改造的依据，并加剧了社会变迁。

王铭铭教授作总结发言。他指出，民族识别涉及两个关键概念：分类与关系。进行研究时，不应从开始就将研究对象视作预先设定的民族实体，而应“把人当成人”来从实求知。正如英国人类学家盖尔纳（Ernest Gellner）在1976年《人类学在科学中的地位：西方和苏联的看法》会议中所指出的，“ethnography”的“ethno”在西方与苏联有着不同理解——西方社会

科学着眼于被研究的社会内部看待问题的方式，苏联模式则持政府视角对民族进行先入为主的分类，并进一步考察其起源。后者则恰恰对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存在深刻影响。此外，苏联人类学家通常把研究归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结论，但对亲属制度这类既具备经济属性、又涵盖社会与文化的组织而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又难以展开。总之，在千差万别的国家形态之中，不同国家均需关注的共同议题，正是对其所容纳之人口的分类、控制与整合。这正是本次论坛带来的启发与学习之处。

（撰稿：张雪冷）





98

## 邓小南、刘志伟、郑振满 | 书谱石刻：中古到近世华南与西域研究的对话

2019年7月18日，“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书谱石刻：中古到近世华南与西域研究的对话”。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内蒙古大学、深圳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美国爱默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海内外十余所高校的二十余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邱源媛首先对工作坊的主题与缘起作了介绍。这一活动始于2016年，主旨是在多元的北方族群视角与历史人类学取向的华南研究之间展开对话，推进更为立体化、多元化、非线性的历史解释。此前的对话得到了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学刊》的大力支持，邀请到多位资深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研究面相上回应了年轻一辈学者的思考。《历史人类学学刊》将讨论与回应集结出版了一期专号（《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5卷第2期，2017年），而本次工作坊即是对专号的延伸与再出发。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历史人类学学刊》执行主编谢湜教授对专号的编写和出版过程进行了回顾，并结合当下新的学术趋势与时代语境，对讨论与反思方向提出了两点问题，一是重探帝国与地方社会的这种历

史概念和逻辑关系是否真的能达成华南研究与新形式的对话，是否需要重探别的内容。二是应当如何面对新时期清史研究的资料主体与方法。谢湜教授指出，只有持续的对话和开拓，才能有所进步。

### 第一场

论坛共分三场举行，第一场主题为“欧亚官私文献与社会——以族谱为例的讨论”。邱源媛研究员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罗玮、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乌云格日勒分别发表报告。

邓小南教授带来第一场报告，题为“宗谱的追溯是否‘靠谱’——以龙泉何氏宗谱为例。”宗谱作为人物及家族研究的材料组中的重要部分，能够帮助探寻正史记载中空缺的人物资料。邓小南对二十多份龙泉何氏的家谱、族谱、宗谱进行了调查，并指出由于现存的家谱大多为明清时期所修，其对于前代事情的追溯有很多内容都是不靠谱的。但这些离谱背后存在着一种“合谱”联宗的努力，他们希望将历史上的名人连在一起，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为后来人制造的有所选择的追认与记忆。而由于族谱往往是递修的，原来的旧谱早已变成断简残篇，因此在递修的过程中也有“靠谱”的努力。一般而言，

宗谱族谱历代迭修，纯粹意义上的宋代宗谱、族谱不复可见，但早期谱序等可能会保留在明清宗谱中，作为本宗族久远历史的“权威”证明。在递修的过程中一些较为严肃、有文化的递修者，在对材料进行编修时采用了一种审慎的态度。因此，家谱中的一些内容，也可以作为与正史互补质证的材料。而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首先就要将不同类型的材料从家谱中剥离开来，再将家谱、墓志与其他文献材料进行对读，辨认出可供研究的有利材料。龙泉何氏家族宗谱中所保留的宋代材料尽管内容很是参差，但还是有明显的史料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这类材料中散存着我们至今尚未分析法诀的宋代社会史研究的资料库。

罗玮助理研究员带来第二场报告，题为“新发现元代《藁城董氏世谱》清嘉庆抄本考”。罗玮首先指出，在蒙古“委任统治”的政治传统下，亚欧大陆各地区出现了众多辅翼蒙古统治的政治家族。在华北汉地则主要表现为“汉人世侯”家族的崛起。这些家族拥有很大的权力，且权力被允许在家族内部世袭，因此往往世代显贵。元代科举受到较大抑制，因此世侯家族子弟任官成为元代汉人参与高层政治的主要形式。藁城董氏是元代汉人勋臣世家，在元代中后期被称为“独盛”，出现了很多独当一面的政治人物。有关这一家族的传世史料记载已是较为丰富。对这一家族进行研究，可以作为范例帮助我们了解元代政治家族情况乃至更为重要的元朝国家政治结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家族还保存有珍贵的民间文献。罗玮初步展示了在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藁城董氏世谱》的清抄本。他根据诸多证据可以判断此谱

是基本可信的。如《世谱》序言中出现的董钥这一人物，其在文末还附有题款。由于董钥事迹散见于元代各种文献，此清抄本若没有古本作为依据，是不会记载这一人物的。因此可以判定此谱系从元代古谱累抄而来。《世谱》共记载了家族约341人世系和仕宦的基本信息，其中约245人不见于元代传世文献记载，为元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新的信息。《世谱》对于藁城董氏家族的世系与仕宦记载十分详尽，其中涉及的历史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刘志伟教授带来第三场报告，题为“以华南经验一瞥孔府谱系”。刘志伟首先指出，他所见的广东地区的宗族系谱大部分都是明清以后的，但在北方地区却留下了很多明清以前的系谱记录，从北方现存的谱系出发，可以探讨他们是如何看待整个中国，包括亲属制度、家族制度、宗法制度等。刘志伟从孔庙所见的碑刻出发，碑铭记载的是孔子后世的家族族谱。他认为石碑上所刻族谱存在二十派六十户的结构，是非常典型的明清社会的合族结构。中国历史上的族谱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唐代以前的中古族谱，以官谱为主，主要是记载贵族承袭的关系，当时的宗谱大多出现在墓志中。明清以后，家谱、宗谱、族谱的概念混淆，此前的中古时代，家谱和宗谱的概念有所不同，宗谱是承袭的依据，受官谱影响较大，而宋明时期官谱没有了，以私谱形式重新出现的谱系，开始时延续中古以前家谱，记载五世以内的世系，后来才逐渐形成了明清系谱的新范式。因此，在研究时需要分清不同的家谱的形式，还需要认识到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家谱在那个时代的用途，当时是主要依靠

哪种谱系建立起地方甚至国家的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从这些谱系中，可以看出历史与社会的变化。

赵世瑜教授带来第四场报告，题为“族谱之于汉、番、回——竞争、协调与联盟”。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过藏彝走廊的概念，藏彝走廊以东的雅砻江、大渡河、岷江三江并流的区域是更具贯通性的汉、蕃、回走廊。宋代以后，汉人和西番就在此处形成了长期的共居空间，元明时期又加入了回回，因此保留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赵世瑜首先对汉地回回如何记述祖先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汉地回回经历了从外来者到逐渐定居的身份变化，从早期墓碑记载三代到仿照汉人的族谱，现存较多的是清代中叶以后的族谱。番人即后人泛称之藏族，所见族谱也受到汉人传统的影响。《西夏李氏世谱》中收录了26部家谱，编纂时间集中于明朝嘉万年间、清朝康乾年间、晚清光绪时期这三个时段，均是西北地区发生较大变化的时期。此外还有乾隆时期编修的《后氏家谱》，后家家谱中有两种特殊的材料，一是在当地流传的《西天佛祖源流录》、二是《岷州志》。后家的一个支系是僧人，另有一部分支系作了明代的土官，因此在家谱中均有收录，其中反映出来的分家与修族谱的关系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此外，赵世瑜还提及了甘肃永靖孔氏的谱系建构，其祠堂中悬挂的家堂画中分别有白马、黑马、青马和红马及作为各支祖先的四个神灵，应与藏传佛教之神密切相关；另一个故事是说现在的四支则是三支汉，一支回，这都反映了这一地区的不同族群在历史过程中的整合特征。

乌云格日勒研究员带来了论坛的第五

场报告，题为“家谱中的贵族——清代扎鲁特右翼旗扎萨克贝勒家谱初探”。北方游牧民族具有口述史的历史传统，早期谱系传承主要依赖于贵族为中心的口述史。17世纪以后则形成较多的蒙古文史书。由于蒙古各级贵族有自身的世袭制度，清廷要求其编修详细的家谱，上报理蕃院，由理蕃院保管并对蒙古贵族的世袭情况进行审验。乾隆初年至清末光绪年间，族谱规定为十年修订一次。清代以来，蒙古贵族家族修家谱相当普遍，但流传至今的数量不多，约有两百余份，其中大部分为伊克昭盟各旗的家谱。乌云格日勒研究员以美国哈佛大学柯立夫教授收藏的扎鲁特右翼旗扎萨克贝勒家谱为例，分析了其中记载的长、次子夺爵的故事，并指出家谱与档案文书能够起到互相印证、补充的作用。家谱是珍贵的文献，能够脉络清晰地衬托出政治制度的实施过程以及政治制度下的家族和个人，对研究社会政治史非常有效。

邱源媛研究员带来第六场报告，题为“清代旗人户口册中的家谱”。由于清代旗人是一个较为特权的阶层群体，为了加强人丁的控制，从努尔哈赤时期其就建立了一个严格的人口登记制度，一直记载到溥仪退位。学界将记录这些资料的文献称为户口册。户口册种类复杂，邱源媛重点介绍了两类，一类是人丁册，记载活着的人；另一类是家谱和承袭册，记载入旗后的所有代系人口。旗人承袭册十年编撰一次，侧重于对家庭人员世袭的记录。雍正五年，承袭册的编纂发生重要的转变。雍正五年之前，家谱的编纂由八旗系统的家族个体进行，承袭时提供给官方；雍正五年之后，则改成了由国家编纂与保存，旗人家谱书写进入国家行政管理体制。这既

是清代各项制度逐渐完善的大势所趋，也是为了应对清代人口增多带来的众多家族矛盾纠纷，将承袭册交由官方掌握可以有效解决纠纷。

## 第二场

论坛的第二场主题为“多语种石刻史料与跨地域欧亚大陆之比较研究”，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谢湜担任主持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郑振满、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田宓、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博翼、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与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孔令伟、埃默里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卢正恒发表报告。

郑振满教授带来本场论坛的第一个报告，题为“泉州宗教石刻与海上丝绸之路”。郑振满首先介绍了吴文良先生所著《泉州宗教石刻》一书，书中收录了发现于泉州地区的古代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印度教和道教的石刻。古伊斯兰教的碑刻主要在明代伊斯兰教堂遗址处发现；古基督教的碑刻文字则反映出了当时存在不同教派，如基督教教派和天主教派，而当时的基督教教徒主要以叙利亚为中心；摩尼教现存的碑刻较少，大多是一些较为简单的文字，据推断应为摩尼教的经文；由于当时很多印度人聚积在泉州，所以留下了许多与印度教相关的石刻。这些宗教石刻虽然属于不同的宗教，却随着人口的流动，时间的推移构成了变化的历史脉络，给予了海上丝绸之路故事新的讲述方式。

田宓副教授带来第二场报告，题为“从碑刻资料看土默特的汉人家族与村落社会”。归化城土默特指今呼和浩特、包头地区，这

一地区是明清时期山西汉人迁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山西汉人在口外谋生，有一个从“雁行”到“扎占”的过程，“雁行”即山西移民起初春种秋归，并不定居。“扎占”是说山西移民经过一两代后，定居口外。山西移民在归化城土默特不断生息繁衍，逐渐形成家族。在汉人家族的构建中，“容”、“家谱账簿”、“族谱”等扮演了重要角色。近些年来，汉人家族还开始在村落中修建祠堂。“容”和“家谱账簿”主要记载家族世系。“族谱”中的内容相对丰富，除了记载家族世系，还记录家族历史。其中家族世系一般包含口里和口外两个部分。家族历史则记叙了汉人家族在口外的生存发展状况。随后，田宓利用碑刻资料，介绍了汉人家族参与村落庙宇修建的情况。同时指出汉人家族也广泛参与到村落社会的摊差和水利事务之中。此外，汉人家族与蒙古家族在村落社会中的互动关系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陈博翼带来第三场报告，题为“从碑刻到历史解释：占婆碑铭研究的一点启示”。他首先从碑刻研究的学术史角度介绍了对占婆碑铭的研究和西欧殖民遗产的影响。陈博翼随后指出，占婆碑铭研究中，“印度化”理论和武景碑的争论是两个能很好说明历史解释如何依据时代变化而改变的例证。从对“文明”划分的执着和套用到“印度化”单一化的理解，高棉、占婆等王国在族群和地方政治上的多元性被抹杀，而一个看起来更完美的历史解释框架也被制作出来。接下来，陈博翼主要对武景碑解释的变化问题展开了讨论。武景碑是对芽庄附近的一个被称为释利魔罗的王室家族的记载，年代在公元二到三世纪左右。对武景碑的解释早期偏向认为



其属于扶南王国诸侯，即在契合于更为广泛的印度支那的历史体系下进行解释，战后则倾向于排除帝国影响的“地方自治”模式，强调其占婆碑铭属性和地方政治首领联合早期印度文化阶层的特征、该地与其他占婆政体的区别，体现出碑铭研究中历史解释的变化。对占婆碑铭的研究也启示研究者在碑文研究时需要关注多种信息，一是碑文直接提到的重要信息，如世系、信仰、族裔等问题；二是碑文间接提到的隐藏信息，如夸饰和试图建构植入的内容；三是碑文简单带过的不起眼的信息，如意外拓展的名词和联系网络；四是碑文没提到的信息反证，例如武景碑没有明确歌颂德扶南统治者，但对此的研究可以由点带面，带出当地的族群、政治生态、印度化的理论讨论。

孔令伟接下来发言，他的发言题目为“多语种石刻史料所见明清政教关系”。此处的政教关系主要是明清朝廷与蒙藏佛教之间的政教关系。首先是明代石刻史料中反映出的

政教关系。根据碑文内容和功德人题记，可以发现北京、南京、甘青地区大量藏传佛教寺院曾经获得明廷资助。个别碑文中蕴含着丰富的藏传佛教僧人的生平信息、法脉传承和家族继承等历史细节，这些细节不见于其他汉藏文传世史料。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汉藏碑文中的“西土”、“天竺”、“西域”、“西天”、“佛国”往往指代藏地而非印度。而到了清代，“唐古特/西藏”逐步取代了“西土”、“天竺”等明代汉文文献中的模糊概念，反映出了神圣地理学的除魅化。就现存碑铭而言，清代北京地区满蒙藏汉多语种碑铭的比例相对于明代明显较高，石刻史料的语种更加多元。尽管清代石刻比明代更为多元，但也存在着更大的内部矛盾。孔令伟从展演性和区位性两方面对清代石刻中的内部矛盾进行了讨论。一方面，乾隆有意识地通过重新书写佛教史以及历史记忆来构建特定之政教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随着场域不同与身份差异，石刻的话语表达也随之改变。

孔令伟由此认为，在对多语种史料进行研究时，应当比较其中不同的内容，并对多种不同类型的史料进行讨论。

卢正恒博士带来论坛的第五场报告，题为“满文碑刻在海疆：庄大田事件的国家描述和地方反应”。林爽文事件发生之后，乾隆皇帝钦选平定庄大田为十二场大战之一，绘制了十二张图并立了石碑。由于碑刻中的满文存在多处错误，过往学者认为碑刻中的满文完全翻译、甚至误译自汉文碑刻。但是，碑刻中提到的“蚊率社”等词汇仍然很有满文特色。此外，碑刻被立在台湾府城新建的、位于过往社会中心的福康安生祠，处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中心，具有特殊的意义。满文碑刻阐述了满洲统治者的观点，尤其强调福康安、海兰察、巴图鲁、侍卫、八旗军队的功绩，将此役与朱一贵事件的施世骠、蓝廷珍进行比较，更强调满洲水师将领的贡献。相较于满文的碑刻，当地的地方会领袖主导所立碑刻则更侧重于对放置地点与庙宇传说的描绘。反映出国家描述与地方的不同。

### 第三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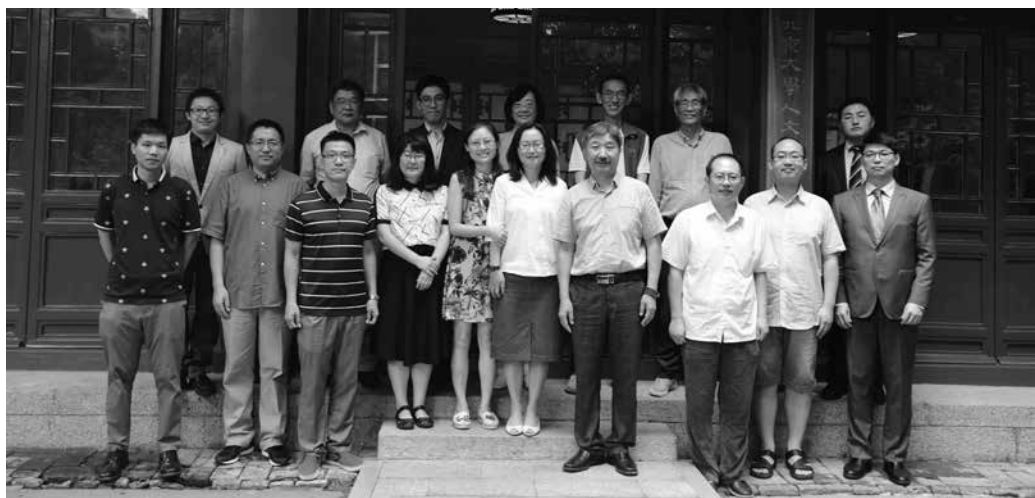
论坛的第三场主题为“官方文书的编纂、流通与知识生产”，由深圳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蔡伟杰担任主持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党宝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阿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乌云毕力格、深圳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蔡伟杰、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讲师包呼和木其尔参与报告。

张帆教授的报告题为“《元典章》文书所见元代中央高层机构关系”。报告主要围绕与公元1295年前后中书省对行政系统官

员监察系统尚书有关的三个文书展开。这些文书反映了元代的几个重要的问题：一是省台矛盾，即中书省，中书省行政机构与监察系统之间的矛盾；二是由于元代缺乏高层联席会议，高层机构独立奏事，各有系统，因此重要的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沟通；三是元代高层机构主要通过文书进行沟通，元代不行常朝，机构首长无法当面沟通、协调意见，且忽必烈以后，皇帝也不能很好地起到协调功能，元代的独立奏事加剧了矛盾。随后，张帆还结合文书中的案例讨论了元代中书省与行省之间的矛盾。元代中书省与行省在级别上平等，但行省远离中央，无法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往往要先给中书省请示，因此其文书与建议往往并不具有权威性。

党宝海副教授的报告题为“元代的田大成案和胡颐孙案——比较《元典章》和《元史》的记述差异”。党宝海首先对田大成案进行了介绍。《元典章》中收录了至元十二年四岳【四月】中书省下达的对田大成收继弟妻阿赵案的札复【札付】。但根据《元史·世祖纪》的记载，至元十二年二月，田大成已死，且元世祖已经对田大成案的处理作出了决定。一般来说，这种由皇帝本人对于司法案件作出的处置，在元朝应当是最终的裁定，无需在两个月后交由中书省发出札复【札付】来加以裁断，《元史》和《元典章》的记载有明显的矛盾。而根据《田大成墓志》可知，田大成病逝于至元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因此，《元史》中的记载是错误的。

另一案是胡颐孙案，胡颐孙谋财杀弟，但因其在官场结交广泛且行贿地方官吏而使案件迟迟不得判决，直到监察御史脱烈海牙参与调查才最终判决。在《元典章》收录



与会嘉宾合影

了胡颐孙杀弟及执法的公文，大德五年三月十八日（戊午日）由监察御史监督行刑。而《元史》成宗纪中所记载的胡颐孙等被处死时间却是大德四年四月戊午日，与处决胡颐孙的准确时间相比，年份晚了一年，而月份早了一月，日子却同为戊午日，很有可能是史臣在编写《成宗实录》时出现了抄写错误。党宝海从这两个案件出发，讨论了《元史》本纪产生错误的原因。《元史》本纪中的许多内容来自于《十三朝实录》，而由于明朝史臣编写《元史》的时间非常仓促，很有可能延续了《实录》中的错误。

阿风研究员的报告题为“文书、实录与正史：明清史的史料系统”。阿风首先从西方近代科学主义史学中的文书体系与中国文书传统两方面进行了讨论。西方近代科学主义史学主要包含三个阶段：一是十七世纪历史考证学或古文书学的建立；二是十八世纪哥廷根学派；三是十九世纪兰克史学。而在中国的史学传统中，存在两个脉络，分别是言事有别和言无独录。随后，阿风以《明史》中关于明代“户帖”的记载探讨了文书、实录与正史的关系，并指出，原始文书如诏令、奏疏等是正史的重要史料来源，正史中的记载往往依据实录编成，而原始文书在编入“实录”的过程中，不仅语言表达上会有改动，内容也会有所取舍。因此，“正史”、“实录”“文书”在中国古代的史料系统中处于不同层次，形成了金字塔形的史料系统。“文书”不仅是正史的重要史料来源，也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

乌云毕力格教授的报告题为“文献口述史和民族史研究”，以乌珠穆沁寺庙史中的个案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可将史料分为遗

留性史料和记述性史料。遗留性史料为能在无意中提供信息的史料，很少包含作者的意识和讲述历史的目的，较为可靠；记述性史料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因此，在利用史料的时候需要做一个区分。同时，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的口述史资料也是文献资料的重要补充。但口述史资料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讲述者本身耳闻目睹的资料可信度相对较高，但世代口传的关于古代历史的资料则存在很多问题。口传史料中无意识保留下来的资料非常珍贵，但需要研究者有意识的去鉴别真伪。二是口述在追溯历史时，往往并不反映本身，而是反映了其看待历史的态度或对过往历史的愿望。随后，乌云毕力格结合乌珠穆沁寺庙史中的个案进行了讨论。在对乌珠穆沁寺庙史进行研究时，主要通过两类史料，一是档案馆收藏的当地衙门上报理蕃院的奏折，二是当地民众、寺庙中的喇嘛口述的民间传说。民间传说中多有错误之处，通过两种史料的相互补充才得出正确信息。乌云毕力格由此指出，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应该正确评判历史资料的价值，严格地鉴别真伪，力图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蔡伟杰助理教授的报告题为“清代旅蒙商如何学习蒙语？以官编辞书与民间杂字、根本书为主的讨论”。对于清代旅蒙商人而言，学习蒙语是重要的基础。商号通过学徒制对商人进行培训，包括业务技术和职业道德两方面，旅蒙商的口述史中包含了大量学习蒙文的内容。为了学习蒙文，民间出现了蒙文学习的教科书，即《新刻校正买卖蒙古同文杂字》。这一刻本最晚在嘉庆年间就已经存在，体积较小，容易携带。刻本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图表，包括满蒙文对照

词汇，分为三栏，先用满文标注汉文之音，再用汉字拼蒙文之音。第二部分也是满汉蒙文对照，主要包括了一些不易用图来表示的词汇，如“八旗”等。第三部分被称为“根本书·利部”，这一部分未见明显分类，据推断应为某个不会蒙文的人留下的蒙语笔记的整理。清代官方辞书中对翻译规范有很详细的界定，而这一刻本则更像是提供给初学者的实用教科书。

包呼和木其尔老师的报告题为“阿勒巴（贡赋）体制下蒙古社会结构——清代喀喇沁地区苏木与阿勒巴类别分析”。报告以阿勒巴为切入点，旨在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喀喇沁右旗如何摊派阿勒巴（贡赋），由哪些组织或社会单位承担？二是提供阿勒巴的不同单位或组织反映出怎样的社会结构特点？在道光年间发布的旗内布告文中，摊派的单位包括四十二苏木、六翼和塔布囊（贵族）集团三种。苏木包括努图克苏木、浩特苏木和科布都苏木三部分。“六翼”则包括右翼、左翼、伯尔河翼、乌布·舍利噶翼、海达哈翼、努鲁儿虎翼。这些翼分别被喀喇沁右旗三大支系塔布囊血缘集团（即；苏布迪支系、岱青支系、长秃支系）所占有，是该旗三大支系塔布囊的世袭属民集团。四十二苏木中，有二十九个努图克苏木，其所属箭丁均来自于六翼，相当于八旗制度中的世袭佐领。浩特苏木与科布都苏木，就其性质而言相当于八旗中的公中佐领与包衣佐领。这些不同类型的苏木在阿勒巴分摊上也有明显的差异。其中努图克苏木承担着国家与蒙旗行政事务中的众多阿勒巴义务（比如；木兰围猎所需猎手、马匹、食物，旗仓储粮等），浩特与科布都苏木所承担的基本上是上层贵族家族

内部事务（邀请活佛前来祖坟诵经等）。六翼则专门负责向旗内王公提供乌拉（驿站所需车马）。可以说这是喀喇沁地区原有社会结构（塔布囊集团与六翼）将清朝编设的佐领（苏木）内部化的结果。

最后，乌云毕力格作总结发言。他指出，在这次论坛上，共有十六位学者发表了报告，内容囊括家谱、族谱、文献、西域文本等材料；题材上涉及了社会、历史、宗教、考古等；语言上涉及了汉文、满文、藏文等。这种跨领域的讨论不仅没有导致隔阂，还起到了非常好的交流效果。这一对话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与新的途径，具有很高的价值。

（撰稿：钱婧）





## （四）文研汇讲

### 01

### 郑少雄 | 边疆思想史：理解中国及其时空构成的一种可能路径

2019年5月7日下午，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少雄作主题报告，题目为“阶序团结、精英中介：近代边疆民族与国家关系再思考”。第六期邀请学者刘迎胜、刘志伟、藤田胜久、尹吉男、哈桑·法兹里·纳什里（Hassan Fazeli Nashli）、秦玲子、冯培红、熊春文、狄金华、鲁家亮、马孟龙、于溯、赵妍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郑少雄首先介绍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关于民族政策、民族理论、民族关系方面的一些关键性争论。这些争论除了因应当代中国边疆、民族状况的新变化外，国际学界的研究也起到了刺激作用：如族群性和民族主义理论，“新清史”、蒙元史、内亚史的相关议题等。国内学界关于“何为中国”的焦虑，其核心大抵是四大边疆的位置问题以及中原与边疆之间究竟以何种方式结合成费孝通所言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问题。关于如何实现“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格局”，目前国内学界存在三种思路：一是主张将中华民族视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民族（国族），将各民族视为族裔性质的文化群体，主张强化国族认同，淡化族群意识；二是主张承认并维护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和政治权利，尊重民族差异，坚持并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第三种思路不但接受多层次的民族认同，且认为每一个民族社会内含“他者”亦内在于“他者”之中，诸民族间相互建构、相互关联、相互依赖，民族认同在一条连续光谱上变动。中国则可称为一个“超社会体系”或“超体系社会”。郑少雄在分析上述各思路之优缺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思考，他用三个案例来讨论近代以来中国边疆与内地关系的理想型。

第一个案例康定土司“叛乱”旨在说明汉藏之间阶序团结的跨文化特征。清末民初，面临改土归流和西康建省的末代康定土司连续数次逃到关外地区发动“叛乱”，鉴于当时复杂的汉藏关系和局势，这些行动通常被理解为附和西藏叛乱、旨在脱离前清或民国的控制。而当时的一份奏折显示，明正土司是试图通过“叛乱”来改变

改流和建省进程：土司提议西康省划界到土司属地以西即可，而自己则打算主动献地内附，重归四川，因其认定作为四川之边地，康定自身就可以继续享受边疆地区的“自治”特权。简言之，作为康巴藏族的康定土司，宁愿脱离与自己族群身份高度一致的西康省，而选择和汉地汉人继续维持在一起。这个行动逻辑的核心是，不管是逃避还是抵抗，真实的目的是为了回归。

由此可见，边疆族群认为其自主空间的实现取决于与汉地汉人的差异性以及基于差异性上的主动绑定关系，而非逃避或抵抗。这一边疆行动逻辑是对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提出的政治行动类型（抵抗、同化、逃避）的一种补足性反思，同时也意味着提出一种理想的民族关系（区域关系）模式，即阶序团结。

从土司的认知来看，他的辖地大打箭炉（即康定），实际上是关外地带和作为城镇的炉城的结合体。同理，在土司之上，大四川是由川边地区和四川盆地共同构成的。再往上一层，大中国也包括了边疆藩部与中原地区。从中国到四川到打箭炉，涉及边疆议题时，区域结构是层层同构的。关外与炉城、川边与腹地、藩部与本部之间，既有内在的张力，也有密切的合作，且始终被更大的政治力量所涵括与吸收。也就是说，大打箭炉涵括了关外与炉城之对立，大四川涵括川边与腹地的对立，大中



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为郑少雄副研究员（左）颁发聘书

国涵括了藩部与本部之对立。这个框架类似于路易·杜蒙（Louis Dumont）所说的“将对立涵括在内”，也意味着，边疆自我与内地他者的对张与结合，最终都导向对一种阶序政治的承认。边疆族群只有和主体民族产生关系，才能在历史结构中获得位置。

第二是康定锅庄的中介性特征。康定所谓48家锅庄是由本地康巴贵族（土司及其管家）开办，集旅店、同乡会馆、贸易中介与信用担保功能为一身的经济组织。锅庄主对来其锅庄投落的关外康藏商人有庇护义务，且居中代他们向内地汉商出售土产、购买茶叶，理论上藏汉商人之间存在“接触禁忌”。康藏商人在交易过程中享有多种所谓“优惠”，居中费用一律由汉商承担，这与康熙皇帝当年一道谕旨的原则相符。康定作为给定的汉藏边茶贸易地点，尤其是锅庄这一中介形式的存在，使得康定总体上呈现出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说的“贸易港”的特征。锅庄表征了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开展贸易，同时也隐喻了族群交往中交融与区隔的辩证

形式。通过锅庄实现的汉藏边茶贸易是不同族群之间包括财富、信任与阶序在内的“总体性交换”。而且，在康定的地方叙事中，内地物资、人员及观念在入藏前须在康定经历种种迁延、转换。这表明，康定试图将自己处理成一个汉藏之间仪式性转化的场所。锅庄由土司及贵族把持，也隐喻着族群之间的交往端赖于边疆精英的文化能动性和中介性。

第三个案例是康区木雅藏族乡村的当代案例，可用以说明边疆社会内部亦同时存在精英代理与阶序政治。改革开放至今，木雅藏族经历了持续的宗教复兴与采集经济的急速繁荣，这两者都依赖于宗教精英人士的强力推动。除了寺庙下山、学校重建、地方族群文化复苏以外，还有两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一方面，虫草销售现在更多通过喇嘛而非乡村小贩来实现；另一方面，地方性的神山祭祀由原来的社区组织变成由寺庙出面组织。这些细节可以说明，某

种意义上寺庙成为社区非正式的再分配中心和土地财产权利代理人，传统上藏区百姓对地方精英（包括世俗和宗教二元）的阶序性依附几乎都转移到宗教精英身上，其中尤其明显的是藏区社会对外交往中的宗教精英中介机制。

回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框架，郑少雄以锅庄为例提出多元交往中的精英中介机制；以土司的疑似叛乱为例，提出多民族国家整合的阶序团结机制；以当代木雅藏区为例，综合说明了边疆社会内在的阶序团结与精英中介特征。他认为，对近代以来边疆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再思考，既需要吸取历史智慧、关照当代现实，也应当掌握有穿透力的理论工具，从而可以在前述多样的进路之间获得一种综合与超越。

（撰稿：郑少雄）

## 02

### 马孟龙 | 东郡之置与吕后的地域控制政策

2019年5月14日，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一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马孟龙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东郡之置与吕后时代的地域控制政策”。第六期邀请学者刘迎胜、刘

志伟、藤田胜久、尹吉男、哈桑·法兹里·纳什里（Hassan Fazeli Nashli）、秦玲子、冯培红、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袁剑、于溯、赵妍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首先，马孟龙老师从“政治史”、“历史地理”的学术发展路径切入报告。他指出，21世纪初，政治史研究面临困境。一是作为传统史学研究重点的政治史，其“合法性”遭受普遍质疑，而宗教史、医疗史、妇女史等“新史学”迅速兴起，史学研究局面由此出现“中心衰落，边缘崛起”的局面。二是，政治史研究范

式的单一导致“内卷化”倾向，使其学术吸引力迅速下降。当前很多学者都在思考政治史发展的出路。其中，邓小南老师提出的“新政治史”很值得关注，她提倡将政治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相结合，开辟新课题。这代表了一种从多元视角观察政治变动的倾向。与之对应，21世纪初历史地理研究也面临“转型”。清代乾嘉以来兴起的沿革地理关注政区置废沿革。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政区地理则关注政区辖域范围。这些研究仅仅涉及政区表象特征，并未触及政区的本质内涵，由此，周振鹤老师呼吁历史地理研究范式需要转向“政治地理”。在周老师列举未来政治地理关注议题之中，提到历代政治家如何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这其实已经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史问题。可以说，政治史、历史地理本身的学术发展，使得两者“遭遇”，有了共同的学术目标。

随后，马孟龙老师引出本次报告内容的“主角”——东郡。关于东郡在西汉初年的建置问题，以往比较模糊。《汉书》提



马孟龙副教授

到刘邦在晚年把东郡废弃，将其地赐给梁国，但是关于东郡何时被汉朝收回，并不是很清楚。清儒全祖望推测在文帝元年，后世学者普遍接受了这个看法。2001年公布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出现了东郡辖县，学界意识到吕后初年东郡已经重属汉廷，但是对回属时间存在很大争议。马孟龙老师介绍了他此前对《秩律》文本特征的研究结论，指出《秩律》是在惠帝七年“旧本”基础上，补入吕后元年初的律文变动，从而形成的混合文本。《秩律》所有的东郡辖县都排列律文后补入部分，表明东郡是在吕后元年初收回的。那么吕后称制之初，为何要把东郡收回，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为了准确理解吕后收回东郡的用意，马孟龙老师把历史叙述回溯到战国末年。他指出，秦国历经秦昭襄王时代的开疆拓土，版图急剧扩张，占据了整个华夏地域西部地区，这让关东列国共同感受到秦国的军事威胁。于是从秦昭襄王末年开，关东列国接连合纵，多次击败秦国，给予



秦国巨大的军事压力。秦王政五年，秦国沿黄河南岸推进，占据大量魏国领土设置东郡，从而使得秦国领土与齐国接壤，将关东各国分隔为南北两部分，断绝了各国合纵的地理基础。东郡的设置对秦国来说具有重大地缘军事价值，大大加速了统一天下的历史进程。

马孟龙老师随后又把历史叙述拉回到西汉初年。惠帝崩后，吕后手里只有年幼的惠帝诸子，面对的却是朝廷内部掌握实权的功臣集团，以及朝廷外部政治独立的刘氏诸侯王。为了防止功臣集团与刘氏诸王联合觊觎帝位，吕后决定重用吕氏族人，突破“白马之盟”。但是，刘邦早与关东诸侯对突破盟约的结果进行了预设，即“天下共击之”。一旦吕后突破白马之盟，关东诸侯王即可联合起兵平乱。明晓这一政治背景后不难理解，吕后收回东郡，便断绝了关东诸侯王国合纵地理基础，使汉朝

占据了压制诸侯王国的军事地缘优势，同时对实力强劲的齐国形成震慑，这一做法正是对战国末年秦灭六国成功军事地缘经验的借鉴。

梳理吕后时代的政治发展，可以发现，东郡成为吕后一系列地缘控制政策推展的战略基点。此后，她分封的吕氏诸侯王国、惠帝子系诸侯王国之地域选择均围绕东郡展开。时至吕后七年，吕后已经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血缘、地缘相互匹配的天下格局构造。明晰吕后时代地域控制政策的发展，还可以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西汉初年天下地理政治结构，文帝时代的王国政策。这很好地诠释了以空间为视角，重新理解政治运作的可行性，是未来西汉初期政治史研究极具前景的方向。

(撰稿：马孟龙)

## 03

### 秦玲子 | 蒙元帝国的医学文化

2019年5月21日下午，文研院第六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二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欧克莱尔分校历史系教授秦玲子（Reiko Shinno）作

主题报告，题目为“蒙元帝国的医学文化”。第六期邀访学者刘迎胜、刘志伟、藤田胜久、尹吉男、哈桑·法兹里·纳什里（Hassan Fazeli Nashli）、冯培红、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马孟龙、



秦玲子教授

梳理本书主题，秦玲子教授认为，与宋代、金代相较，元代有着不同的权力结构，因而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医学文化，而不仅是宋代、金代医学文化的延长。在以往学者对此主题的研究中，托马斯·爱尔森（Thomas T. Allsen）、韩明士（Robert Hymes）、陈元朋等人已关注到医生在宋元时代的境况与流变。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秦玲子教授重点关注医学文化在元代的发展，并在社会史、制度史视角之外融入医学理论，进行多学科综合探索。

元代宁波地方志《延祐四明志》由元代人袁桷编纂，记载医学学校的发展。秦玲子教授首先详细梳理了袁桷及其家族的历史脉络，认为袁桷关注医学既有个人理由（亲人过世），亦有政治和制度上的理由，并结合其他地方的资料进一步寻找线索。

在政治制度史维度，秦玲子教授将政治与制度变迁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定位于公元1206-1276年，从蒙古平原统一至征服南宋，标志着蒙古征服与新权力结构的定立，而在医学层面，该时期也先后出现了聘用医生并为医生免税、建立太医院、创立医户（medical household）、太医院广惠司等现象与举措。第二阶段从1276年南宋降服发展至1300年南人开始做官，在中国再统一的历程期间，制度局部精致化。统治者发现，医学在南北方有不同的机制，开始关注何处需要医学教授，并将制度与教学内容逐渐细化，设立官医提举司、建立医学三皇庙等。而第三阶段则从1300年南人开始做官行至1368年元朝灭亡，期间南人与年轻官僚逐步走上政治舞台，制度随着渐

袁剑、于溯、赵妍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秦玲子教授在其2016年出版的著述《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中国医学政治》（*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edicine under Mongol Rule*）中，重点关切元代医学的发展。从该著作的原拟标题（Politics,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of Medicine in China under Mongols）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于元代医学的论述脉络欲从政治制度史、文化史、理论史三个维度展开。而从文本目录来看，在首章介绍袁桷及其家族的基础上，第二至四章围绕政治制度史展开，关切蒙古征服与新的权力结构、中国再统一与南人参加帝国政治。第五章转向文化史，关切患者对于疾病与医者的看法，而末章理论史部分则讨论医书与医学理论的关系。

进实施、历经调整，太医院考试制度形成确立，而各地区的医学三皇庙也逐步建立起来。

秦玲子教授继而转向文化史维度，认为系列政治制度的变迁带来了三个影响：其一为造就世界帝国，促进中国、中亚、西亚等地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提供给医生与前代不同的医疗经验。试举一例，李杲察看1232年开封情况时关注内伤的问题，而其学生罗天益在做军医时察看不同民族的疾病。其二，蒙古帝国增加了医官的权力。医生比前朝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自由推进医学政策。因而，成为医生在当时变成一种成功的阶梯和很受欢迎的选择。这些医官建立了跟以前不同的医学制度，并帮助金朝的医学理论出版，让这些书与理论传播到南方，造成了新的医学文化。其三，蒙古帝国推进南北之间的交流。金朝与南方之间曾有文化差异的“铁幕”（Iron Curtain），伴随着金朝灭亡与蒙古军带来南宋的学者，这道铁幕逐渐崩坏。这样的情形亦对医学文化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金朝发展出的新医学理论传到南方，《圣济总录》成为元代医学教科书，金朝的医学理论影响到元代医书……同时，南宋发展的哲学（南方的道学）传到北方，与北方金朝之“文”统形成互动。

秦玲子教授进而指出，上述转变影响了人们对于医学与医生的看法，亦促进了医书流布与医学理论的发展。随后，秦玲子教授以朱震亨为例说明。朱震亨是典型的蒙元帝国医生，采用西域异人的治疗法，集成金朝医学理论，并作为一名道学家将自己医书命名为《格致余论》，对于后代

的医学理论产生很大的影响。倘若没有蒙古人建立世界帝国、统一中国的背景，朱震亨及其后代人的理论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综上，秦玲子教授总结提出“做合流点的元代”观点，通过图示展现蒙元帝国医学文化历史的流动。在金代、南宋分居南北的两条分立的历史发展路径之间，蒙古人、色目人带来了新的色彩，将两条历史线索与文化融合起来；而民族之间的互动也为元代的医学文化与后代的医学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

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围绕不同文化医学系统的比照交流及其落于典籍的体现，元代太医院的建立抑或“复兴”，医生地位的变化，医学作为技术与医学为“学”，医学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变化，元代统治者对于医学的态度，元代医学系统对于外国药物的使用和对于伊斯兰医学的吸收，医学与庙的关系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撰稿：章涵青）

## 04

### 黄群 | 卢梭与法国启蒙时期的戏剧

2019年6月5日下午，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四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III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黄群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卢梭与百年中国”。第六期邀请学者藤田胜久、尹吉男、哈桑·法兹里·纳什里（Hassan Fazeli Nashli）、秦玲子、冯培红、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郑少雄、鲁家亮、马孟龙、袁剑、于溯、赵妍杰，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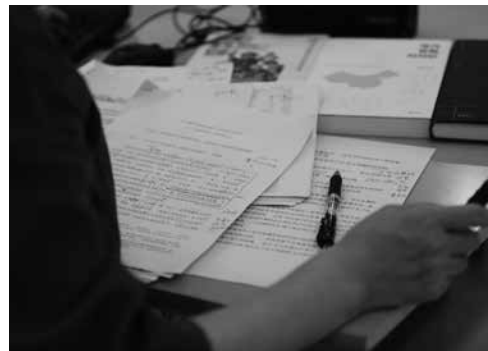
黄群老师首先从法国先贤祠里哲人卢梭的墓室与论敌伏尔泰相邻，共享法国人至高的尊崇讲起。黄群老师认为，这些看似旁枝末节的历史细节，其实是在提醒思想史的研究者要格外注意在不同思想张力之间，在独特而具体的历史处境中去理解思想对象。

随后，黄群老师分别从三个问题展开本次报告会。第一个问题是，卢梭是谁？黄群老师指出，卢梭在思想史上的面目相当模糊。他到底是支持启蒙抑或反启蒙？是激进抑或保守？备受争议的卢梭作为“十八世纪最具争议又无法绕开的思想家”，以其无比深刻与犀利的思想成为欧洲现代思想的源头。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和浪漫主义思潮亦与卢梭脱不开干系，“自由”、“平等”、“浪漫”成了谈论卢梭思想的关键词。

黄群老师介绍了卢梭思想历程及其生活

的时代。她指出，自神学家加尔文于1559年创办“日内瓦学园”起，日内瓦共和国（卢梭的祖国）就成了归正宗神学教育的中心，严律的加尔文教福音主义使得日内瓦人的生活时时“处于教会法庭经常而严密的监督下”。尤其在卢梭生活的启蒙时代，日内瓦共和国日益商业化。日内瓦人的信仰在启蒙思潮的波及下开始出现裂隙，卢梭敏锐地洞察到这些思想危机的征兆，并天才地预见法国的启蒙思潮最终会危及日内瓦共和国的信仰根基和政治基础。于是，卢梭愤然反对启蒙。1758年，他撰写了一封致“百科全书派”主将、自然科学家达朗贝尔的信（简称《论剧院》），以示与启蒙阵营的决裂。黄群老师通过扼要解读这封决裂书，展示了卢梭思想的复杂性。

如何在不同思想面具之下尽可能地切近并还原卢梭的真实面相？黄群老师由此展开第二个问题：如何阅读卢梭？她以卢梭





在不同作品中对自己写作方式的解释为例，说明其本人已经为未来的读者指明了通向思想圣所的路径：要格外小心自己不同作品之间的内在关联。黄群老师指出，卢梭的写作一直是面向两类读者：普通的大多数和少数爱智者。卢梭对隐微和显白写作的区分，提示我们至少要做做一个清醒的读者。古典解释学的研究进路关注作者不

同作品之间以及作品表面的形式与内在，还有作品的修辞与作者意图之间隐秘关联。施特劳斯对古人隐微和显白笔法的重新发现影响其后的学人重新读解西方古典大书，赓续了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前半期中断的古典解释学。

接下来，黄群老师以解读卢梭《论科学与艺术》（1751）的封面插图和引语以及《论剧院》的标题页为例，展示该如何细读经典文本，又该如何关注经典文本表面的修辞。她总结说，伟大的思想家对待自己的作品总是异常小心，一方面出于哲人的谨慎：要将那些很复杂的、对社会有害的智慧和意见“包裹”起来，力图不危及社会的生活根基；另一方面，哲人又要将真理展示给少数人，吸引特定读者继续追问真理，“悉心写成的书写给悉心阅读的读者”。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百年中国的卢梭接受史？黄群老师由此进入本次报告会的核心论题：如何看待卢梭与现代中国的思想纠葛？黄群老师以卢梭的“民权论”在中国的接受史为例，回顾了卢梭与中国思



副院长杨弘博为黄群副研究员（左）颁发聘书

想历程的百年因缘。她指出，古老中国与卢梭的相遇地在日本。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间，日本已经出版了卢梭大部分的著作。从1879年黄遵宪出使日本时最早接触到卢梭学说起，晚清知识界对卢梭的接受颇为戏剧性：从1896年学界巨擘严复、梁启超为首纷纷撰文热切推介卢梭学说，到突然转向反对卢梭学说，“从卢梭之言，则革命终无个止之时”（梁启超语）。黄群老师认为，最早接触卢梭学说的晚清知识界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存在对卢梭思想的误读。有研究显示，《民约论》中江笃介译本和杨廷栋的译本皆“讹谬不能读”，直到1916年，马君武对勘法文原著与托泽（H. J. Tozer）的英文译本才译出《足本卢骚民约论》，并于191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但是，即便有了信达的译本，也未必能读懂《社会契约论》里的修辞机关——卢梭本人一再声称，《社会契约论》不过是教育小说《爱弥儿》的附录。

黄群老师指出，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界对卢梭学说的译介和研究也鲜有中断。从晚清至民国，再到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

卢梭的作品似乎总能为不同的政治处境所接受。随后，她回顾了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卢梭热”——尤其是晚近《卢梭全集》的译介，以及标志卢梭思想研究向纵深推进的“卢梭注疏集”系列丛书的出版。黄群老师认为，这体现了百年中国的卢梭接受史与中国学人的思想历程有某种一致性。

随后，黄群老师还提到，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卢梭热”相似，二战后，卢梭在西方的骤热也是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在当时的冷战思维格局下，东西两大阵营都对两百年前的卢梭发生了浓厚兴趣。知识界

重新反思法国大革命，反思卢梭的思想与革命暴动之间的联系。

黄群老师总结说，如果卢梭有一副雅努斯式的脸，那么，这张脸的两个面相并不一致。长期以来，广为人知的是作为激进启蒙智识人的卢梭面相。为了认识复杂的卢梭，我们有必要深入认识卢梭的另一副面相：激烈反启蒙的卢梭。要想整全地理解卢梭，研究者需要认真细读文本，对卢梭政治哲学的读解回到他自己的理解，小心谨慎地切近他。

（撰稿：黄群）

## 05

### 冯培红 | 地名移动及背后的历史

2019年6月11日，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五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冯培红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地名移动及背后的历史”。第六期邀请学者刘志伟、藤田胜久、尹吉男、哈桑·法兹里·纳什里（Hassan Fazeli Nashli）、秦玲子、邱源媛、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马孟龙、袁剑、于溯，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由于历史上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些地名发生了位置移动。这对于今天人们理解古地名易造成误解，同时也隐含着地名变动背后丰富的历史研究旨趣。冯培红选取三组地名，考察其空间移徙及历史背景，特别分析族群人口的迁徙与异地风俗的影响，从而观察不同区域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

#### 河西走廊上的会稽与建康

会稽、建康是江南历史名城，但中古

时期在河西走廊也出现有这两个地名。颇有趣的是，河西会稽、建康原为效仿六朝江南而取，而后却成为了中亚粟特人的聚居地，甚至形成会稽康氏、建康史氏等胡姓郡望。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河西走廊的会稽县、郡、镇和建康郡、军的建制，起自晋代，迄于唐或五代、北宋。尤其是会稽的地点，时有变动，西晋初设会稽县，治今甘肃省瓜州县小宛破城；西凉迁都酒泉，将前秦时从江汉掳掠来的五千户南人迁徙到酒泉，设会稽郡，治今玉门市赤金堡；北魏末的会稽郡并非西凉会稽郡的翻版，治所迁回小宛破城；北周初废郡扩县；隋中期废入玉门县，治所东徙赤金堡；五代归义军又在小宛破城设会稽镇。由此可见，河西会稽之地名演变历程极为复杂。建康郡、军皆治今甘肃省高台县骆驼城。由此，冯培红对河西粟特人及会稽康氏、建康史氏进行讨论，指出五胡人华时大批中亚粟特人东迁河西以及此后持续层累徙入并定居于会稽、建康的历史。

### 东魏、北齐侨置凉州考

阅读史籍、墓志可以发现，东魏、北齐设有一个凉州，但无论是古代《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抑或今著《北齐地理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皆未记载此一凉州。冯培红从史籍、墓志中拣出十二位东魏、北齐凉州官员，以之为基础讨论了侨置凉州及胡风东渐的现象。

他指出，东魏、北齐凉州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实系空名”、“遥领虚衔”，这一点从《隋虞弘墓志》“简陪阆”“理

署僚府”和《唐杨华墓志》“光临凉部”均可看出。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东魏、北齐何以侨置凉州？河西侨民带来怎样的粟特胡风影响？除了传统所说439年北魏灭北凉后迁徙大批凉州民众东来外，学界大多忽略了东魏高欢招诱西魏西北缘边凉、灵、渭、秦、豳诸州的大量军民，其中很多是粟特人。从东魏、北齐凉州官员的构成情况也可看出他们与河西凉州的密切关系。这些原出河西的粟特人及其他凉州民众，对东魏、北齐的胡化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

### 隋玉门关的东西移动与西域范围的变化

接下来，冯培红从《隋书》的“故万乘亲出玉门关”及隋炀帝“西出玉门”入手，讨论炀帝出玉门关究竟是实履其地，还是一种意象指称？他接着指出，作为通往西域的标志性边关，玉门关一直与西域概念紧密相连。从《隋书》及出土墓志可知，隋代西域的概念及范围发生了变动。裴矩《西域图记》记载“从西倾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把西域东界定在了西倾山，这也是《隋书·西域传》将吐谷浑、党项、附国列入其中的原因。隋初党项羌内附后，在临洮、西平或以东地区设置盐泽、蒲昌二郡，为隋朝西域东移提供了佐证。

隋玉门关的位置移动，必须要放在西域范围东移的背景下来理解。学界普遍认为隋玉门关是从敦煌西北东徙至今瓜州县附近，然而，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据《隋书·吐谷浑传》记载，609年灭吐谷浑后，“帝

立顺为主，送出玉门，令统余众，以其大宝王尼洛周为辅。至西平，其部下杀洛周，顺不果入而还”。这个“玉门”在西平郡以东，位于枹罕郡黄河岸边，当即隋炀帝所出之玉门关。隋灭吐谷浑后在其故地设置四郡，玉门关也同时西移至晋昌城东。原陇右玉门关改名为临津关，后世史家记述炀帝渡河出关时留下了两种不同的记录，露出了破绽马脚。

报告结束后，马孟龙指出，既要赓续以往实打实的地名考证，又要深入探讨地名移动背后的问题，特别是玉门关移动与西域范围变动——这体现了古人地理观念的变化。与会学者还就地名侨置、命名方式、



院长邓小南为冯培红教授（左）颁发聘书

侨民与原居地的联系、西北与西域观念、胡风问题、河套变迁、墓券用语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撰稿：冯培红）

## 06

### 熊春文 | 文明的个性与命运：韦伯的农业社会学及其启示

2019年6月18日，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六次）在北京西山大觉寺明慧茶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熊春文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文明的个性与命运：韦伯的农业社会学及其启示”。第六期邀请学者刘志伟、

藤田胜久、尹吉男、赵京兰、秦玲子、冯培红、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黄群、鲁家亮、马孟龙、袁剑、于溯、赵妍杰，文研院院长邓小南、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熊春文老师的报告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韦伯的著述史，以此界定古代





熊春文教授

农业史研究在韦伯学术轨迹中的位置。根据施鲁赫特的论述，韦伯对于古代与现代农业发展以及古代与现代的资本主义的双重兴趣决定了他第一阶段（1889-1900）的著作内容，且持续到第二阶段（1900-1910）。直至第三阶段（1910-1920），韦伯才以《经济与社会》和《各世界宗教之经济伦理》两部宏编巨制为主要研究任务。可见，韦伯对于古代农业史和现代农业问题的研究在其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这表现在他的讲师资格论文《罗马农业史对公法与私法的意义》（1891）、《关于德国农业工人状况的调查》（1893）、《易北河以东地区农业工人状况的发展趋势》（1894）、《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1895）、《古代西方农业社会状况》（1897/1898/1909）等。

第二部分聚焦《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该书英译本为（*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1976））。熊春文还原了

这一文本的创作过程，不同版本的写作背景、篇幅和内容增订情况及其接受史与翻译状况。熊春文特别指出理解这一文本的德国国家学背景和历史主义传统的重要性。

第三部分，熊春文深入文本内部，试图还原韦伯在比较历史分析的框架中，如何通过其特有的理想类型方法处理极为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最终获得对西方古代文明个性及其命运的清晰认识。在导论部分，韦伯以欧洲-西方与亚洲-东方（包括近东）以及古代与中世纪/现代之间的比较组织其问题框架，建构比如东方封建主义与西方封建主义、个人主义封建制与城市封建制、古代无产阶级与现代无产阶级、自由劳动与非自由劳动等各种维度理想类型，不断逼近对古代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并提出两个核心问题。其一，古代经济组织是否具有某些无法用中世纪和现代经济史概念加以分析的特征？其二，古代是否存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文化史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对于第一个问题，韦伯在“原始派”毕歇尔对“现代派”迈耶的争论中萃取观点与立场，形成独特的历史-社会理论。关于第二个问题，韦伯的主要结论是，完全否定古代曾经有过资本主义式经济发展过程的存在是无知的，这样做其实是简单地把“古代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等同看待、等量齐观。韦伯认为，古代当然有过一种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形式。如果下定义的话，这种形式可以称为“政治资本主义”，即一种受着政治、伦理和观念条件广泛限制的经济形式。韦伯在 *Agrarverhältnisse im Altertum* 有关古代资本主义议题的探讨无

疑与其一生的学术旨趣密切相关。

著作正文部分以“古代文明各主要中心的农业史”为题，对古代东方、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古以色列进行了简要考察，之后则是对希腊、希腊化时代、罗马、罗马帝国时代等西方古代社会的详细分析。韦伯在分析中充分地贯彻了其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建构了诸如农民公社、贵族制城邦、官僚制城市王国、重装步兵城邦、公民城邦、赋役君主制等军事-政治类型以及自然经济、市场经济、交换经济、货币经济、家计经济、营利经济等经济类型。然后，他深入到诸文明中心的历史发展当中，对所有重要的社会现象进行相互比较、对照，并与中世纪和现代现象作了比较对照。此事物由彼事物加以说明，典型因素与个别因素被分而论之，同一名称的事物被揭示出了差异。而且，在历史学家根据现代现象解读历史而出现了错误的地方，韦伯则用“理想类型”做出了澄清，并最终使读者获得对古代文明个性及其命运的清晰认识。

报告最后，熊春文还概略地探讨了韦伯的农业社会学对于今天中国农业转型研究的可能启示。在他看来，最大的启发之处在于韦伯通过理想类型的方法把农业经济现象置于宏阔的政治-文化/宗教-社会的框架中加以比较分析与具体定位。他对于农业理性化条件（特别是他称之为“非经济因素”）的讨论影响了后来关于农业现代转型的诸多研究，尤其是其对于农业担纲者行动伦理（如“企业家精神”）的讨论富有较强的启发作用。韦伯的研究框架使得我们得以拓展目前居于主流的农业

科学和农业经济学的视野，有助于我们对农业经济现象获得更为丰富复杂、也更为清晰准确的认识和把握。

（撰稿：熊春文）



## （五）菊生学术论坛

### 14

### 脱嵌的母体：传统中国贡赋体制中的食货原理

2019年5月25日，“菊生学术论坛”第十四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脱嵌的母体——传统中国贡赋体制中的食货原理”。本次论坛由文研院、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及商务印书馆共同主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十余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 上午场

赋役制度是传统中国社会资源流动与再分配的基本构造。宋代直至明初，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编户齐民的控制，以汲取财政资源。明代嘉靖年间确立“一条鞭法”的基本财政原则后，财政资源的可核算性大大增强；王朝不必掌握实际的人力资源，课税主体的主要形态从丁身转变为以宗族、会馆为代表的各类中间团体。协商机制、交换机制与贡赋体制一起，日渐成为政治原则的一部分，市场原则似乎正从指令性经济中脱嵌而出。本次论坛的中心议题，正是如何认识这一历史时期市场原则与政治原则的耦合关系。

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

系教授刘志伟首先作主旨说明。在以往的研究中，受中国经济史传统逻辑的制约，学者往往将市场、商业的发育同国家体制和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着重探讨市场制度从国家体系中“脱嵌”出来并独立发展的过程。近年来，一些学者从历史延续性角度入手，将目光转到市场制度从传统经济体制中“脱嵌”的过程。刘志伟教授指出，所谓“母体”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市场从其中孕育出来，带有母亲的基因；二是指与之切断并独立成长，这自然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影响对于传统自然经济的一般认识，也影响对古代乃至当今经济转型的认识。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周曲洋带来了主题为“《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所见两税体制下州县的财政核算”的报告。两税法是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它不仅带来了税目、税种的变化，更引起了国家财政体系的转型以及国家与市场、与社会关系的转变。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如下三方面。一是赋税结构从人身到资产的转变。《陆宣公奏议》载，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这背后既有征税对象的调

整，更有从身份到契约的调整，是具有进化论性质的大变化。二是中央与地方定额分层财政的形成。汉、唐时期的国家财政具有统收统支、中央统一分配的特点；唐代以降，形成了“划分收支，定额管理”的两税三分法；及至宋代，以祖额、原额等为代表的税额凝固化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三是财政运作中商业与市场因素增加。有学者认为，宋代政府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与西方所谓的“财政国家”概念是比较吻合的；事实上，纵观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中国传统国家的运作从未脱离市场，市场机制一直是国家财政分配过程中的重要机制。故而宋代究竟是不是市场发育的高峰，恰恰是值得怀疑和商榷的问题。此外，宋代纸币高度发达，而纸币在国家体系中具有重大意义，如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倘若过分强调宋代的发育程度，为何市场的“脱嵌”不发生在宋代，而是发生在更远的嘉靖年间？因此，必须重新反思市场脱嵌的真正表征和原因。

《徐谓礼文书》是学界目前发现的唯一记录明确征税数据的官员考核文书，部分揭示出两税体制下宋代州县财政核算体系的变化。一方面，该文书所载溧阳县端平三年（1236）的两税税额，与《建康志》记载的南宋末年税额基本吻合，从而说明了宋代二税税额凝固化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建康志》中提及南宋建康府田亩数字亏额达三百万亩，那么两税税额为何仍能保持稳定？事实上，宋代的两税名义上是对田亩的课税，实际上仍以户为计征和核算单位。书手根据“田亩×则例”计算出各户税额后，该税额便会长期固定在户内，一县所领各户税额的叠加便是该县的两税原额。正如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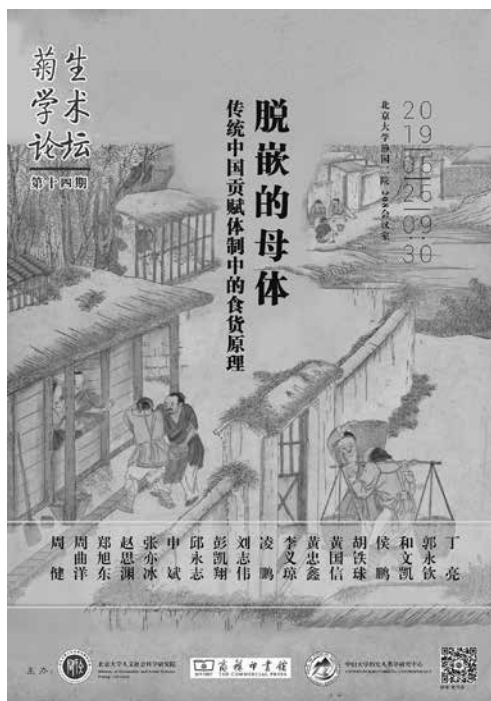


刘志伟教授发言

学者柳田节子所言，宋代的征税体制本质上是“户等支配体制”。两税法实施后，国家的支配重点并非从人身转向田地，而是从单丁转向户等。另一方面，在《徐谓礼文书》中，所有的两税与常平钱物等税目全部标注“已纳足，见催无”字样，这与以往史料中南宋赋税征收拖欠的常态相矛盾。周曲洋认为，这可能说明南宋中央政府对州县财政的考核并不依据单独的税目账簿，而是依据上供钱、经总制钱等被“打包”的调拨窠名。由此可见，宋代仍以定额作为财政管理的核心，而这恰恰与市场的自由逻辑完全相悖。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张亦冰老师认为，随着实践的发展，两税法的计征和征调方式都与最初的设计大相径庭。宋廷曾希望在两税法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统收统支的国家财政制度，因而一度非常积极地整理各州郡的两税税则和户帖体系。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中央理财机构（即三司）却出现了严重的文帐挤压现象，甚至二、三十年





未能拆封。除了核算工作量过大、行政效率低等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州郡上报中央的文帐是早已做平的，因而三司核查也是徒劳的。这更说明宋代并非依赖州郡的具体收支情况拟定计划，而是依据各种打包的征调案名实现对财富的调拨和管理。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义琼则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点评。其一，跨代比较是当前历史研究中较为提倡的方法，但在使用中要非常谨慎。由宋至明的财政体系转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的发展过程。例如，宋明两代的盐税计征制度完全不同，宋代地方志中记载的盐税数据已将盐的各个流通环节全部纳入其中；而明代的盐政和民政完全是两套垂直系统，州县官不得干涉盐政。如果忽视了这一差异，就难以正确认识

明代的税收规模。其二，要注意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学逻辑的本质不同。例如，在现代经济学中，生产、流通、交换、消费是一以贯之的过程，可从下游反推出上游的状况；但在古代定额财税体系下，无法从税收收入反推出当年的生产情况乃至市场发育程度。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申斌以“明代财政核算技术”为题作报告。他指出，中国古代核算体系总体上分为两部分，一是官民之间的课税体系和税源核算，二是官府内部的财政收支核算。首先考虑官民之间的核算问题。与宋代相似，明初的田赋额核算也具有“总额因袭、惯例协商”的色彩。具体而言，就是在州县一级沿袭前代的总额数据；而在户一级则遵循惯例，并通过征税人和编户的具体协商和博弈最终拟定。因此，明代中央并不掌握课税客体的实际情况，不过是凭借州县定额的“加法”而非“乘法”粗略获知。在这一背景下，明代政府如何保证国家赋税体系的正常运转呢？申斌认为，无论是明初还是明中叶后，赋税征收都是依靠钦定或自发的中介集团实现的。这些中介集团凭借长期形成的民间赋役合同，保证了国家赋税的正常摊派和征收。其背后蕴含的契约关系和市场机制，兼顾了底层赋税核算的灵活性和稳定性。

继而考量官府内部的核算问题。从宣德至弘治、正德时期，明代官府内部对赋役征收的核算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赋役内容从不可计量的实物转变为可计量、可量化的数额，降低了税收的不确定性。到弘治时期，物料、公费基本折银征收，均徭的银差也正在形成。其二，地方政府的赋役征派从无计划转变为有计

划的定额管理，增强了税收的可持续性。这种量化的地方赋税征收计划，高度类似于今天的地方政府预算，也为上级政府提供了更为全面的量化财政信息。其三，财政核算体系逐渐从地方性扩展到全国性，并最终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制度。至万历年间，各种地方性册集已逐渐发展为省级赋役全书，将此前独立的各类赋役征派进行了加总与定额处理，纳入到全国性的财政计划之中。这种从中央到基层的定额管理模式，一方面明晰了官民之间的赋税责任，保证了税收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保证了中央集中管理制度的落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郭永钦老师结合自身对清代赋税体系的研究分享了体会。他认为，以往学界对技术史的定义往往界定在基础科学研究的历史上，如天文学、数学史等；即使涉及会计史、审计史的研究，也很少结合特定文本展开运算。事实上，关于国家治理技术的研究同样可以纳入技术史的概念范畴。随着大量档案资料的开放，学者能够得到越来越丰富的量化数据，应藉此良机重新检视古代财政史和管理史，以期获得更多的发现和现实启示。郭永钦还指出，除了研究内容外，还应深入反思技术史的研究方法。一种方法是复原技术史的形态，也即用现代数学物理方法验证技术史上的命题。但这种方法建立在现有知识基础上，与古人的研究思路和运作模式是大相径庭的；另一种方法则是量化历史，但在处理量化数据的过程中又难免陷入两个极端，要么对数据不加分辨地全盘接受，要么怀疑数据质量而完全弃之不用。未来有关中国古代财政制度、财政核算史的研究，应吸取技术

史研究的经验和教训。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丁亮老师带来了主题为“明代徭役流动性的实现方式——以均徭法为例”的报告。他指出，明代徭役体制是国家实现贡赋财政资源配置与流动的根本制度保障，其具体原则是：以“配户当差”实现社会分工，以坊里制度完成组织，以行政制动促成流动。这种体制在设计之初是排斥市场性流动的。但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徭役逐渐实现了银纳化，地方政府的财政改革也渐次出现，主要表现在人丁税转变为土地税、差役折银、赋役合并等。至嘉靖年间，一条鞭法作为各类改革的集大成者被广泛推行，最终促成了明代地方财政体制的彻底转向。这是学界目前关于明代徭役体系转变的一般理路。

但丁亮认为，此种思路受制于经济决定论和线性进化论的方法，并未反映出明代徭役体系转变的真实路径。明代徭役的市场化流动并非游离于贡赋体系之外，而是深深嵌入其中的。以均徭法为例，随着“以银定差”措施的推广，大量力差转化为银差，为徭役的拆分与流动提供了可能。如顾炎武所言：“（力差）准银以定差，而不征银，听其身自执役或倩人代役。”然而，白银货币在这里起到的无非是价值尺度的作用，并不改变徭役的“超经济强制”属性，市场体系仍是深深嵌入传统的徭役体系中的，如乾隆《镇江府志》载，重差分解的方式仍是“以票与应役人取讨雇值，不许征银”。随着徭役负担的增大，“均平审编”成为地方财政的主题之一。其具体核算方法是，每户资产被拆分成丁田若干，再以丁田互折并统一计算为银两；各地以县为单位，按丁田总数划分为

十段，即为“十段法”。但与徭役的分解类似，这种货币化审编的方式也并不代表徭役折银的完成，因为白银货币仍不承担支付手段的职能。总之，在明嘉靖末年以前，大量徭役虽被包裹上白银货币的外壳，但以“配户当差”为核心的徭役体系并没有瓦解；即使在徭役全面银纳化之后，以役为核心的财政供办体制也一直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侯鹏老师对上述报告进行了补充和点评。他指出，明代徭役的流动性提高，反映了市场机制与传统贡赋体系的紧密结合，其最终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人工环境”——人们的各种经济活动，无论是物资的买卖、流动，还是徭役的征派、雇佣，甚至借贷行为的出现，表面上都遵循市场化、商业化的经济原则，实际上仍是传统贡赋体系的逻辑。未来有关古代徭役体系的研究应更多着眼于“人工环境”的构建过程，也即市场的形成过程。

## 下午场

本次论坛下午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赵思渊首先以“赋役制度与清代土地市场中的信用”为主题进行报告。赵思渊指出，清代乡村的土地市场有着高度活跃的交流活动，而土地契约中用于确认土地业户与土地权利、保证交易有效性的支持因素，则与赋役制度具有紧密关联。支撑契约有效性的因素具体有以下四点：第一，基于图甲制的户籍制度是清代乡村社会秩序的基盘。典型的清代土地契约中，买卖双方的人户信息都以“都图甲+户名”的形式呈现。然而，随着基于一条鞭法原则的赋役改革在

明代后期陆续展开，都、图更多对应于税粮登记归属，其次才对应于地理空间，因此，税粮及其相应差役负担以赋役合同的形式频繁进行交易，清代地方政府面临的课税客体则是以契约形式结合而成的社会中间团体。第二，鱼鳞图册为乡村土地的确权提供了直接证据。但是，乡村中普遍存在多种土地字号并用的情况，因此，土地交换与经营还需要其他的信用保证作为支撑，在土地交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乡村社会既存的社会关系网络与中间团体便是第三个因素。第四类因素是股份制与相应的协商机制。清代社会中的股份制作为整体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是构成许多社会空间团体的基本依据，并随社会经济的运转而深刻存在于经济活动和地方政治中。

随后，赵思渊对“脱嵌”这一概念进行探讨。他指出，与格兰诺维特对古典经济学中社会性孤立假设的批评同理，以孤立的市場为主线对明清社会经济史进行解释也是有缺陷的。此外，将15-18世纪中国的社会事实和早期欧洲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对于一个集权化官僚帝国而言，只有面对一个有限却普遍分化的社会时，才能有效地动员和汲取资源。将“有限却普遍分化”的社会性质同中国乡村市场的演化进行比对，可以为新议题的发掘提供启发。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凌鹏在对谈中首先回应了有关“脱嵌”与“嵌入”概念的讨论。波兰尼曾经指出，有必要重新找到嵌入的关系，以回应以往学界所谓欧洲近代以来的脱嵌体系；相应地，本次论坛先前讨论的核心也在于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嵌入关系及其方式，而非彼此的脱嵌。

在中国语境下，“嵌入”在宋代以后的一个重要形式是中介集团，或社会学中所称的士绅社会。实际情况中，一个村落中的大多数人都可能拥有中介身份，这是理论讨论中需要注意的。此外，不同地方的土地市场基础与表现形态也可能存在差异，例如，不同于赵思渊所举歙县之例，巴县的土地交易市场主要以契约本身为基础，而没有留下与鱼鳞图册相关的资料。因此，土地信用凭证系统中，鱼鳞图册与土地契约之间的真正关系值得进一步讨论。

讨论环节中，申斌指出，宋代以后，依靠中介集团与合股制，传统中国的国家权力和民众间的边界已经出现了清晰化与契约化的趋势。然而，随着19世纪末以来的西方侵略，这一市场相对于国家权力网络的脱嵌过程被外力所打断，国家治理思路转变和传统社会机制脱节的问题随之而来。凌鹏补充

道，在把契约等同于市场经济理解时需注意到，虽然契约的制定过程非常详细，但在具体处理案件时，往往以契约在实操中有所调整这一认知作为基础。对此，赵思渊回应道，对早期中国社会的契约性整合进行讨论时，需要关注交易双方的身份关系和契约原则，还原到早期中国的相关语境中产生理解。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周健带来了主题为“清代漕运 贡赋与市场”的报告。漕运是在大一统国家背景下，由于政治、经济中心的分离，国家跨区域征收、调度粮食，利用河道或海道运输至指定地点以供应官兵俸饷的一种专业运输方式。15世纪初至19世纪初，围绕漕运制度逐渐形成了复杂的系统；而到了19世纪中期，这一制度则面临诸多挑战，最终发生变革乃至解体。当时，为降低高昂的河运成本，漕务运作出现了两种新的趋势。其一是漕粮的采买海运。海运



论坛现场



取代河运，变成了漕运的主流，并因此使得上海和天津取代扬州和淮安，成为了新的运输枢纽。其二是漕粮的折征折解。在有漕的省份，漕粮大规模改以银钱征解，其中又以江苏模式和湖北、湖南模式为典型。

报告随后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具体回顾。19世纪前期，在“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下，漕务浮费严重膨胀，有漕省份不堪重负。与此同时，运河通行能力也明显下降，漕粮河运成本激增，漕运制度已经难以为继。1847年，亏损最为严重的江苏漕运从河运改为海运，1852年起，浙江也加入漕粮海运的行列。江浙两省是漕运大省，其漕额之和占总体过半，此后，海运取代河运成为了漕运中的主流趋势。然而，初步改革后，海运仍旧不能实现填补财政缺额的改革初衷，户部又建议将本色海运进一步改为折色征运。折色征运即减少漕粮征收份额，根据市场波动来计算折价，把对应的款项用于在北方省份采买或招商。然而，漕运作为国家运作的一部分，同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紧密联系，无人敢轻易尝试改革。直到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太平军梗阻运道这一“不得不然之势”为契机，在各省督抚和新式企业的推动下，漕运制度才得以突破旧制度与利益集团的制约，折征折解成为有漕各省的普遍趋势。在艰难的内外时势下，国家重心变为对富强的追求，采买过程中的成本开支受到严格控制，不计成本供应京师的贡赋逻辑不再占据主导。在多种因素如内战爆发、运河废弛、轮船航运业兴起、海内外市场进一步开拓等的影响下，市场化趋势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并逐渐取代贡赋逻辑。虽然清政府直到1901年才下令停止漕运，且到最后依旧保留了海运漕粮，

但这一转变过程中，漕粮与漕运逐渐转向有名无实，其主导逻辑也发生了变化，即从“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转向了计算成本、深度依赖市场的市场逻辑。

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黄忠鑫在对谈中探讨了脱嵌概念和清中后期漕运转向之间的关联。他认为，变革前的漕运制度实质上是用运输产生的经济成本换取了政治成本，而非完全不考虑成本；改革后的漕运则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当中进行成本核算。而到了民国年间，财政制度在保留明清时代外形的同时，其背后的旧有利益团体是否发生变化则值得探讨。关于民国年间的财政与赋役，黄忠鑫指出，就徽州的情况来看，赋役合同文书的内容在晚清开始变得单一，而民国年间则没有赋役合同留存。其中的变化是在讨论嵌入与脱嵌时应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点评环节中，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彭凯翔指出，可以从齐民化进程的角度去了解赋役变化，进而透视中国早期近代化过程的特殊逻辑。推动赋役制度定额化、原额化的动力是多元的。除颇具争议的货币白银化角度外，其动力一部分来自官僚制度内部的逐利冲动，另一部分也可能来自编户齐民制度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编户体系与民众总体存在出入，无法完全准确覆盖所有人；另一方面，户内部存在不同等级，因而滋生套利行为。这两方面的矛盾推动着制度向均平的方向变化，明代赋役制度变化亦受到均平理念影响。因此，在齐民化的框架下理解明代由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的过程，可以发现其与早期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微妙区别。西方近代化理论中，军事财政理论为民族国家

的形成提供了如下解释：战争导致财政的需要，因此要将更多民众引入政治过程，导致封建特许权日益减少，最终使得财政收入增加、国家能力提高。而中国自宋代以来的均平化，其结果并非财政收入大幅提高，而是赋役的定额化乃至原额化。这一过程为军事财政国家理论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另外，从结果来看，齐民化过程并未实现严格意义上的直接控制，而是经由大量中间组织进行管理。“嵌入”概念为中间组织的形成提供了解释的可能：只有当每个个人在社会网络中拥有可资利用的资源时，个人才可能通过自组织过程形成中介集团。因此，彭凯翔认为，关于这些中间组织的研究，既需要考虑技术的引进，也应看到相应的社会政治过程。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和文凯在点评中首先回应了西方财政国家的研究框架。他认为，由于古代中国较早完成了政府开支与财税的挂钩，因此西欧分析框架下常用的财政国家概念在中国财政史研究中并不典型。和文凯分析，先前讨论的问题可以归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国家财政制度的运作，特别是其中技术因素的产生与变化。他指出，定额制这一财政技术的产生动力可以从国家减少管理成本、简化信息的角度进行理解，这一技术并非中国特有，而是在早期西欧便已大量出现。第二，国家财政收入及政府活动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当市场经济活动的规模增加到国家财政能力无法覆盖清算成本的时候，便需要中间组织的加入，进而对国家运作产生影响。第三种层次则是税额与实际经济规模之间的关系。国家、社会与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嵌入概念在此非常具有启发性，而研究与讨论则应以嵌入的不同

形式及其变化作为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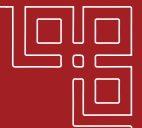
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胡铁球对上述讨论进行了四点补充。第一，明清时期中间市场存在的必要性之一在于语言。在没有普通话的情况下，贸易、行政、仲裁都需要中间人担任方言翻译，因而促进了中间市场的发育。第二，赋役货币化即折价的推行需要政府、乡民、受俸者即军士这三方获利才能真正实施。如果利用市场进行折价，政府可以购得更多粮食，乡民得以免去徭役，军士则得以消费从市场上购得的新米，因此在三方的共同利益下，赋役货币化得以迅速推行。第三，在理解原额制时，需要对相应数据进行理论与实际的区分。一方面，在折价的过程中，同一种粮食具有不同价格，例如，1石粮食折为1.2两白银，此为理论数据；而1.2两白银则编为2石粮食，此为实际数据。这一市场过程实际上变相增加了国家财政数据。另一方面，相较清代而言，明代的折价不随物价的市场波动而轻易改变，因此同一粮食不同时期的折价也存在差异。第四，胡铁球指出，乡绅组织并不能完全对乡村社会进行覆盖，其不完整之处要靠在中间组织中占比很大的市场组织弥补。因此，对中间组织的研究不应仅仅针对宗族、乡村，也应多对市场组织投以关注。

（撰稿：毕悦、张雪冷）





静园学术





## 可居室藏周叔弢函札与二十世纪中国藏书心史

2019年5月20日下午，“书志学与书籍史”系列第十二期在静园二院111召开，主题为“可居室藏周叔弢函札与二十世纪中国藏书心史”。本次讲座由文研院、广东人民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举办，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副研究馆员史睿主持。参会人员包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鸣、教授杨铸，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孟彦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程有庆、副研究馆员刘波、出版社社长魏崇、编辑总监廖生训，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钱玲与信息部副主任、“周叔弢先生收藏文物展”策展人臧天杰，天津图书馆古籍部研究馆员李国庆、副研究馆员胡艳杰，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孟刚，北京出版社编辑、“弢翁自用印”编辑王铁英，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柏峰，《历史研究》杂志前主编宋德金，当代文献学家郑伟章，文研院项目负责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学术助理孟繁之等。可居室主人王贵忱先生哲嗣王大文、周珏良先生次女周启朋、周景良先生哲嗣周群几位先生亦莅会发言。

今年是周叔弢先生诞辰128周年，际逢广州王贵忱先生可居室所藏弢翁函札与北师大图书馆藏弢翁访书尺牍先后出版。为纪念这位中国传统意义上最后一位藏书大家、著名爱国人士，及推动弢翁手札、日记、古籍批校、所藏战国秦汉玺印等整

理出版，探研20世纪中国藏书史“内在理路”，并推进学界对弢翁及自庄严堪藏书的进一步关注及研究，特举办本场研讨会。

周叔弢先生是20世纪中国蜚声海内外的古籍善本收藏家。他集毕生之精力和一生经营企业所得的大部分用来收集善本书籍。他收藏善本书籍是继承了清朝乾嘉以来季沧苇、黄尧圃等人的传统，看重宋、元、明刻本和精抄、精校本，积数十年的精力，成为近代我国藏书的一大家，在北方和李盛铎（木斋）、傅增湘（沅叔）齐名。与过去藏书大家相比，他的收藏有自己的特点。他不是求全求备，按目求书，而是严格地以高质量为标准。他要求提出“版刻好、纸张好、题跋好、收藏印章好、装璜好”的所谓“五好”标准。由于对书的挚爱，他每见一部书分散在不同地方，必要千方百计，或重价收购，或把自己所藏的捐出去，以凑成全书。对于流出国外的善本书，他总是竭力买回。关于他爱书的佳话相当多。他的鉴定能力极高，态度又极严肃。他对名人的校本的偏爱，表现了他高度的修养。他手校的书有数十种。

一九四二年，他估计当时的形势认为再收入善本书恐怕不容易，曾在手订的书目上记下几句留给子孙的话中说：“……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庶不负此书耳。”这表达出他把自己的收藏

视为“天下公物”，赠给国家才“不负此书”。当全国解放之后，他看到了全国统一安定的日子，乃于一九五二年把所藏全部善本书，宋、元、明抄、校本七百十五种，共二千六百七十二册全数捐给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他的这批无偿捐赠，同一九五〇年代初傅增湘先生逝世前后双鉴楼所售与，及一九六〇年前后自香港分两次所购回的陈清华郁斋藏书，长期以来一直被目为是构成今日国家图书馆镇馆善本之“三大支柱”。此后，周叔弢先生又收集清代活字本书一千多种，也于一九八一年和所收藏的战国秦汉古印玺一千二百六十二件、敦煌卷子二百多卷及一些名人书画一同捐赠给国家，现分藏天津图书馆、天津博物馆等多家公藏机构。除上述一九五二、一九八一年捐书外，他一九四九年捐给故宫博物院宋本《经典释文》一册（使故宫所藏得以配齐），一九五四年捐赠给南开大学中外文书籍三千余册，一九五五年捐赠给天津市图书馆三千一百余部，二万二千余册。于此可见他收藏图籍之富及为人旨趣大概。

周叔弢先生于一九八四年逝世，版本目录学家冀淑英先生尝为文纪念说：“先生生平无他好，治事之余，惟尽力访求古籍善本和其他文物图书。建国以来，历次以所藏捐献国家，化私为公，高风共仰。今北京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等，皆得以先生所赠丰富馆藏。先生于古书秘籍，固有深知笃好，又佐以博学广识，故鉴别群书，独具卓见，方之古人，也无以远过。清代乾嘉间学者洪亮吉，曾谓藏书有数等，认



为‘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次则辨其板片，注其错讹，是谓校勘家’；又次‘则搜采异本，上以补石室金匱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再次则‘但求善本，独嗜宋刻，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洪氏之说，虽属一己之见，而旧时代一般学者以至藏书家，实际却也未脱‘考订、校勘，藏、赏鉴’之道。先生之访书藏书，则与一般收藏家异趣：对书的选取十分严格，凡遇刻本，非卷帙完好、纸墨精良，则难以入选；而卷帙即使完好，如有俗笔涂污，或钤以恶印，或有割裂牌记之处，虽纸墨精良，也宁舍不取。对抄本、稿本，及前贤校跋手迹，则判别时代，鉴定真贋，更具真知卓识，为当代学者所推服。至于每得一书，手自校勘，考辨是非，推

求源本，固不待言；尤重视藏书授受之渊源，一书流传之派衍，研考至精，更多前人所未道。先生于所藏及手校之书，每撰有题识。捧读这些题识文章，先生崇高的思想境界和爱国主义精神，跃然纸上，这是先生留给我们的又一份珍贵精神财富。”并称：“先生之藏书，正所谓善藏善读，而收书藏书过程中，有数事为常人识见所不及，亦非常人所能办。古今收藏家爱其藏品，是所必然。先生的爱书，则具高瞻远瞩，为书擘画周详，期其流传久远。在多灾多难的旧中国，不但广大人民遭受苦难，就是祖国灿烂的文物古迹，如敦煌遗书、龙门石刻，也无不遭到帝国主义文化掠夺分子的任意盗劫，残酷破坏。代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古旧书籍，其中具有丰富的资料价值，更是一些打着‘文明’招牌的掠夺者的觊觎对象。解放前，每有古籍文物流往国外，先生目睹心伤，必竭力设法，抢先收购，以免外流。对于已经流往国外

的书，也不惜重值，尽力购回，如宋版《东观余论》，就是购回之一例。此书收回经过，见于先生所写跋文：‘癸酉正月获见日本文求堂书目，著录宋、元、明本凡百余种，尤以北宋本《通典》、绍兴本《东观余论》为最罕秘，盖海内孤本也。《通典》索价一万五千元，余力不能赎，乃以日金一千元购此书归国。独念今者边氛益亟，日蹙地奚止百里，当国者且漠然视之而无动于衷，余乃惜此故纸，不使沦于异域，书生之见亦浅矣。’此跋写于癸酉，即一九三三年。后来《通典》终因悬价太高，力不能办，多年后每一念及，犹不胜感慨系之。先生的爱国之忧，于此可以想见。”

周叔弢先生思想宏通，治家秉承自祖父周馥以来门风，对子弟教导有方，十个子女皆能独立，治学治事，每每“取法乎上”，各有专长。迄今六代，他们家族的一大特征，即是历代“能读父书”，即每一代都能够把前辈藏书、读书、著书的成就继承

和发扬出来，在各个方面均有所建树。可居室王贵忱先生处藏周叔弢先生寄长子周一良函，包括珏良先生致兄长函，几乎每通皆围绕书，可谓一代藏书“心史”及家学之“内在理路”。《可居室藏周叔弢致周一良函》卷前有周景良先生所为之序云：“贵忱先生以所藏先父弢翁遗札三十九通、先兄珏良遗札十八通并景良所藏先父弢翁遗札四通、侄启锐处藏先父弢翁遗札二通，交付广东人民出版社印行，诚善举也。写信时代人际交往不便，联系多赖书信，故此编数量虽不多，亦足以观当年先父生活思想及父子往来之大概。当时虽然重视政治理论学习，然以先父近九十高龄，主事者未必要求有多。而函中先父一再探讨理论、辨析疑义，足见学习时自觉深思而不应付。笃实修身，出于自然也。展读信札，当年情景宛在眼前。彼时生活节奏紧张，极少私人闲暇，为人子者，省亲不能以时，馈养不能尽意，每念及此，惭愧感慨之情，不觉发乎内心。贵忱先生示下此编，因识数语以呈。”

前辈学人函札、日记作为历史材料运用于人物专题、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及社会生活史研究，有其独特之价值及视角，别具优势。研究者可借此贴近了解所研究所关注对象当日之生活圈、交谊圈、交集圈、戚友往来、人际脉络、身体景况、心灵细微及相关贯连，即有可能借此将所关注之对象、所研究之人物，所涉及之史事、现象及人物日常居恒、进退出入、史事前后、彼此因果、相关系连，“体贴”并大体“复原”出来。而所“体贴”并大体“复原”出来之生活圈、交谊圈等又反过来有助于增进

研究者之“历史感”（进或“历史现场感”），使研究者知世论人、“读其文而想见其为人”。从而对所关注、所研究之对象于思想、文化、生活、境遇、彼此系连，有较清晰之认知与了解。只要不迂阔，见识明通，即可做到诚如陈寅老所谓“了解之同情”，慧眼只具，别开研究层境。总弢翁致一良先生函，合三家之藏，凡四十五通。雪泥鸿爪，从一个个侧面反映出弢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四日逝世前数月三十余年间之大致生活情略。函札内容，或父子谈书论学，或述及社会近闻、家事，或叙以近况，或记一代掌故，间及国家大事，非仅一代文化史料，亦一代社会史料、生活史料矣。二十世纪后半叶正值中国社会空前急剧变化之时，弢翁以花甲、古稀之年置身其间，由其独特经历、视角折射出之人世世相，对于后人了解及研究此段社会文化史乃至中国现代史，均具有无可替代之参考价值。

此次会议，与会学人讨论热烈，互通有无，诸多可记，大家交口盛赞周叔弢先生其人其行可谓“一代伟人”。周群先生作为周氏后人，在发言中谈及周叔弢先生与政治学习这一角度，最见格局，最是精辟。周群先生言：政治思想理论学习这一角度，恐怕在讲收藏家、讲文物，没有太多人提到，“但这是一个事实，在这一——特别是解放以后的，收在这里边的这些信札里面，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主题。在今天，我们讲到政治思想理论学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不太格调，觉得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呢，祖父本人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不保守，他非常关注学



讲座现场



习,也包括政治的学习。这不是说解放以后,这是从他年轻时十几岁的时候,就对时局、对政治,对跟政治有关的哲学的理解。他是一直在保持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政治是有很奇妙的地方,如果说我们做一门学问,我们完全隔绝了政治的话,这是一种做法。但是我以我个人可能很不成熟的观察,我觉得祖父对于政治的关注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的。当你要看到所有的政治的变化,你才有可能做到刚才我们讲的。刚才郑老(按即郑伟章先生)也提到有一个遗嘱,展开说一下,那是一九四二年的一个遗嘱,遗嘱的第一句话是‘生计日艰’,生活越来越难,收入越来越困难;但是最后讲,是说等到有一天‘天下太平,海内无事’,我们要把这些善本举赠国立图书馆,不可以为私有的财产。这是一九四二年,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祖父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这个期间是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但是他一生的一批收藏,不是主要也相当一批收藏,即是在这一阶段收藏进来的。回过头来说,没有一个对政治的理解,对整个社会的理解的话,他可能只做一个独善其身的收藏家,我觉得很难做到从一个国家的角度去考虑自己的收藏、去研究这样的一个角度。”“这是我看我父亲很短的这个序的一个体会,不同的角度。我觉得很多人讲到政治,要不然就是回避、隔绝,要不然就是功利的参与。但是你要是了解学习,并且通透,这件事情才能做到你在各种事情上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标准。这是我一个理解。”

在当下社会现实文化语境中探讨、思考周叔弢先生与20世纪中国藏书心史,有

特别的意义。与会学人普遍认为,对于周叔弢先生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开始,现在所做的工作,众志成城,是尽量在每一个人所具备的角度去把资料展现出来,聚合起来。之后由专门者,逐步在所涉的每一个领域,去做垂直深入的研究。周叔弢先生研究的背后,是整个20世纪中国藏书史,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史、文化史、学术生态史,体现了传统中国一步步走向现代化。

(撰稿:孟繁之)

## 杜伟生 | 纸与中国古代书籍

2019年6月10日晚,“书志学和书籍史系列”讲座第十三讲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纸与中国古代书籍”,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杜伟生主讲。与谈人包括北京德承贡纸坊创始人贡斌,国家图书馆馆员易晓辉、赵大莹,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史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志远等。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出席并参与讨论。

杜伟生是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方面的专家,在长期工作过程中积累了关于中国古代书籍用纸材料和工艺方面的丰富知识,是少有的在传世文献、出土实物与工艺实践三方面都具备扎实基础的学者。本次讲座,他从书籍的纸前史、古代的纸加工、纸书的装帧史、纸书与古代技术文化的关系四个方面介绍了纸作为书籍的物质载体形塑中国古代文明的里路。

讲座伊始,杜老师首先表示,在纸的发明以前,中国古代书籍的物质载体已有竹简、木简和帛书三种,它们和纸书的关系密切。尤其是最后一种帛书,其采用的帛纸可以认为是最早的纸,而从装帧的角度看,帛书已经具备了册页制书籍的所有要素。从东汉蔡伦造纸开始,到了唐五代时期,纸的种类大大丰富,包括麻纸、皮纸、藤纸和竹纸。除了竹纸,其他三种纸都可以在已经出土的敦煌遗书中找到实物。

纸的种类不断增加体现了古代纸加工



技术的不断发展。就传统工艺而言,一般包括打纸和潢纸两个步骤,前者是将纸由生变熟的过程,后者主要是染色。《齐民要术》中记载有“凡打纸欲生,则坚厚特宜入潢”。由于加工工艺的不同,逐渐形成了包括造槌白纸法、造金银印花笺法、造松花笺法等不同方法,而打纸也逐渐成为一个特定行业,宋人《梦梁录》就记载了“打纸作”这样的专门从事打纸的场所。纸的加工工艺也带有地域性,这体现在纸的帘纹方向上,北纸用横帘(也叫侧理纸),南纸用竖帘。



杜伟生研究员主讲

在介绍了纸的基本知识后，杜老师结合自己在古籍修复中的经验，用丰富的实物图片向大家展现了纸书装帧的演变历史，并指出书籍装帧形式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纸的薄厚。比如，卷装在宋代之后逐渐消失，是因为纸越来越薄——一方面方便着墨，另一方面节省成本。纸的质量优劣、薄厚、制作精细是否直接影响书籍的装帧形式和使用寿命。宋代以前，书籍多用手写，用纸一般都比较厚，大多在 0.8 毫米—0.13 毫米之间，这时的书籍装帧多采用卷装形式。到了宋代，印刷术蓬勃发展，书籍生产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这时，为了降低书籍的制作成本，书籍用纸同唐代比薄了许多，一般在 0.06 毫米—0.08 毫米，其最薄者已达到了 0.05 毫米左右。由于书叶较薄，书籍如果还采用卷装的形式，在卷收时就会有一定的困难。这样，书籍的装帧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由卷装变为册页式的蝴蝶装。之后，为适应更薄的书籍用纸，加快书籍装订的速度，



荣新江教授现场提问

包背装、线装等装帧形式逐渐发展起来。

基于敦煌遗书的修复经验，杜老师进一步总结了唐五代书籍用纸的特点。自 2003 年下半年开始到 2005 年 3 月止，杜老师经手登记了敦煌遗书修复档案 300 余条，经过整理修复档案记录，他发现敦煌遗书用纸的特点如下：就装帧而言，多用卷装；就用纸类型而言，麻纸、皮纸、藤纸三种都有；就用纸规格而言，长度多集中在 40 厘米—50 厘米，宽度多集中在 25 厘米—30 厘米之间，厚度多集中在 0.08 毫米—0.18 毫米之间。此外，杜老师还重点介绍了梵夹装与经折装的关系。前者是古印度写有佛教经典的贝叶经特有的装订形式，在隋唐时期传入我国；后者则由于佛经的不断翻译，古人模仿梵夹装而发展出的一种装订方法，之后普遍流行，也成为中国古代书籍比较常见的装订形式，在唐、五代、宋元都有经折装的实物。

最后，杜老师从古代技术文化的角度分析了纸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中的重要价值

和地位。第一，在造纸技术史上，竹纤维造纸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为后世用木材造纸提供了技术上的准备。第二，宋代是书籍用纸的分水岭。印刷术的普及满足了当时社会日益扩大的文化需求。印刷书籍的数量较唐五代时期大大增加。印刷用纸越来越薄，降低了书籍印制的成本。第三，线装书的出现是装帧技术的重要发明，既简化了装订工序，也提高了劳动效率，为书籍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技术条件。

讲座结束后，诸位专家学者热烈讨论。史睿指出，纸不仅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载体，也是世界各国文明的物质载体，在文化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学科限制和观念上的忽视，以往针对纸的研究主要在技术工艺方面，因此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者根据自身特点在传世文献、出土实物和技术工艺三者的结合中，对中国以纸为核心载体的文明进展体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贡斌则结合自己长期从事古代造纸工艺复原的经验，指出我们现在常见的手工纸在古人眼里其实都只是半成品，而纸工艺不断演进的最大动力出于人们追求知识生产和流通的速度，只有越来越快才符合社会的需求。易晓辉从造纸工艺的角度解释了目前没有发现宋以前竹纸实物的原因：宋代竹纸能够保留是因为竹纸的制作工艺发生了变化，再加上雕版印刷的流行，书籍数量有比较大的提升。由此可以看到，书籍的历史其实是生产原料、加工技术、使用习惯共同演进的一个过程。陈志远提出，书籍的文本性和物质性密切相关。例如从梁朝开始，古人开始在引书时添加某书某卷作为标记，这和当时佛教盛行、佛

经大量翻译有关。佛经在文本结构上主要以“品”为单位，长度往往超过书籍的一卷，引用时取“某卷”更为方便。就书籍史研究而言，陈志远认为一个亟待深入讨论的问题是中古时期的人如何通过当时的技术手段迅速分类、管理本土和域外知识。赵大莹则以自己在国家图书馆从事外文善本和特藏书籍整理工作为背景，就中西书籍史研究给出方法上的建议。荣新江从敦煌学研究出发，指出以往的研究对于敦煌遗书的物质性的重视还远远不够，对胡语文献的研究也应该结合中亚地区在书籍制作与生产工艺的交流做进一步深化。

（撰稿：徐军）







文研回望

## 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方德万教授访问文研院

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的邀请，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现代史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于2019年3月27日至4月19日访问北京大学。访问期间，方德万教授作为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主讲两场讲座，题目分别为“豫湘桂会战：二战的转折点”和“抗战时期战场以外的中国——战时的日常生活”，并在“五四与现代中国”论坛上作主题发言。

方德万早年在莱顿大学修读汉学，后于哈佛大学取得历史与东亚语言（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博士学位。他长期在剑桥大学任教，研究领域包括中共党史、二战中的中国、中国海关史等，著作有《从朋友到同志：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复兴中的中国：蒋介石、战争与国民党》等，是具有国际声誉的历史学家。

3月30日，“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二期“五四与现代中国”主题论坛在北京大学二教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举办。本次论坛旨在汇聚国内外一流学者，回顾五四运动对于现代中国社会与伦理变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方德万教授受邀出席并在主题演讲环节作报告。

方德万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作为真实政治的五四”。他使用政治哲学家雷蒙德·戈伊斯（Raymond Geuss）的“真实政治”概念来描述具有宪政意义的五四运动。百

年前，当政治制度不能为解决政治分歧而提供可被普遍接受的出路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并与这场共和宪法危机共同作用、相互影响。随之而来的，便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态度强化、公众舆论在中国政治的重要性极大提升——此二者彰显着这一运动的重大影响。

2019年4月11日，“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期第一场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豫湘桂会战——二战的转折点”。方德万教授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主持。讲座正式开始前，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向方德万教授颁发特邀访问教授聘书。

讲座中，方德万教授指出过去学界对抗战后期以及豫湘桂会战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不仅是中国，国外对抗战的研究也存在类似情况。因此，方德万教授希望学界能增加对抗战后期局势的了解。方德万教授对豫湘桂会战始末以及各方面因素进行详细分析，指出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可以视作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介绍了战场的基本情况并解释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方德万教授还分析了豫湘桂会战的其他后果，并把重心放在国共关系的政治层面。他强调军事目标不仅是一场会战的胜利，战场的失败不意味着政治上的失败。而从世界角度书写战争史时，应当注意“二战”性质在不同地区的差异，也就要求学者了

解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

2019年4月15日，“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期第二场在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抗战时期战场以外的中国：战时的日常生活”。方德万教授主讲，王奇生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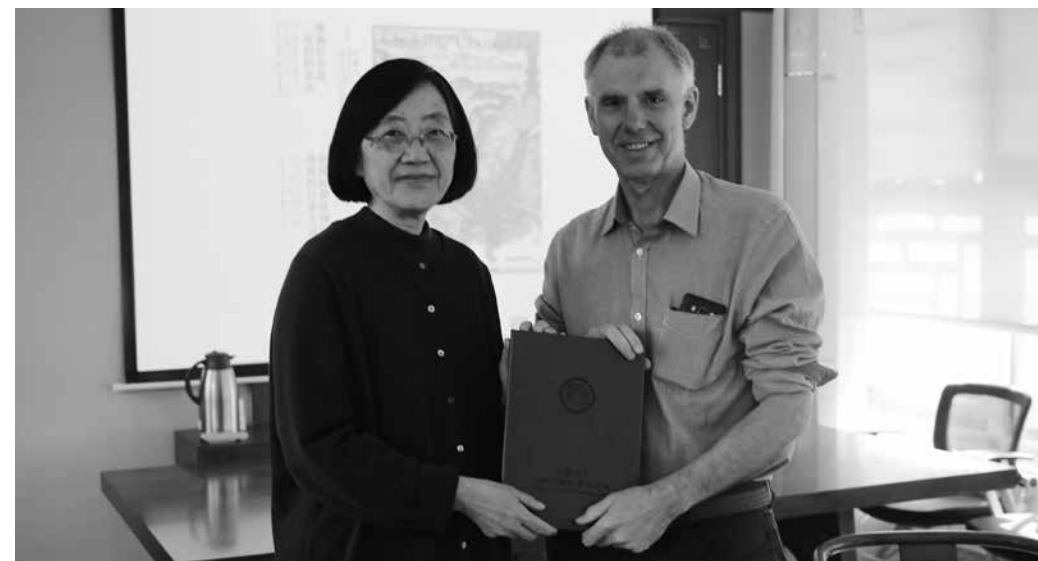
讲座中，方德万教授指出历史研究者不能把战场和战场之外的社会分开，并以陈克文在抗战时期所写的日记和齐邦媛的回忆录为例阐述了社会精英阶层与战场的关联。另外，抗战时期的“中国通史”类教科书相当流行，学生接受中国史教育、历史学家编写教材，两方都经历了一个对中国史性质和价值重认和重新思考的过程。然而，历史学家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一方面是编写教材资料的匮乏，而另一方面，笼罩在30年代学术界的“疑古”思潮对资料的可靠性提出了挑战。最后，方德万教

授指出，在欧洲、美国，政府可以通过社会调查来了解老百姓的态度，但在中国推行类似的社会调查的困难在于老百姓的识字率较低，而报纸的报道又不一定客观，这给历史学家研究战场以外的底层百姓的社会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应当综合利用佛寺道观等场所的材料、日本对中国战时经济的掌握情况等多方资料来进行历史研究。

访问期间，方德万教授还受邀赴华中师范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作学术报告。此外，他还参加了文研院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对文研院营造的一流的交流氛围予以高度评价。

（本文于2019年5月6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崔璨）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为方德万教授颁发聘书



##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文研院邀访学者就亚洲文明的和谐共处接受媒体采访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于5月15日在北京隆重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并出席有关活动。

在大会开幕前夕，国内有关媒体就亚洲文明在历史上的交融互鉴关系等问题，采访了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进行访问和讲学的几位外籍学者。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印度阿育王大学历史学教授、校长鲁德兰舒·穆克吉（Rudrangshu Mukherjee），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剑桥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现代史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接受中国外文局中国日报社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系列节目《文明之约》采访；文研院2019年春季访问教授、伊朗德黑兰大学考古系教授哈桑·法兹里·纳什里（Hassan Fazeli Nashli）接受了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系列访谈节目“Master Talk”采访。

穆克吉作为《文明之约》首集节目的采访嘉宾，阐述了印度文化对世界文化作出的主要贡献。他认为，印度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佛教的教义及其传播和圣雄甘地倡导并践行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两个方面。此外，他还从历史的角度解读了中印两国的关系。对于即将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穆克吉表示十分期待。他强调文化对话的平台越多，不同文化之

间就会有更多的机会交流互鉴，从而实现文明和谐。

同系列节目嘉宾方德万一直致力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他表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多元的。它不仅包涵为世界人民所熟知的儒家文化，还兼容了道教、佛教、基督教等多种文化，同时不同地域的文化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因而在思考“何为文化”这一问题时，要始终牢记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他还强调，在当今世界的大环境下，各国应积极展开全球对话，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各种挑战，如环境污染等问题，而不是一味地争论所谓的“文明冲突”。

纳什里是享誉学界的考古学家，本学期受文研院及考古文博学院之邀，在北大开设课程“伊朗考古：从旧石器时代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他在接受CGTN的访谈时表示，根据考古研究发现，不同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种子早在约4500年之前就已经播种在广袤的亚洲大地上。在当时，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古代伊朗）、马干（古代阿曼苏丹国）、麦鲁哈（古代印度）、狄勒蒙（古代阿拉伯）和中国之间就存在着文化沟通的纽带。他认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亚洲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互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契机，有益于不同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的友谊桥梁。同时，他强调亚洲国家的文明有着许多共通之处，

需要更多地站在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角度，找寻文化传统的脉络。

据了解，此次大会的主题是“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包括开幕式、平行分论坛、亚洲文化嘉年华、亚洲文明周活动等四大板块，涉及相关活动110多

项，充分展示亚洲文明的多彩魅力和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本文于2019年5月15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崔璨）

## 印度阿育王大学校长鲁德兰舒·穆克吉来北大讲学

应“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著名历史学家、印度阿育王大学校长、历史学系教授鲁德兰舒·穆克吉（Rudrangshu Mukherjee）于2019年4月14日至27日来访北京大学，并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发表五场系列学术演讲。演讲贯穿了印度近现代史的关键时刻，涉及甘地、尼赫鲁等重要历史人物。此次活动由北大文研院与国际合作部联合主办，光华教育基金会提供资助。

鲁德兰舒·穆克吉，印度著名历史学家，现任印度阿育王大学（Ashoka University）校长、历史学教授。他于1981年获得牛津大学现代史博士学位，曾在加尔各答大学教授历史。其首本著作《1857-1858年阿瓦德起义：民众抵抗的研究》对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这一印度历史编纂学

上极为重要、也极具争议性的事件，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成为这一领域的必读书。围绕该主题，他还著有 *Spectre of Violence: The 1857 Kanpur Massacres*, *Mangal Pandey: Brave Martyr or Accidental Hero?*, *Dateline 1857: Revolt against the Raj* and *The Year of Blood: Essays on 1857* 等著作，享有国际声誉。

4月15日下午，穆克吉教授系列讲座第一讲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题目为“1857年印度起义（The Revolt of 1857 in India）”，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邦维教授担任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在演讲前为穆克吉教授颁发特邀访问教授聘书。演讲中，穆克吉教授生动再现了1857年印度起义是如何由一场小小的士兵兵变，演变为一场波及印度大部分地区和社会各阶层革命的过程，揭示出起义的诉求在于恢复莫卧儿王朝的旧秩序。同时，演讲聚焦



穆克吉教授在文研院发表学术演讲

对相关流言、消息以及预言在起义过程中的传播过程和作用机制的研究。演讲最后揭示了起义的暴力性质以及对双方造成的伤痛。

4月17日下午，系列讲座第二讲举行，题为“印度早期自由主义的矛盾（The Antinomies of Early Liberalism in India）”，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段德敏副教授担任主持。本次讲座主要讨论了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一是印度学院教师亨利·代罗兹的解雇，发生在英国在印建立统治初期；二是19世纪后期关于《伊尔伯特法案》的争议。二者分别从教育和司法两个方面说明了印度早期自由主义中存在的矛盾。

4月19日下午，系列讲座举办第三讲，题为“印度与现代性的遭遇（India's Encounter with Modernity）”，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咎涛副教授担任主持。19世纪，随着英国在印度统治的确立，现代性

和现代化的概念传入印度。当时印度涌现出三位杰出人物——拉姆·莫汉·罗伊（Rammohun Roy）、斯瓦尔·钱德拉·维迪耶萨伽尔（Iswarchandra Vidyasagar）和杜特（R.C.Dutt）。罗伊是一位社会改革家，他在1829年成功地推动立法禁止殉夫；维迪耶萨伽尔是一位传统的婆罗门学者，推动了印度的教育和社会改革工作；杜特是一名印度文职机构人员，写了关于英国统治下印度经济史的书。穆克吉教授认为他们片面、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现代思想。与前三位不同的是，甘地则认为印度应该拒绝英国的现代化思想，回归乡村，摆脱西方文明和工业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4月24日—25日，系列讲座最后两讲举行，均由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建主持。第四讲题为“甘地和尼赫鲁：爱与分歧”，穆克吉教授在讲座中介绍了甘地和尼赫鲁之间长达三十余年的交往历程，集中展现了两人关系中爱与分歧共存的特点。演讲内容主要聚焦在两人书信这一一手史料上，使得两人关系的展现真实可感，同时也提及了几个印度独立运动中的重大事件，使得具体的私人关系和现代历史联系起来。最后一场讲座以“泰戈尔的遗言”为题。1941年4月，当世界被暴力笼罩，自己的生命也即将逝去，诗人泰戈尔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称之为“文明的危机”。在演讲中，泰戈尔坦率地谈到了自己早年对西方及其文明的迷恋。这种迷恋是泰戈尔和其他19世纪的印度（尤其是孟加拉族）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但到了19世纪末，这种对西方的欣赏开始消退。穆克吉教授回顾这种“祛魅”

（disenchantment）的趋势，继而讨论泰戈尔在最后一次演讲中表达的对西方的彻底幻灭（disillusionment）。尽管泰戈尔的周围充满了暴力，但他并没有绝望。泰戈尔没有对人类失去信心，并表达了东方可能出现新的文明的愿景。

穆克吉教授在校访问期间，正值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前夕，他应邀接受了中国外文局中国报道社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系列节目《文明之约》的采访。在采访中，他阐述了印度文化对世界文化作出的主要贡献。他认为印度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佛教的教义及其传播和圣雄甘地倡导并践行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这两个方面。此外，他还从历史的角度解读了中

印两国的关系。对于即将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穆克吉教授表示十分期待。他强调文化对话的平台越多，不同文化之间就会有更多的机会交流互鉴，从而实现文明和谐。此外，应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的邀请，穆克吉教授还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荣休教授周锡瑞、清华大学历史系曹寅副教授进行了一场对话，共同探讨印度中心观与近现代中国史研究的关系。

（本文于2019年5月24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崔璨）

## 文研院举办第六期访学学者欢送会

2019年6月26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称“文研院”）第六期访学学者欢送会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本期访学学者、文研院院务会成员及行政团队参加本次欢送会。欢送会由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主持。

会前，本期访学学者、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就其新书《借题发挥》，举行了温馨、朴素的发布会。本书由刘志伟在文研院驻访期间完成编订、校印，全书由27篇序跋

和书评结集而成，体现了他多年读书治学的心得。

一段由工作团队对访学学者所作的采访视频拉开了本次欢送会的序幕。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在致辞中表示，文研院致力于在喧嚣的背景下为学者们提供自由选择的机会，共同塑造沉静的学术氛围与纯净的人际关系。学者们的学术背景各异，却又毫无隔膜，融洽地在文研院搭建的平台上自由交流，也带给文研院以



更多的可能性。同仁，同道，学者们被学术群体关照着，而文研院也被同道学人的执着追求感染着。她期待和在座学者彼此扶持，共同摸索未来的路。

第六期邀请学者发表感言，在感谢文研院提供的一流环境与服务的同时，更流露出深深的不舍之情。短短四个月，学术交流密集展开。这些活动不按照职称、代际、背景组织，平等讨论的氛围与批评的态度提供了广阔而自由的思辨空间。青年学者们自发组织小型的读书会、学习班，多元的学术背景相互补充、映照。这样的经历让学者们得以从新的窗口体悟多元的世界和完整意义上的人的多面性。

“‘人以群分’是将一群有着相同性情，对相似问题有追求有思考的人聚在一起。”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在一次采访中如是说。交流会上激烈碰撞出的思想火花，解放了既定的研究框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野，同辈学人严谨、认真、

刻苦的治学精神也鼓舞着彼此继续前行的心——文研院将一个个辛勤耕耘在各自领域的学人串联起来，拧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正如陶渊明在田园诗中所描绘的，“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学人对于学问的执着，一如农人关心庄稼一般，简单、纯粹而袒露赤子之心。在平等的交流中，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必将成为未来学术之路上的宝贵财富。

在常规学术研讨之外，文研院还为学者们安排了丰富的交流活动。从参访荣宝斋到参观北大筒，以及对陇东、宁南地区的史地考察项目，学者们的智识分享与思想碰撞由校内延续到校外。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马孟龙在驻访期间受邀参加文研院的西北考察，远赴庆阳、平凉、固原等地实地走访。此行的丰硕收获，为他对西汉时期该地域行政区划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而考察途中与李孝聪、鲁西奇等资深学者的密集交流与互动，更让他对



第六期邀请学者与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前辈学人的学识与品格留下了深刻印象。

资深学者谆谆教诲，年轻学者被带动、被感染、被影响。刘志伟教授借着新书的发布分享了自己的治学观点，他亦动情表示在文研院找到了寻觅很久的精神家园。著名艺术史学者、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尹吉男在驻访期间聆听了多场高水平报告，得以迅速把握不同学科的前沿水平，有关美术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从中获益良多。著名蒙元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迎胜正在德国领取“洪堡奖”荣誉，他通过视频寄语，亲切表示在文研院结识的青年学者有胆识，有追求，有热情。相似的治学态度和对知识的渴求，让大家在此亲密无间，没有距离。

几位外籍学者也称赞文研院开放的交流氛围。日本爱媛大学教授藤田胜久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欧克莱尔分校教授秦玲子均表示，文研院代表着国内最高学术水准，高密度的跨学科交流机会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学术体验。伊朗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教授哈桑·法兹里·纳什里（Hassan Fazeli Nashli）在驻访期间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开设“伊朗考古：从旧石器时代到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课程，吸引了多位校外学者前来聆听。对他而言，能将这门课传授给年轻学子是无比珍贵又美好的回忆。而在北大的访问，也让他有机会与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联系，为日后伊朗考古学与“一带一路”区域文明研究搭建桥梁。

渠敬东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中国人做学问，并非从个体性的角度出发，而是代际生生不息的传接——这也是文化根脉所

在。文研院关注人的聚合。做学问即做人，好的学问来自情感的聚合与发散。邀请学者项目不以访问时长、期数定义学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文研院和学者的关系是完整的、永续的。

四个月的时间还是太短暂了。院外，北大学子在静园草坪上意气风发地抛起了学术帽；院内，六期学者在二院红门前依依不舍地道别。在工作团队对邀请学者所作采访视频的开头，响起的是一段社科院外国文学所黄群老师的画外音：“从初春到盛夏，我看到我窗前的树，从一个很萧条的景色，到现在绿叶若盖。绿叶葱葱非常美，就跟我的心情一样。我现在还不能想象离开文研院的心情，会很复杂吧，因为特别留恋。”

灞桥折柳，骊歌轻唱，想必这也是每位学者的心声。

（本文于2019年7月2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周诗雨）



## 文研院组织学者赴陇东、宁南地区开展史地考察

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甘肃陇东地区及宁夏南部地区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这里又成为连接鄂尔多斯高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的过渡地带，从秦汉到唐、宋、明等时期，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部族之间的战与和，在这一带交替上演，所以沿线的城址、堡寨十分密集。而流经该地区的泾河、蒲河、茹河、马莲河所冲积出的河谷地带，也成为连接关内与塞外的军事、通商的要道，是丝绸之路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地探查这一地区的山川地形、边塞城址，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组织历史学、历史地理、考古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于2019年6月19日—25日，对上述地区进行综合考察。这也是继2017年居延遗址考察、2019年内蒙古长城沿线考察后，文研院组织策划的又一次西北考察。

考察团一行13人，包括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小南，文研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孝聪，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鲁西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正，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刘未，文研院访问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马孟龙，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付马，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于志霖，摄影师任超，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行

政助理王瑞担任考察领队。

6月19日中午，考察团从南苑机场搭乘飞机前往庆阳市西峰机场，与先期抵达的鲁西奇教授会合，并在庆阳市博物馆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庆阳市博物馆。考察团一行首先参观了庆阳文物历史展厅，该展厅全面展示了庆阳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庆阳市地处陇东，黄土高原西部，西北与宁夏接壤，是周人建立基业之地。西周早期至晚期的墓葬在庆阳地区均有所发现，表明了该地区与周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在庆阳市博物馆短暂停留后，考察团一行旋即驱车前往庆城县博物馆。庆城县位于今庆阳市西峰区东北方向约60公里处，是庆州古城所在地，据《括地志》记载，“宁、原、庆三州，秦北地郡，为义渠戎之地，周不窋、公刘居之”，属古北豳之地。该县博物馆位于中轴主路北大街与东大街交汇处东北角普照寺东侧，是一座以展现庆城县历史沿革为主题的博物馆。唐代游击将军穆泰墓出土的陶俑、墓志、货币等文物是庆城县博物馆的一大亮点，对于研究唐代西北地区的胡人汉化具有重要意义，为学界所重视。

6月20日，考察团一行从庆城县出发，首先考察了庆城县南街鹅池洞。随后，沿环江谷地西北行，沿途考察马岭镇、曲子镇刘旗古城，中午抵达环县。令人意外的

收获是，考察团在曲子镇遇到了由环县一名历史老师收藏的一块汉北地郡瓦当。李零当场对该瓦当铭文作出释读。马孟龙表示，该瓦当对于研究汉代政区及北地郡汉戎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午饭后考察团一行在参观完环县博物馆后，继续沿环江西北行，考察乌仑寨、肃远故城、洪德城址等多处不同时期的城址堡寨。返回途中，考察团在木钵镇考察了木钵城址（《环县志》记为“木波城”）。北宋初期，中原王朝在西北地区与西夏长期对峙，修筑了大量堡寨抵御西夏入侵。考察路线沿途城址堡寨毁损严重，不易察寻，在庆阳市博物馆赵志强书记的热心导引下，辅助以航拍手段，考察团专家学者得以一窥古城遗迹的全貌。

随后，考察团又参观了回程途中的庆城县三十里铺教堂。上世纪20年代，对中国地质学、古生物学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法

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桑志华曾在此供职。当晚，考察团一行在夜色中赶回庆阳市。

6月21日，考察团兵分两路，李零、王睿和任超一行沿宁县、正宁方向，主要考察秦要册湫祭祀遗址，并参观沿途博物馆。考察团其他人员则从庆阳市出发，首先考察了庆阳市西峰区西南25公里蒲、茹两水交汇处东岸的北石窟寺。北石窟寺始建于北魏永平二年，直至宋、清仍有新窟开凿增修，时间跨度逾千年。在165号石窟前，韦正就该窟的整体结构、塑像风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佛教思想进行了专业解读。他表示，北石窟寺杂糅的塑像风格显示出了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民间信仰的影响。

考察团在当地文物工作者的带领下，考察了北石窟寺南侧的丝绸之路古道遗址。该遗址隐蔽于山麓处的草木之间，保存完好，有一排凹槽和两排凹槽两种形态，均依稀可见。午后，考察团一行驱车经镇



考察团一行在朝那湫（东海子水库）合影



原、泾川抵达平凉，沿途冒雨参观了镇原县博物馆、泾川县博物馆、王母宫石窟、南石窟寺。当晚，李零一行与考察团在平凉会合。

6月22日，考察团从平凉出发，驱车翻越六盘山，经泾源进入隆德县境内，沿途在雨中眺望了秦回中宫遗址。随后行至隆德陈田玉村，虽雨过天晴，但村路仍泥泞难行，车辆无法抵至山前。考察团一行人下车，徒步登上远处高地，望见好水川前一片开阔之地，宋史上有名的好水川之战即发生于此。宋康定二年，李元昊举西夏十万之众南下，大破宋军。宋代的军事实力长期为人所诟病，但邓小南强调，虽然西夏在前期战役中以积极的姿态南下攻宋，然而从长远来看，北宋的西北边防并不失败，而是有效地抵挡了西夏人的入侵。其后，考察团又在西吉县境内考察了火家集村的羊牧隆城址和偏城村的怀远寨城址，这些城址均与宋和西夏之间的战事相关。

6月23日，考察团从固原出发，向东南方向行驶到今东海子水库，即秦时与黄河、长江、西汉水并称的四大名川之一的“朝那湫”。朝那湫遗址由海子和凉马台两部分组成，海子四面环山，山壁上河水侵蚀的痕迹依稀可见。据当地文物工作者介绍，湫渊面积已急剧缩小，远非昔日的规模。据《甘肃通志》，秦惠文王伐楚，曾献《诅楚文》于朝那湫神。马孟龙指出，秦人对朝那湫的祭祀很可能继承自被征服的戎人，而朝那湫在秦人祭祀体系中的规格之高则与朝那湫在戎人信仰中的地位有关。

离开朝那湫，考察团一行驱车东行，

进入彭阳县境内，沿途考察了古城镇朝那古城遗址。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古城镇发现了一尊西汉初年的铜鼎，铭文有“朝那容二斗一升”字样，因而断定古城镇即秦汉朝那县的所在地。离开古城镇，考察团一行前往彭阳，参观彭阳博物馆。

随后，考察团一行考察了彭阳县境内的秦昭襄王长城遗址。秦长城的修筑稳固了秦后方的边防安全，为秦向东挺进统一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不过，李孝聪表示，修筑长城虽然首要考虑的是其军事上的作用，但也非尽然。长城实际上是一条政治界限，它不仅在战争年代发挥抵御外寇的作用，即使是在和平年代，它也起着控制长城内外的人口流动和贸易交往的功能。考察团随后参观了张沟圈长城遗址，它是一段南向走势，又呈直角向东延伸的长城遗址。彭曦在《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一书中提及此地，认为是“接茬”，但当地文物工作者称在此地发现了泉水，因而推测此拐角可能为争夺水源而修建。返程途中，考察团在彭阳县城短暂停留，考察了彭阳古城的一段沿山体修筑的城墙。

6月24日，考察团从固原出发北向行驶，首先考察了位于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黄铎堡村的须弥山石窟，依次参观了相国寺、桃花洞、圆光寺和大佛楼等多处石窟。须弥山石窟下的河谷，据称即为著名的石门关古道。

午饭后考察平夏古城。据《宋史·章榘传》记载：“（榘）阴具板筑守战之备，帅四路师出葫芦川，筑二城于石门峡江口好水河之阴，二旬有二日成，赐名平夏城、灵平寨”。现平夏古城为三座城址的叠合。

内城为清代修筑的黄铎堡，外城为宋大观二年扩建的怀德军，夹在其间的即为宋绍圣四年由章榘修筑的平夏城。黄铎堡位于平夏城东南角，与平夏城共用东、南城墙的一段。平夏城在北宋西北边防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有效地扼制了西夏军的南下。

在返回固原的途中，还考察了同为章榘所筑的灵平寨。在固原附近的中河村，考察团一行考察了大营城址，该城为明代甘州牧群千户所驻地，为肃府牧马之地，有极为罕见的两条护城河，同样也是本次考察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城址。

6月25日，考察的最后一天，考察团一行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罗丰的陪同下，参观了固原农耕博物馆和固原市博物馆。中午，考察团一行搭乘飞机返京，考察圆满结束。

本次考察所经之庆、涇、原地区在中原王朝地理疆域的历史变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邓小南强调，考察的目的在于回到历史现场，激活阅读文献时的一些想法和思考。考察团专家学者戏称，考察是一种“走会”的方式。沿途车上，各位专家学者就各自感兴趣的问题热烈讨论。王睿更是利用考察间隙，对李零进行了学术访谈。“走会”、即兴的讨论和学术访谈极大地丰富了此次陇东、宁南考察之行。文研院也将组织相关学者，对本次考察沿途所见、所感做认真细致的总结，详细的考察日志也将随后发布。

（本文于2019年7月10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王瑞）





文研纪事





## 文研纪事

06

2019-05

文研院网站升级会议在静园二院 III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与网站设计公司共同商议网站升级相关事宜。

07

2019-05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次）在静园二院 III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少雄作主题报告，题目为“阶序团结、精英中介：近代边疆民族与国家关系再思考”。第六期邀请学者刘迎胜、刘志伟、藤田胜久、尹吉男、哈桑·法兹里·纳什里（Hassan Fazeli Nashli）、秦玲子、冯培红、熊春文、狄金华、鲁家亮、马孟龙、于溯、赵妍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四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反思奥斯曼帝国的多样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昝涛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玉麟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评议。

08

2019-05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前夕，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策划制作了系列节目“Master Talk”。节目组来到北大校园，对正在文研院访问的伊朗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教授哈桑·法兹里·纳什里进行专题采访。

09

2019-05

方正集团北大资源集团组织员工参观“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专题展览，文研院学术助理石涵担任讲解。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交流会在静园二院 III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迎胜发言，交流题目为“丝路研究的中国视角与世界视角”。第六期邀请学者刘志伟、藤田胜久、尹吉男、赵京兰、哈桑·法兹里·纳什里、秦玲子、冯培红、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马孟龙、袁剑、于溯、赵妍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五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对位与错格——五四与电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主持。

10

2019-05

“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三期在静园二院 208 室举行，主题为“多文化语境中的夷夏认知”。本次论坛由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迎胜主持，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姚大力做引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罗新、张帆、副教授党宝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乌云毕力格，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正寅，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华涛出席并做主题发言。

时值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栏目组参观“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专题展览，并对两位展览大纲撰稿人进行专题采访，她们是：文研院第二期邀请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妍杰。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受邀参加燕京学堂成立五周年纪念活动。

“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六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比较历史分析的源流辨析”。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应星主讲，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主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侯旭东评议。

13

2019-05

文研院组织第六期邀请学者前往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参观“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专题展览，本次展览撰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妍杰担任展览讲解。

14

2019-05

文研院组织第六期邀请学者参访荣宝斋。学者们鉴赏荣宝斋馆藏，并参观了木板水印工作室和文房用品经营部，了解装裱修复、复制技术以及文房用品的情况。荣宝斋展览部主任陈目全程陪同接待。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七期第一场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保罗·克洛岱尔与中国”。巴黎索邦大学教授迪迪埃·亚历山大 (Didier Alexandre) 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董强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余中先评议。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 (第十一次) 在静园二院 III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马孟龙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东郡之置与吕后时代的地域控制政策”。第六期邀请学者刘迎胜、刘志伟、藤田胜久、尹吉男、哈桑·法兹里·纳什里、秦玲子、冯培红、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袁剑、于溯、赵妍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四十七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企业的道义——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策略及其市场影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闰龙主讲，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评议。

15

2019-05

文研院邀请学者哈桑·法兹里·纳什里教授参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古生态与人类适应团队”系列学术报告并作主题发言。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拜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院长助理韩笑就建国初期北大校园、乐黛云先生的学术历程，以及与老先生的交往等情况对乐黛云先生进行专题采访。

16

2019-05

文研院组织第六期邀请学者前往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参观北大简。

17

2019-05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七期第二场在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1919-1930 年间法国思想界的东西方之争”。巴黎索邦大学教授迪迪埃·亚历山大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秦海鹰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董强评议。

19

2019-05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八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以史实矫正想象——以我的藏区文学书写为例”。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主讲，文研院邀请学者郑少雄主持。

20

2019-05

“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四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边疆社会的文学镜像”。作家阿来与来自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的多位学者展开了有关“边疆”文学创作的热烈对话。郑少雄主持本次论坛。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成立仪式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一楼报告厅举行。文研院第一期邀请学者白谦慎教授出任院长，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受邀出席仪式并致辞。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四十八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湘人江督格局’与晚清政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韩策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叶炜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忠文评议。

21

2019-05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 (第十二次) 在静园二院 III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欧克莱尔分校历史系教授秦玲子 (Reiko Shinno) 作主题报告，题目为“蒙元帝国的医学文化”。第六期邀请学者刘迎胜、刘志伟、藤田胜久、尹吉男、哈桑·法兹里·纳什里、冯培红、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马孟龙、袁剑、于溯、赵妍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22

2019-05

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教授马克到访文研院，文研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共同接洽并商讨汉学经典翻译与合作事宜。

文研院宁南地区史地考察筹备会在静园二院举行。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孝聪、三期邀请学者刘未、六期邀请学者冯培红、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主任李静、摄影师任超，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参加会议。



23

2019-05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交流会在静园二院 III 会议室举行。日本就实大学教授李开元与文研院邀请学者、日本爱媛大学教授藤田胜久及文研院邀请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鲁家亮发言，交流题目为“山西史地考察分享”。第六期邀请学者刘迎胜、刘志伟、尹吉男、赵京兰、哈桑·法兹里·纳什里、秦玲子、冯培红、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黄群、袁剑、于溯，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由文研院主办的“文明之间系列讲座”暨“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九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神采幽深：流转在古代近东文明之间的青金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拱玉书主持。

25

2019-05

“菊生学术论坛”第十四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脱嵌的母体——传统中国贡赋体制中的食货原理”。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主持，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十余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本次论坛由文研院、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及商务印书馆共同主办。

28

2019-05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到访文研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张藜及北京大学理学部、人文学部工作人员陪同，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热情接待，共同商讨科学文化研究院科学史所同文研院在学术活动、合作研究等领域的发展框架。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三次）在静园二院 III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韩国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赵京兰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天下秩序与儒教普遍主义的重组的可能性”。第六期邀请学者刘志伟、藤田胜久、尹吉男、哈桑·法兹里·纳什里、秦玲子、冯培红、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马孟龙、于溯、赵妍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四十九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灰尘的旅程：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与生活中的‘洁净’”。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纳海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英语系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主持，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评议。

30

2019-05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交流会在静园 III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尹吉男发言，交流题目为“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个人与‘传统’”。第六期邀请学者刘志伟、藤田胜久、哈桑·法兹里·纳什里、冯培红、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于溯、赵妍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31

2019-05

文研院行政团队内部分享会在静园二院 215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项目助理关雪、宣传助理崔璨对行政团队进行采访项目实操培训。

03

2019-06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东方——以日本近代发展为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董昭华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袁明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文莉评议。

05

2019-06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四次）在静园二院 III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黄群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卢梭与百年中国”。第六期邀请学者藤田胜久、尹吉男、哈桑·法兹里·纳什里、秦玲子、冯培红、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郑少雄、鲁家亮、马孟龙、袁剑、于溯、赵妍杰，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06

2019-06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谢湜、书记龙波、院长助理程方毅一行到访文研院，参观学术展览，并与文研院工作团队就系列学术活动、邀请学者项目、学术考察项目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及全体行政人员共同接待。

文研院同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联合举办“简牍与秦汉史”读书交流会。6月6日，交流会第一场在静园二院 III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秦汉简牍的信息处理——以里耶秦简和汉简文书为中心”。日本爱媛大学教授藤田胜久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员陈侃理主持。

10

2019-06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荒野的呼唤——六十年守护自然之旅”。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资深科学家乔治·夏勒（George B. Schaller）主讲，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李晟主持。

“书志学与书籍史系列讲座”第十三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纸与中国古代书籍”。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杜伟生主讲，贡斌、易晓辉、赵大莹、史睿、陈志远等相关领域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11

2019-06

第三次“北大中国史”编撰项目讨论会在静园二院举行。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文研会工作委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苏镇、赵世瑜、陆扬，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韩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树峰，三联书店党委委员孙晓林、编辑冯金红、杨乐出席本次会议。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五次）在静园二院 III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冯培红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地名移动及背后的历史”。第六期邀请学者刘志伟、藤田胜久、尹吉男、哈桑·法兹里·纳什里、秦玲子、邱源媛、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马孟龙、袁剑、于溯，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一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如何重建一场葬礼——西汉遣策的用法与读法”。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田天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邢滔滔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评议。

12

2019-06

“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五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与物种传播”。与会学者包括：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文研院邀请学者、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冯培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葛承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永平，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李肖和中央民族大学语言研究院教授张铁山。本次论坛由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叶炜主持。

13

2019-06

“简牍与秦汉史”读书交流会第二场在静园二院 III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从张家山 336 号汉墓法律残简谈汉代氏道、潁水、嵒塚山的方位——兼谈古代汉源地理知识思想史变迁”。文研院邀请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马孟龙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员陈侃理主持。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交流会在静园二院 III 会议室举行。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狄金华与韩国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赵京兰发言，题目分别为“授权与革新：梁漱溟在邹平的县政改革”、“近代中国与社会进化论”。第六期邀请学者刘志伟、藤田胜久、尹吉男、哈桑·法兹里·纳什里、冯培红、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于溯、赵妍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系列讲座暨“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一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经济社会学的制度研究——两条不同的跨学科研究路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世定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主持。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咎涛评议。

14

2019-06

文研院海报展筹备会在静园二院地下咖啡厅举行。

文研院行政团队内部分享会在静园二院 III 会议室举行。行政主管陈天传主讲，分享题目为“税改和社保扣缴基本情况”。

17

2019-06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二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群众创造’的经验与问题——以 1944 年‘《穷人乐》方向’为案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程凯主讲，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姜涛评议。

18

2019-06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前往台湾拜访中研院院士、政治大学教授张广达，并与中研院院士王汎森教授会面，商议筹备傅斯年先生纪念展览事宜。此行也拜访了文研院邀请学者、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六次）在北京西山大觉寺明慧茶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熊春文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文明的个性与命运”。



韦伯的农业社会学及其启示”。第六期邀请学者刘志伟、藤田胜久、尹吉男、赵京兰、秦玲子、冯培红、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黄群、鲁家亮、马孟龙、袁剑、于溯、赵妍杰，文研院院长邓小南、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19-25  
2019-06

文研院组织历史学、历史地理、考古学等领域专家学者赴陇东、宁南地区进行综合史地考察。考察团一行共计十三人，包括：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文研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孝聪，文研院邀请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鲁西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正、副教授刘未，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睿，文研院邀请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马孟龙，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付马，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于志霖，摄影师任超。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行政助理王瑞担任考察领队。这是文研院组织策划的第三次西北考察。

19  
2019-06

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宣传助理崔璨前往上海与杭州，分别拜访文研院邀请学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同文研院邀请学者、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院院长白谦慎，并与二位学者商讨传承活动筹备事宜。

20  
2019-06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交流会在静园 III 会议室举行。南京大学文学院讲师于溯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欧克莱尔分校教授秦玲子发言，题目分别为“典故传说”、“柳田节子 (1921-2006): 殖民地·战时经验、性别、与日本汉学”。第六期邀请学者刘志伟、藤田胜久、尹吉男、哈桑·法兹里·纳什里、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于溯、赵妍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21  
2019-06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二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经典性、母语问题及其它——谈中国当代诗歌英译选本”。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院教授柯雷 (Maghiel van Crevel) 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主持。

荣宝斋展览部主任陈目一行来访文研院，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接待，并商议展览合作事宜。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三期在静园 II 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雅集之后的图像与政治命运”。文研院访问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尹吉男主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松主持。

24  
2019-06

“简牍与秦汉史”读书交流会第三场在李兆基人文学苑一号楼 102 室举行，主题为“秦简中的‘监’与‘视平’——兼谈里耶秦简与岳麓秦简对读的重要性”。文研院邀请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鲁家亮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员陈侃理主持。

26  
2019-06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欢送会在静园 II 院 208 会议室举行。本期邀请学者刘志伟、尹吉男、藤田胜久、秦玲子、冯培红、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黄群、鲁家亮、马孟龙、袁剑、于溯、赵妍杰，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及全体行政人员参加。本次欢送会由副院长杨弘博主持。

27  
2019-06

“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六期在静园 II 院 208 室举行，主题为“回到‘乡村’——整体性视野与中国社会研究”。本次论坛由文研院邀请学者、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狄金华主持，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贺照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熊春文做主题发言。

28  
2019-06

文研院组织召开北大校史口述史访谈项目工作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牛大勇，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参加会议并展开讨论。

文研院内部培训会在静园 II 院 III 会议室举行，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黎婉欣对行政团队进行培训，内容为“布展 Shortcuts? ——如何开展布展”。

02  
2019-07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四期在静园 II 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异中求同——帕森斯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哈佛知识圈”。哈佛福德学院社会学系教授马克·古尔德 (Mark Gould) 主讲，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王利平主持。

文研院 2020 年春季学期邀请学者项目开放申请。

03  
2019-07

“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七期在静园 II 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民族与国家：再思中国民族识别与社会历史调查”。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王利平、博士彭桥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王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伍婷婷，中央

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教师何贝莉及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副教授李如东做主题发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教授渠敬东、助理教授田耕，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清媚评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教授马戎，浙江大学教授菅志祥出席并参与讨论。

04

2019-07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夏伯嘉到访文研院，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热情接待。

18

2019-07

“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八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书谱石刻：中古到近世华南与西域研究的对话”。本次论坛由文研院、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来自爱默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海内外十余所高校的二十余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